張學良與日本

本書根據日本NHK公司一九九〇年在台北訪問張學良的紀錄寫成。

張學良自敍其出身與生平，由少年時代教育，繼承其父張作霖事業，經東北易幟、剿匪、抗戰，以至棲隱台灣的生活，而以對中國本世紀歷史影響重大的西安事變為重點。

張學良以此事主謀之身分，提出他的第一手說法，是他家所無的珍貴歷史證言，也為這段中國現代史及其關鍵人物諱莫已久的神秘事跡揭開眞相的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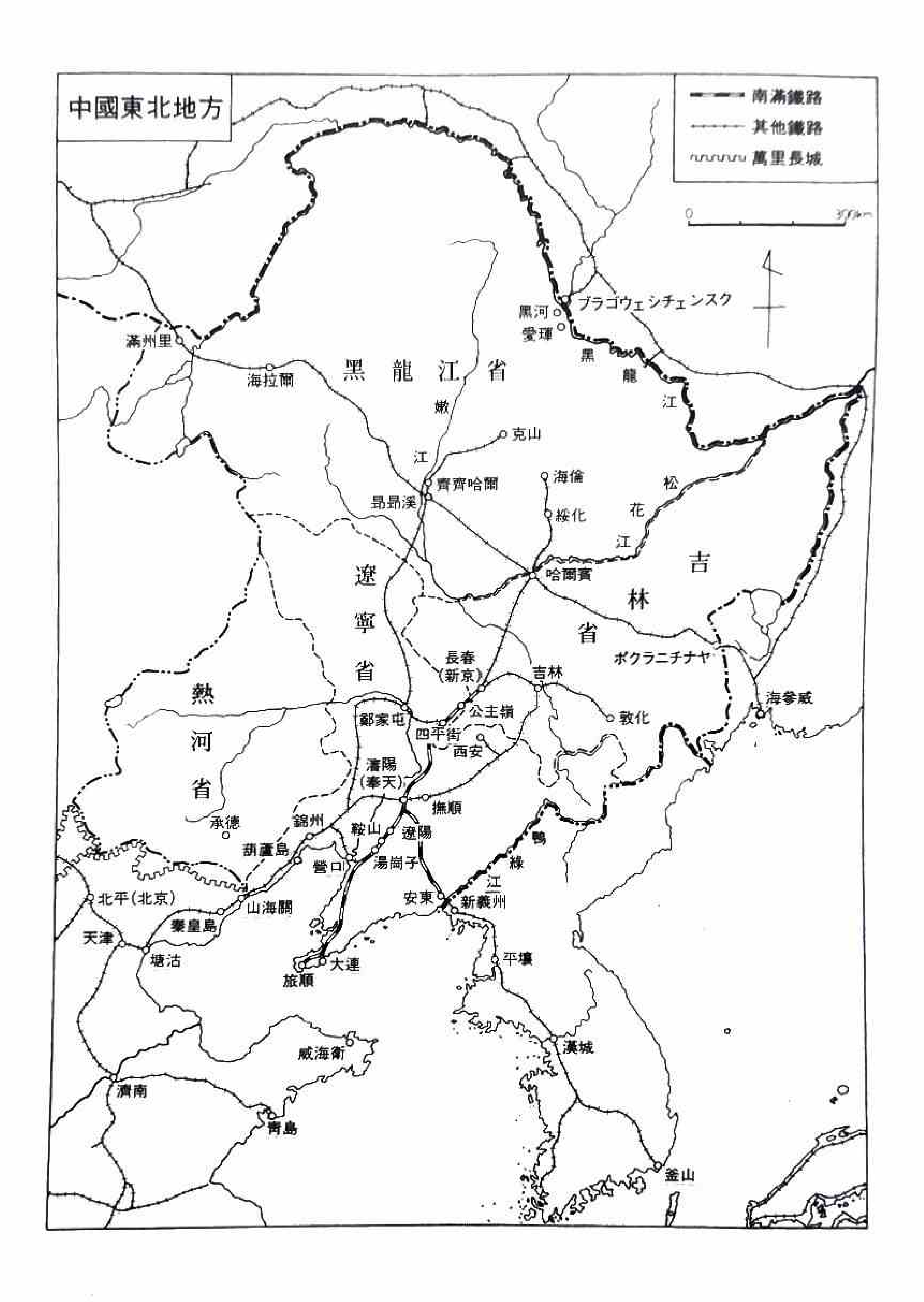
NHK採訪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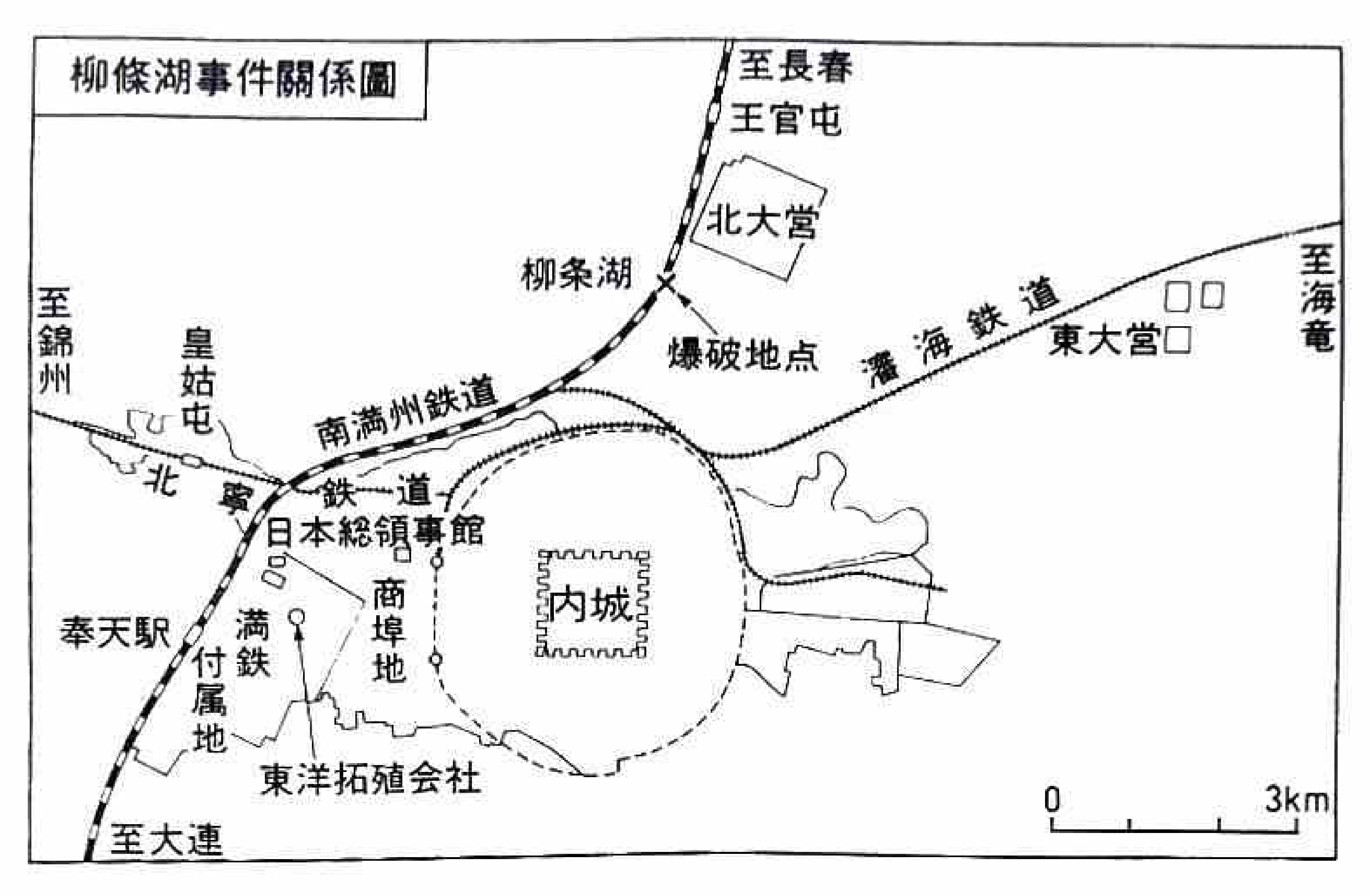
臼井勝美著　陳鵬仁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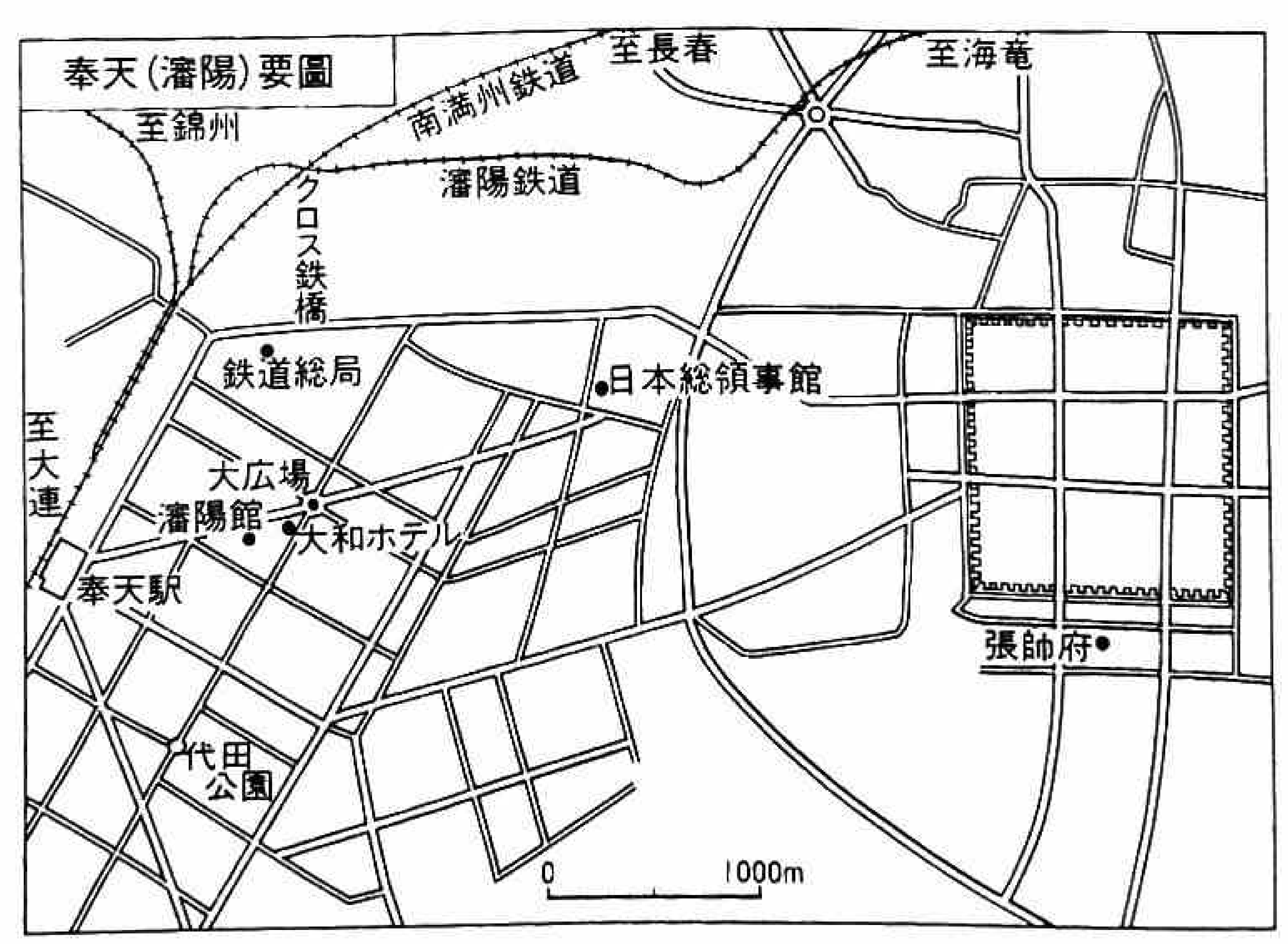
張學良與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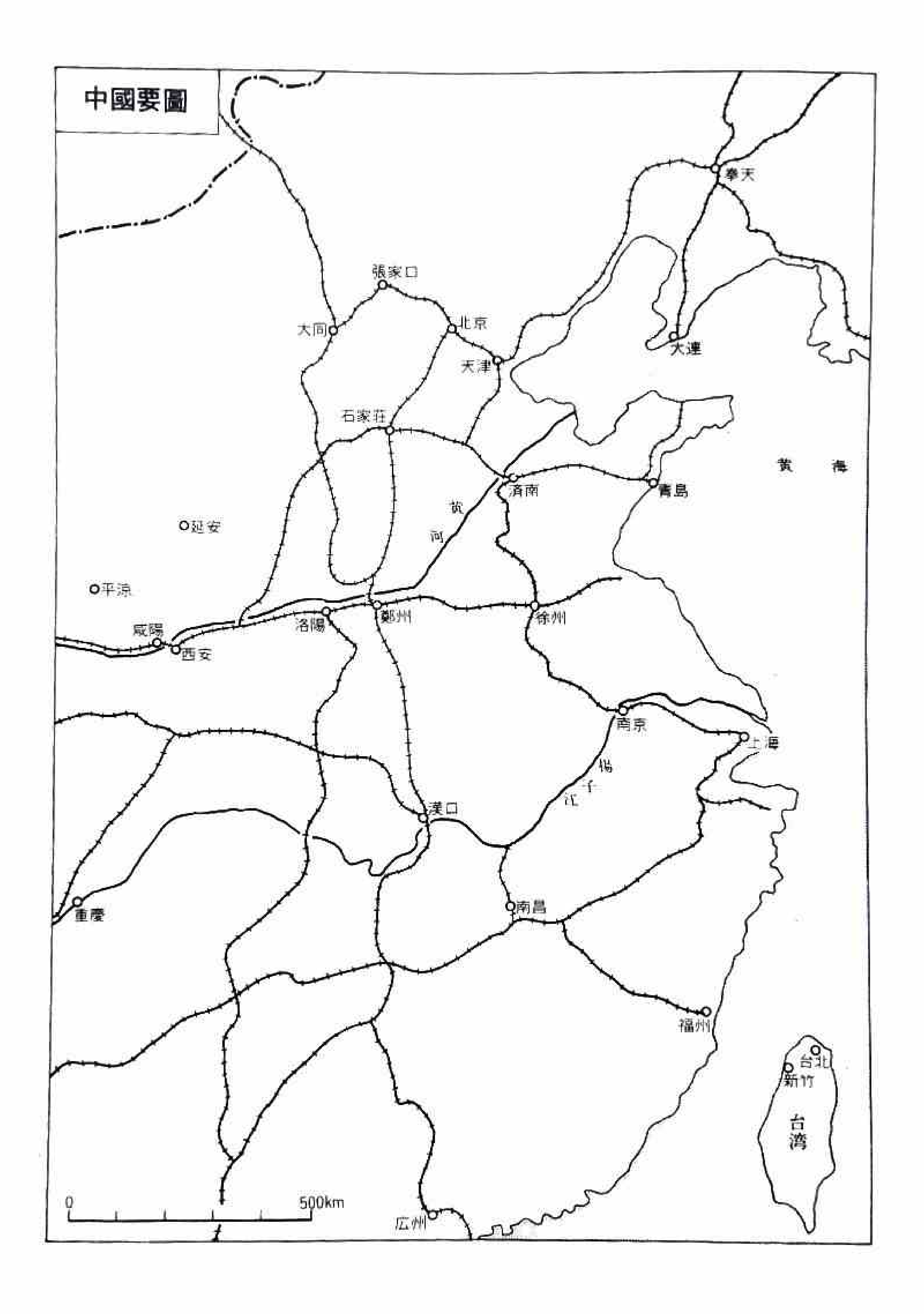
臼井勝美／著・陳鵬仁／譯




中國東北地方
南滿鐵路
其他鐵路
萬里長城
ブラゴウェシチェンスク
黑河
愛琿
滿州里
海拉爾
黑龍江省
嫩江
克山
齊齊哈爾
昂昂溪
海倫
綏化
松花江
哈爾賓
吉林省
黑龍江
遼寧省
熱河省
長春(新京)
吉林
ポクラニチナヤ
海參威
公主嶺
敦化
鄭家屯
四平街
西安
瀋陽(奉天)
撫順
承德
錦州
鞍山
遼陽
葫蘆島
營口
湯崗子
鴨綠江
北平(北京)
山海關
安東
新義州
秦皇島
天津
塘沽
平壤
旅順
大連
漢城
威海衛
濟南
青島
釜山


柳條湖事件關係圖
至長春
王官屯
北大営
柳条湖
爆破地点
瀋海鉄道
東大営
至海竜
至錦州
皇姑屯
南満州鉄道
北寧鉄道
日本総領事館
商埠地
内城
奉天駅
満鉄付属地
東洋拓殖会社
至大連
0
3km


奉天(瀋陽)要圖
至長春
至海竜
南満州鉄道
至錦州
瀋陽鉄道
クロス鉄橋
鉄道総局
日本総領事館
至大連
大広場
瀋陽館
大和ホテル
奉天駅
張帥府
代田公園
0
1000m


中國要圖
奉天
張家口
大同
北京
大連
天津
石家荘
黄海
済南
青島
黄河
延安
平涼
咸陽
西安
洛陽
鄭州
徐州
南京
上海
揚子江
漢口
重慶
南昌
福州
台北
新竹
台湾
0
500km
広州

譯者的話

《張學良對昭和史最後的證言》今改名《張學良與日本》一書，是以日本NHK採訪班和臼井勝美於一九九〇年在台北訪問張學良的紀錄作底子寫成的。這個訪問，曾經由NHK電視台播出；書於一九九一年八月一日，由角川書店出版。

對於此書的內容和觀點，譯者曾經透過一位朋友請問張學良先生有何意見，張先生表示這是日本人編寫的，他沒有什麼意見。

此書最大的問題是有關西安事變的部分。原作者除訪問張學良先生外，也訪問了好幾位大陸的人士。他們的看法和說法，或許有人不贊同，但爲存眞起見，譯者還是全部譯出，供研究現代史者參考。

原書還有松崎服一〈日本的大陸政策〉一文，譯者覺得此文不是頂重要，所以割愛。

本書譯文，第三章「九一八事變與『滿洲國』」，曾經以〈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爲題刊登於一九九〇年九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台灣日報》。

因爲是歷史叙述，而且是翻譯，故對書中一切人名，包括蔣中正先生，統統沿用原文，沒有特別加上尊稱。原文怎麼稱呼就怎麼寫。爲方便起見，年代都使用西曆。

最後，我要由衷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劉國瑞先生和林載爵先生幫我出版這本可能很有爭議的書。

陳鵬仁　一九九三、元、十九　陽明山

目次

第一章　張學良的登場

開場白

一九九〇年八月在台北

我從來沒穿過襯褲。就是年輕時在東北跟日本打仗的時候，嚴冬時也直接穿上褲子。穿襯褲，動作會遲鈍。……

我是個軍人。道地的軍人。東北的軍人。

笑容滿面說著話的張學良，表情突然嚴肅起來。回到軍人的臉了嗎？「東北」、「日本」這兩個名詞，似乎勾起張學良往年做爲軍人的沸騰的熱血。

我得悉張學良的消息，是三年前的事情。

「你知道張學良嗎？西安事變的……。據說，最近常在台北市內出現。」

這是在二次大戰以前就住在日本的某中國人家吃中飯時候的事。我聽到張學良的名字時，瞬間覺得不知所措。對我們而言，這個名字已經蒙在暗褐色的霧裡頭了。

「在教科書上的……張作霖[1]的兒子……監禁蔣介石的……他還在世，眞的嗎？」

這是我所有而率迫的感想。

「能不能採訪他？」

此時，我纔站在出發線。

張學良出生於一九〇一年（六月二日），今年九十歲，虛歲九十一。他是被關東

軍炸死的軍閥張作霖的長子，是後來監禁蔣介石，迫使「國共合作」之西安事變的主角。西安事變以後，他被剝奪自由，並過著半個世紀以上的禁閉生活。張學良坎坷的一生，他也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史最後的證人。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爲了打聽採訪張學良的可能性，我們飛往台北。在台北，我們尋找能幫我們聯絡張學良的人物。我們見到了以「高陽」爲筆名在台灣報紙撰寫歷史小說的先生。據說他爲著作張學良的傳記，正在搜集資料。會面的地點是專欄作家李嘉氏的寓所。李嘉與國民黨元老張群關係很深。

我們由高陽得悉張學良靜居北投，身體很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過著很清靜的餘年。我們向高陽試探採訪張學良的可能性；但高陽的結論是悲觀的。不錯，自一九七一年以還，在形式上張學良雖然是自由的，卻不能隨便與大衆媒體接觸，即台灣的政治情勢還不許張學良公開發表意見。不得已，我們只有與高陽約定交換資訊和提供資料而回。

九十歲生日會

台灣的政治情勢出現很大的變化。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七日的《中國時報》報導

說，慶祝張學良九十歲生日的聚會將於六月一日在圓山飯店舉行。報導說，其主辦者是國民黨大老張群，行政院長郝柏村是贊助人。如果這是事實，張學良將是五十四年來首次現身大衆面前，同時可能事實上恢復名譽。於是我們趕緊飛往台北。

該年六月一日，爲採訪這個五十四年來的悲劇英雄，幾百個大衆傳播工作者擠在圓山大飯店，慶生會前的會場氣氛顯得非常特別。會場大廳懸掛著故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女士的賀電、故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的花圈，和李登輝總統所贈紅地金字「壽」的大匾額。行政院長郝柏村、中國國民黨祕書長宋楚瑜、總統府國策顧問張繼正、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等等，代表今日台灣的政治家和文化人都在場。

與坐在輪椅的主辦者張群，張學良及其夫人趙一狄一露面，記者便包圍著他們，拚命拍照。

代表主辦單位，張群致詞說：

長年來我們每年爲張學良先生私下慶祝生日，今年因爲是他的九十歲，所以與大家盛大慶祝。張學良先生與我是六十年來的朋友。我倆在東北、華北、華中，爲抗日戰爭、剿共戰爭共生死和苦難。今日讓我們來慶祝他的生日。

張群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是蔣介石的親

信；這半個世紀以來，在物質精神方面，他一直支持張學良（張群於這個慶生會半年後的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似很滿意於目睹張學良恢復名譽，而悄悄地與世長辭，享年一百零一）。

繼張群之後，張學良這樣說：

依聖經的話，我是一個罪人，也是罪人的罪魁，能在今天看到如此多人，眞是萬分感動，我何德何能得到諸位親友祝壽，心裡感到慚愧得很。……我老了，但還未全聾，眼力不好，但還看得到。國家民族如果需要我，我一定會秉持如年輕時的情懷，全心效力貢獻自己。

虛幻的英雄張學良宏亮的聲音，贏得會場暴風雨般的掌聲。

張學良九十歲的慶生會，所以能夠這樣公開舉行，並恢復名譽，實與台灣政治情勢的變化有很大關係。這種趨勢，自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去世，台灣出身的李登輝出任總統以後更加顯著。這在解除戒嚴令、資深中央民意代表決定退休、實施自由選舉等等一連串的民主化，以及對中國大陸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轉變層面也可以看得出來。尤其回大陸探親、旅行的盛行更是明顯。

張學良恢復名譽，應該由此種政治情勢的潮流中去了解才不至於落空，我們甚至感覺，這是欲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國民政府對大陸的一種「信號」。

如上所述，張學良身邊政治情勢的變化，給我們實現採訪張學良的一線希望。而此次慶生會，給我們與張學良接觸的不二機會。在這場慶生會，以往不大爲人所知的張學良親信和親戚也出席了；這包括曾經被喻爲三張一王（張學良、張群、張大千和王新衡）之張學良的老朋友，王新衡的長子王一方。

王一方自幼出入張學良公館，王新衡去世以後，他替在美國的張學良的兒女照顧張學良。由於王一方與NHK在台灣的Coordinator朱慧姬女士是高爾夫球的球友，這個關係促使我們實現採訪張學良更進一步。我們拜託王一方把我們寫給張學良的信交給張學良，並等著王一方的消息。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五日，朱慧姬女士聯絡說，張學良願意接受我們訪問。於是我們於六月十七日，在王一方公館對張學良作第一次訪問。張學良說：「我因爲很想對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年輕人說說話，才同意接受NHK訪問。」並花了大約一個小時，從他對其父親的回憶，九一八事變的種種，以及對年輕人的希望，一氣呵成說完。

張學良正確無比的記憶力，及其令人折服的談話技巧，眞是令人欽佩。但要談完他的人生，時間實在太有限了。因此我們與他再度交涉，希望再作一次時間更長的正式訪問，並於八月間，由當時的磯村尙德NHK特別主幹和櫻美大學的臼井勝美教授

做長時間的訪問。

八月三日，我們在台北一家旅館等著張學良。下午三時四十分，過了約定的時間十分鐘。

「據說，午飯後張先生要午睡大約兩個小時。從北投的公館坐車來要將近一個小時，所以大概快到了吧。」朱慧姬女士的話剛說完，一部灰色的坡爾坡車子開到門口。我們看到車子裡頭坐了一位戴著淡顏色太陽眼鏡的老先生，是張學良。從車子下來走到旅館大廳的張學良，其活潑腳步簡直不像虛歲九十的老先生。

自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以來，從歷史舞台失去蹤影的張學良，對中國人尤其是大陸的中國人，是備受尊敬的愛國英雄。西安事變可以說是中日戰爭轉捩點的大事件，對犧牲自己阻止國民黨和共產黨內戰，從而促使「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張學良，中國共產黨的評價非常高。但在台灣長期過著軟禁生活的張學良，對大陸的中國人而言，一直是近而遠的幻想中的英雄。

張學良的青年時代

乃父張作霖

張學良出生於一九〇一年，是在滿洲即中國東北發跡的綠林頭目張作霖的長子。張學良自己說他出生於遼寧省海城縣，但也有人說是遼寧省合安縣桑樹鄉，說法不一，實際情況並不清楚。

可能由於張學良十一歲時就失去母親，所以對其父親親愛之情尤其濃郁。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是迷信，但我與我父親好像有特別的關係。我出生那天，父親首次戰勝；父親以後飛黃騰達，以此為開端。因此父親非常喜歡我。對父親來說，我真是千金之子。

爾後，張作霖歸順清廷，作「新民府巡警」的軍官，一九〇三年升任大隊長。以後步步高升，一九〇九年出任奉天省巡防營前路統領，統率步兵、騎兵七個大隊，共三千五百人。

不久發生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當時的東三省總督趙爾巽以巡防營部隊，欲徹底鎮壓革命派。這時張作霖率領七個大隊趕到奉天，對趙爾巽表示願意爲其盡力。於是趙爾巽任命張作霖爲巡防營中路統領，並爲張作霖增加八個大隊的兵力。所以張作霖統率著十五個大隊。

此時張作霖鎮壓革命派，反對共和，並追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而被袁任命爲第二十七師師長。一九一六年，用謀略搞垮奉天將軍段芝貴，就任盛武將軍、奉天軍務督理兼巡按使，至此，張作霖集奉天省軍權於一身。時張學良十五歲。爾後，張作霖的勢力又擴張到吉林、黑龍江兩省，從而建立了強有力的奉天軍閥。

我非常尊敬我父親。尊敬的同時，我覺得家父擁有非凡的才能。他是個極其寬大的人。

現在我舉一個例子。有一個人曾想暗殺家父。此人很魯莽，後來被抓到了。家父問他為什麼有暗殺之圖。這個人答說：「因為聽說你和張勳想復辟。」家父說：「你的想法錯了，為錯誤的事丟掉生命太可惜。」釋放了他。家父對他說：「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與張勳從事復辟，你再來殺我好了。」父親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非常尊敬我父親，並覺得他是有非凡才能的人物。



壽宴上坐在花團錦簇之間的張學良。



張作霖。左右爲張學良之弟。



在台灣「小人國」參觀。
左起：張學良、張群、趙一荻。

與洋人的接觸

爲使張學良將來成爲奉天軍閥的繼承者，張作霖盡量授張學良以英才教育。請幾位家庭教師教授傳統的中國學問外，也由奉天督軍署英文科長徐名東教他英文。

——「先生是個怎樣的小孩？淘氣嗎？還是……？」

是的，那時候我很調皮。我沒上學校，是請來老師在家裡讀書的，老師對父親說：「這小孩實在無可救藥。」由此可見我如何調皮。當時，我身邊的人都叫我花花公子。我家很富裕，我有青年的思想，那時候我的一步等於別人的兩步；因此我想利用這種條件和父親的關係在社會上創立一些事業。

青年時代的張學良出入奉天的YMCA（基督教青年會），與洋人交往。透過他的英文老師普拉特（Joseph Platt），張學良與YMCA建立了關係。與洋人的交往，曾予青年張學良的思想很大影響。

年輕時候我很喜歡運動，我是奉天「穆天」俱樂部和網球俱樂部的會員。會員都是外國人，中國人只有我。十七、八歲時我非常喜歡打網球，惟因我家的運動場太小，所以我參加了俱樂部。由此我與洋人接觸的機會逐漸增加。我的英文老師普拉特是奉天ＹＭＣＡ的總幹事，因而我與ＹＭＣＡ的關係愈來愈深，我常去ＹＭＣＡ打網球和乒乓球。

那時我很想當醫生。奉天有南滿洲醫科大學，有一個朋友是那裡的學生，故我常到那裡玩。我想進南滿洲醫科大學，將來作醫生，但父親沒有同意。

因而我想逃往美國去念美國的大學。我既有錢，美國朋友也非常贊成我去美國，並答應要幫我忙。當時影響我的一個朋友叫做陳英。他留學過德國，曾任奉天省測量局局長和測量學校校長。我對他透露我想去美國的計畫，他說：「你真笨。你父親不是要你當軍人嗎？你這樣做你父親一定會很傷心。我教你一個好方法，騙你父親說你要到美國去學軍事。這樣你父親可能會贊成。到了美國以後，你幹什麼他也不會知道。」

於是我告訴父親，我想到美國去學軍事，父親卻答說：「夠了，你學不來。你想丟我的臉嗎？想幹軍人？就是從美國回來，你也幹不了什麼事。」

父親希望我在政治上或者軍事上繼承他。當時，作夢我也沒想過要幹軍人。現在

說起來雖然是一場笑話，但那時著實我是想做救人的醫生的，結果卻做了殺人的軍人。

軍人的第一步，講武學堂

一九一九年三月，張學良進了乃父張作霖創辦於奉天、專門培養軍事幹部的學校東三省講武學堂第一期，踏上作爲軍人的第一步。

十九歲進入講武學堂的張學良，在那裡邂逅了戰術教官郭松齡[2]。郭松齡年輕時參加中國革命同盟會，從事過反清革命運動，是畢業於北京將校研究所和陸軍大學的人物。他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戰術學造詣很深，故張學良很尊敬郭松齡。與郭松齡相識，曾予張學良的思想及其日後的命運以很大影響。

我在講武學堂開始讀書，那時我完全是個無名小卒。當時在講武學堂的幾乎都是軍人，我才十九歲，所以其他人都比我大。可是第一次月考和第二次月考，我都考第一名，期末考我也照樣是第一名。因而全校譁然。同學們說，我因父親關係，與校方串通，才考第一名。

有一天，教育長突然來到講武學堂我的教室，將每個學生的座位打散和隔開，臨

時出四個題目測驗我們。結果只有我一個能夠解答這四個試題。於是教育長對同學們宣稱：「你看，你們沒有一個人能完全解答這些試題。只有張學良全答對了。」說實話，我並沒有作弊。由此，我在講武學堂的同學與教官之間遂變成稍有名氣的人。

關於張學良腦筋好，當時在講武學堂與張學良同班同學，後來擔任張學良副官的陳兆麟（九十二歲，目前住在西安）在我們採訪時這樣說：

張學良非常聰明，每次月考都考第一名。由於他成績超群，所以擔任區隊長。有一次他對我說：『老陳，我記得我們全班同學的名字、出生地和別號。』我說我不相信，因而他說：『不相信，你可以考考我。』於是我問他大約二十個人的名字，但他都一一回答。他竟背了三百名以上講武學堂學生的姓名、出生地和別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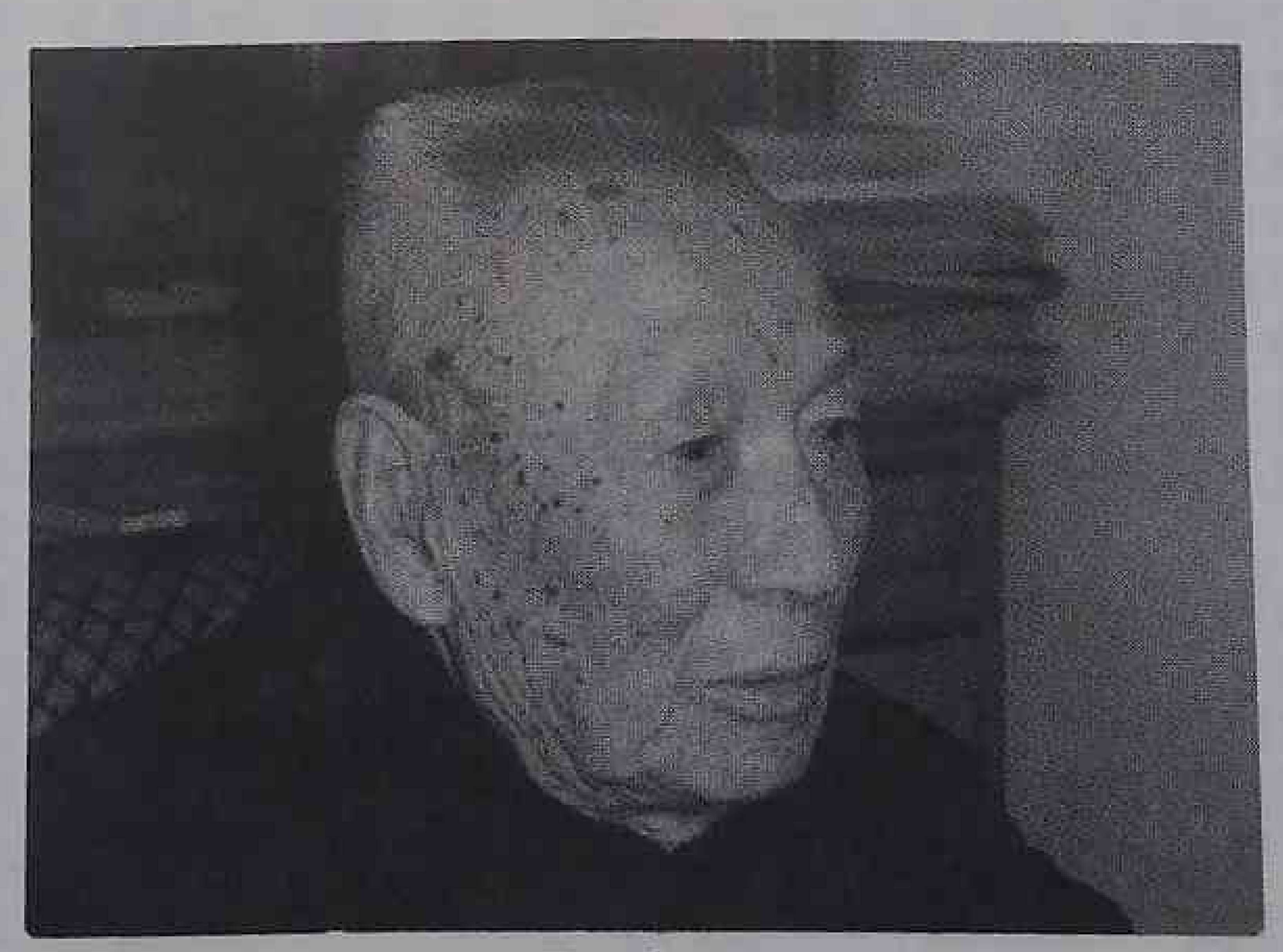
張學良在講武學堂的成績非常優秀之事，爲張作霖的參謀總長兼第二十七師師長張作相[3]得悉。

張作相得悉我在講武學堂的風評，而另眼相看，非常提拔我，他準備請我去。當時我因為年紀輕，所以人家對我好我便高興得不得了。我進講武學堂以後，就擔任



青年時代的張學良。

陳兆麟



劉鳴九

父親的衛兵隊隊長。但當時我才十九歲，又是講武學堂的學生，因此衛兵隊隊長只是個空頭銜而已。可是張作相卻任命講武學堂還沒畢業的我為第三混成旅第二團團長。

一九二〇年，畢業於講武學堂的張學良，被任命爲巡閱使署衛隊旅旅長，張學良選拔教官郭松齡擔任他的參謀長。是年秋天討伐吉林、黑龍江的土匪建功，張學良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升任奉天軍第三混成旅旅長。

軍閥戰爭與郭松齡事件

張學良開始當軍人的一九二〇年年初，割據各地的有力軍閥爲獲得中央霸權而互相激烈對立。中國因爲軍閥之間的戰爭，陷於極端混亂的局面。爲袁世凱政權撐腰的北洋軍閥，於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死亡以後，分裂成以段祺瑞[4]爲首的安徽派和以馮國璋[5]爲首領的直隸派，加深對立。此後，段祺瑞和馮國璋爲爭得北京政府實權，鬥得更厲害。失去袁世凱這個強有力支柱的這兩個派，皆沒有統一全國之能力，由之中小軍閥割據各地，一再地出現抗爭。

一九二〇年七月，勢力日漸強大的直隸軍閥聯合張作霖向安徽軍閥挑戰。這次直皖戰爭，直、奉聯軍獲得勝利，北京政府實權由直隸掌握。由於掌握了實權的直隸派

在軍事、財政方面相繼採取加強實力的政策，張作霖懼其坐大，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向直隸派開戰。但奉天軍在北京近郊的長辛店敗於得到英美支援且擁有現代裝備的直隸軍，撤回奉天，是爲所謂第一次奉直戰爭。

第一次奉直戰爭時，張學良率領東路軍第二梯隊參加了戰鬥，在奉天軍戰敗的過程中，張學良部與直隸軍精英部隊吳佩孚部交戰，並在山海關阻止了直隸軍的進攻。經過這次戰爭，張學良在奉天軍閥內乃爲大家所特別注目。張作霖回到奉天，著手重建奉天軍，並任命張學良爲東三省陸軍整理處參謀長，令其負責奉天軍的訓練與重編。一九二四年，張學良就任當時剛成立的東北空軍司令。

那時，父親手上的軍權，除軍隊的指揮與訓練外，大部分落在張作相手裡。可是有一次，我的軍中同事對父親提出建議說，希望父親將其軍權交給某人。而這個某人竟是我。

當時我完全不知道有這回事。我在奉天整理處祇不過是個旅長，結果父親卻任命我為參謀總長。這時我年紀還輕，什麼也不懂，但權力卻降落在我身上。

如此這般，奉天的軍權逐漸落在我手中。因此我開始整理和改革奉天軍，並調動人事，我由此掌握了奉天的軍權。爾後發生第二次奉直戰爭，奉軍勝利。由於此次勝

利，我更上了一層樓。但這個勝利不是我的功勞，我沒有這個能力，是郭松齡支持我所致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爆發第二次奉直戰爭。反對曹錕賄選和武力統一的奉天派、安徽派，加上孫中山的廣東政府，對直隸派展開大規模武力抗爭。

第二次奉直戰爭，張學良統率奉軍第三軍參戰，以奉直兩軍衝突最激烈的山海關爲據點，在最前線擔任總指揮，以很巧妙的戰術殲滅了直隸軍主力。由於在山海關戰敗，以及直隸派的馮玉祥[5]突然造反占領北京，曹錕被監禁，直隸遂全面潰敗，吳佩孚逃至海上。第二次奉直戰爭，奉派勝利，北京政府便由奉天派、安徽派和國民軍三派聯合掌權。

因山海關的戰功，張學良和郭松齡的聲譽更加提高，奉軍的基礎也更加鞏固。張作霖任命親信出任直隸、山東、安徽、江蘇各省都督，其勢力擴大到長江流域。

但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發生了張學良終生難忘的事件。直隸軍閥馮玉祥欲再度向張作霖挑戰時，張學良最信賴的副司令郭松齡背叛張作霖，起來叛變。

第二次奉直戰爭時，郭松齡也違背過我的命令。他與我的同事大吵大鬧而突然違

回軍隊，不想打仗。我去找郭松齡，在一個很寧靜的院子裡發現他坐在一張長凳上。我對他說：「從前你是我的老師，我是你的學生。但現在情況完全兩樣，我是你的長官，你是我的部下。你如果要採取你所想的行動，你必須先殺我；現在我沒有任何武器，你有槍。你如果想叛亂，那是錯誤的。你或許想帶走軍隊，但我是你的長官，我不許你這樣做。如果不服從我的命令，你必須殺掉我。你到底要不要服從命令，如果不服從命令，就在這裡殺死我。」他開始哭，我問他：「你為什麼哭？」他說：「我很難過，我錯了。對不起。」

這時，我覺得將來總有一天他還是會違背命令。但不管誰起來叛變，我都自信能鎮壓下去，他們的叛變是不會成功的。可是郭松齡卻真的起來叛變了。當時我非常痛苦，我覺得我很對不起東北人和我的部下。因為發生叛變，為東北人帶來很大的災難，我的部下也犧牲很多。我雖然喜歡郭松齡，但他第一次違背命令時，我實在不應該原諒他。因為我寬恕了他，結果又讓他起來叛變，而犧牲許多人。

郭松齡叛變前曾與馮玉祥聯絡，並與國民軍合作。郭松齡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自稱東北國民軍總司令，列舉張作霖的罪狀，發表要求其下野的通電，並將其部隊改名為東北國民軍，開始北進。

郭松齡部一出山海關便勢如破竹，相繼占領錦州、白旗堡、新民等地，直向奉天。張作霖突然遭遇到郭松齡叛變，進擊措手無策，奉天軍陷於混亂，奉天面臨了危機。

當時擔任張學良祕書的劉鳴九（九十二歲，現住瀋陽），對那個時候的情況這樣回憶說：

那時奉天軍的精英部隊在張學良手中。張學良很信賴郭松齡，故准許郭松齡指揮這些部隊。郭松齡乘張學良回到奉天時，召集部隊於冀東（河北省東部），對奉天造反，採取要打倒張作霖的行動。張學良想會見郭松齡，乘船到青島尋找郭松齡，但郭不在那裡。郭松齡以東北的精英部隊一口氣進攻到錦州。張學良回到奉天，張作霖便大大責備張學良說：「你那麼信用和重用郭松齡，結果他背叛了我。」

張學良在奉天附近設立司令部，以迎擊郭松齡，但我們並沒有打敗對方的把握。並且郭松齡的部隊有幾個絕對服從他命令的團長和旅長，下級官兵則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原來這是張學良的軍隊，所以要與其打仗心裡實在難安。

而挽救面臨絕境之奉天軍的是日本的關東軍。深怕北京政府淪入國民軍之手的關

東軍，終於出來支援張作霖並公然干涉這個事件。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⑦，以奉天軍與郭松齡戰鬥，南滿鐵路可能遭到破壞為口實，對雙方提出警告，禁止其在南滿鐵路三十公里以內交戰。

奉天是滿鐵線上的重要都市。由於關東軍的警告，郭松齡便不能攻擊奉天，張作霖於是獲得重建態勢的時間，由吉林和黑龍江調來部隊對付郭松齡軍。結果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吳俊陞的第十四騎兵旅攻下郭軍司令部白旗堡，翌（二十四）日，郭松齡被捕。

> 郭松齡攜其夫人逃亡，但沒多久便在遼東縣被捕。他一被逮捕，張作霖即派遣衛兵團團長要其護送前來。接到此項電報的張學良，則要我拍發將郭松齡送到靈王廟的電報。張學良想令郭松齡逃亡海外。我說：『大元帥（張作霖）因為此次事件非常生氣，並責備您。現在如果讓郭松齡跑掉，可不得了。』張學良說：『沒關係，給父親打假電報好了。』要我寫電文。但這分電報發出之前，負責護送的團長卻來了電報：「依大元帥命令，郭松齡已經處刑了。」張學良接到這個電報，表情顯得非常悲傷。（劉鳴九訪問談話）

少帥

張作霖插足北京，稱陸軍元帥，周圍的人便稱張學良爲少帥。極其出色的青年軍官張學良，在北京社交界立刻成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胞弟，當時與張學良有交往的愛新覺羅溥傑對那時候的張學良回憶說：

那是張作霖剛來到北京時候的事情。我的朋友陳貫一在北京飯店把張學良介紹給我。他穿著很瀟洒的西裝，與我想像中的軍閥形象完全不一樣。他的夫人也特別漂亮，她著旗袍，抱著一隻狗。

這是我第一次與張學良見面。從此以後，我們常有來往；我們的交往繼續到奉天軍撤回東北。張學良是掛牌的花花公子。在北京，許多人叫他張少帥，想跟他見面。

他的想法很前進，他跟以往的軍閥大不相同，且很愛國。他根本不贊成日本的行動。日軍出兵山東侵略濟南時，他極其憤慨地說：「你看！日本人這樣殺中國人，如此對待中國人！」張學良是我交往的唯一軍閥，而他的爲人，我覺得非常意外。

作爲奉天軍閥的最重要指揮官，張學良參與了直皖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和郭松

齡事件等軍閥戰爭，並忠實地實行父親張作霖所推動的政策。從這種行動來看，他可以說是封建軍閥的一分子。

但張學良卻是與乃父張作霖那種舊式軍閥領導者截然不同的新式領導者。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後他逐漸明顯地討厭內戰，以及他對民衆的苦難在言行上同情看得出來。

張學良的這種思想，有人認爲係來自他青年時代與普拉特等洋人的交往，以及受到基督教青年會中前進的中國人的影響所造成。

我受了上海YMCA總幹事余日章的影響，我十七八歲的時候，余日章來奉天講演「體、德、育」三育。每次我都去聽講。講演完了之後，他跟我談許多話。

有一次他說：「你將來一定會做社會領袖，所以有些話我要給你講清楚。」而對我講了三件事。第一，將來無論做什麼事，一定要遵從輿論；第二，不要操縱輿論；第三不可以說謊。我受他影響，因而終生忠實地實行他所說的話。無論那一個國家，說謊操縱輿論，欺騙自己國民為所欲者，沒有好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先生年輕時候最受其影響的人物是誰？」

各位知道不知道張伯苓[8]先生？這位先生當時在南開大學。那時南開還不是大學，張先生是該校的校長。我去聽過他的演講。那天張伯苓先生演講的題目是「有我在，中國不會亡！」我對這個題目勃然大怒，我幾乎要對張先生這樣怒說：「有我在，中國不會亡是什麼意思？你以為你是老幾？」我很容易發脾氣，嘴巴又壞，我覺得很不是味道。但因張先生的最後一句話，我才明瞭我會錯意了。張先生說：「人人要自強，應有只要我在，中國不會亡的氣概，不管人家怎麼講，我要有這樣做的信念。」

張先生的話，非常感動我。我是一個很容易受人家影響的人。我非常感動，並下了這樣的決心：目前我不過是在父親強有力庇護下的有錢少爺，但我不能老扮演有錢人少爺的角色。我必須為國家、社會做些事。

受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很大影響的張學良，開始認眞思考應該如何實現中國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統一。不過，做爲奉天軍閥的領導者，張學良也確有保全自己政治地盤的傾向。

但與以往的軍閥不同，張學良擁有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的強烈意識，這一點對理

解張學良日後的政治行動非常重要。自一九二〇年代中期以後，經常與張學良一同行動的盧廣績，就張學良的思想特徵這樣說：

張學良與張作霖根本不同，張學良著重整個國家，不希望有內戰。當時張作霖還有統一中國的野心，所以一天到晚打仗。但張學良不一樣。中國因爲軍閥互相爭權，因而內戰不斷。張學良則以爲，中國人皆爲弟兄，中國和平始能對付外國。這一點，我覺得張學良的想法非常開明。

訪問日本

一九二一年秋天，張學良奉父親之命訪問日本。張作霖認爲，令張學良參觀日軍的軍事演習，詳細觀察日軍的實力，對張學良將來經營東三省定有極大幫助。張學良率領東北軍的高級軍官往訪日本，妹妹冠英和弟弟學銘也同行。

如果可能，我很想再到日本去看看。也許年紀大了的關係吧，我更這樣想。新的日本是怎樣的一個景象？我真想親眼看看。

我第一次到日本，是我二十歲的時候。當時我戴著中國的大勳章，因而發生一件滿有趣的事。那時昭和天皇還是皇太子，他們竟把我誤為皇太子。

第一次弄錯是參觀軍事演習的時候。跟著長官後面走著，軍樂隊把我誤為日本皇太子而奏了日本的國歌。

第二次是前往皇宮的時候。那時晉見了皇后，會見之後在外邊簽名時，我聽說皇后曾望著我這邊問道：「那第三個人是誰？」

後來我才知道皇后問我是誰的理由，因為我與當時的皇太子，日後的昭和天皇太像了。

當時在皇宮我也見了昭和天皇，記得他還是皇太子。他還給我勳章呢。

事實上，看看年輕時候張學良的照片，與皇太子（日後的昭和天皇）眞是像得不得了。影片中有張學良閱兵的鏡頭，實在跟昭和天皇太像了。又，他們兩個人都出生於一九〇一年。

日本人雖然親切而有禮貌，但我對日本人很不滿。因為他們對中國人常常要用權力來制伏，喜歡炫耀日本有這樣那樣強大的勢力。我是一個能毫無懼怕地抵抗好炫耀勢力的人；因此，訪問日本回國以後的我，對日本的印象並不好。

──「當時，中國人參觀日本的軍事演習好像是一種時尚。中國的領導者之中，也有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者。這些人之中，有些人認爲日軍很強，而對日本有恐怖之心。先生有沒有這種情況？」

我對日本一點恐怖心也沒有。日軍的演習非常成功，我很佩服，但我並不害怕。除演習以外，日本也讓我參觀了武器倉庫和兵工廠。我明白他們的目的在嚇唬我。也去過吳海軍軍港，在那裡我看到金剛[9]、伊勢[10]、陸奧[11]等軍艦。大砲很大。軍艦的砲身是很難做的，目睹倉庫裡一大排的砲身時，我這樣想著：「你們為什麼要讓我看這些玩意呢？我知道日本的軍事力量非常強大，何必這樣特意炫耀？」

當時我很年輕，因此不但不害怕，而且引起反感。我在心裡這樣喊叫著：「你們想威脅我嗎？用權力來威脅我，我是不怕的。」

所以結束日本訪問以後，我對日本的印象並不佳。

此次訪問日本，張學良目睹了強大的日本軍事力量，而爲對抗意圖插足中國大陸的日本，張學良認爲奉天軍最重要的課題是它的現代化。回國之後，張學良對張作霖

提議仿傚日軍推動軍事的現代化，得張作霖採納。

在中國大陸所出版的張學良傳記中，有的說經過此次日本訪問，張學良感覺日本是東北的威脅，因而奠定其抗日決心和民族的團結意識。

總而言之，軍事大國日本是青年張學良訪問日本所得到的印象和經驗；而這，決定了日後張學良的日本觀。

炸死張作霖事件與張學良

統一中國．北伐

自辛亥革命到第二次革命，以至在廣州組織軍政府以維護共和的護法戰爭，以三民主義爲理想的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經過種種波折以後，於一九二一年成立第二次廣東政府，與北京的軍閥政府對抗。

孫中山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開於廣州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了「聯蘇、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成立「國共合作」[12]。從此以後，國民政府爲中國的統一開始採取具體措施。對南方這種新動向，張學良頗具好感。

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前，我跟他見過一次面，非常佩服他所說的話。孫先生腦筋很好；我與他見面是在他病臥床上之時，孫先生讓我坐在他的床邊，對我說：「你們東北位於紅白兩帝國主義中間，所以你們東北青年的責任特別大。」孫先生的話很感動我。因而我對國民政府抱著很大的期望，因為我盼望中國能夠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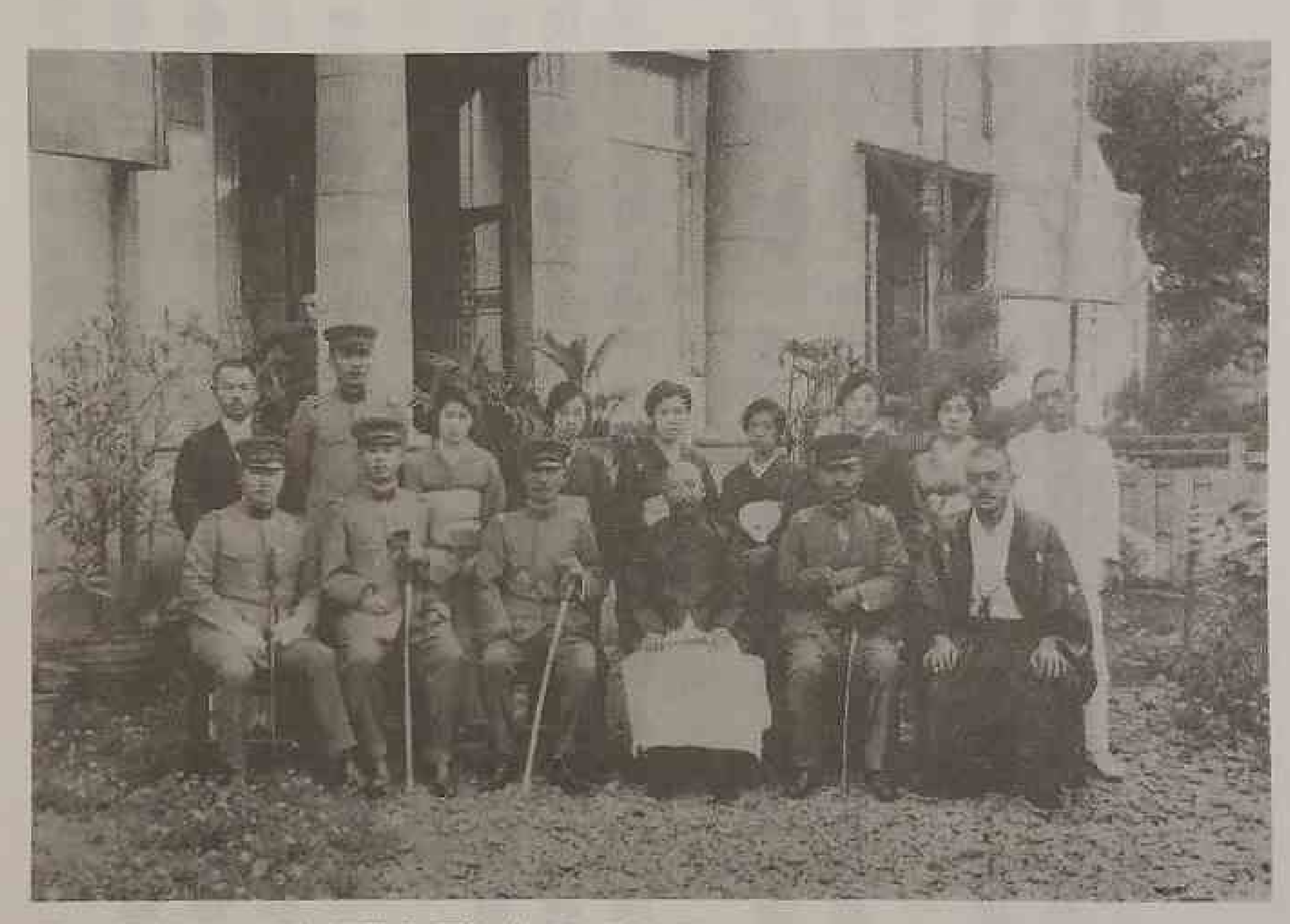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蔣介石成爲國民政府的新領導者。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蔣介石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打倒帝國主義和賣國軍閥，建設人民的統一政府」爲目的，開始北伐。北伐軍擊敗軍閥，先後占領長沙、武漢、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13]。

僅僅九個月，北閥軍便到達長江一帶，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蘇九省進入國民政府統治之下。一九二六年九月，馮玉祥參加國民革命軍，占領陝西。

面對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張作霖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組織軍閥的聯軍安國軍，並就任安國軍總司令，但安國軍未能阻止北伐軍的進擊。張作霖撤退到長江以北，統一了北方軍政，組織安國軍政府，自任陸海軍大元帥。



溥傑



張作霖與日本軍事顧問合攝於奉天特務機關前。
前排右起：町野武馬、本庄繁、張作霖，其左爲儀我誠也。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實行全面清黨，上海總工會赤色工人糾察隊被國民革命軍駐軍白崇禧部繳械。

一九二八年四月，曾經一時下野的蔣介石又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重開北伐序幕。此時，張作霖立刻在北京召集軍事會議，決定迎擊。張作霖以日軍爲後盾，欲久留北京。此時，日本支援張作霖，干涉北伐，爲阻止北伐軍進攻北京，三度出兵山東，一九二八年六月占領濟南，發生所謂濟南事件[13]。

對於以日本爲後盾，準備與北伐軍一戰的張作霖，張學良是作怎樣的看法呢？

當時，我為父親的事非常煩惱，因為我反對父親搞內戰。故我緊迫問著父親：「現在我們打這場戰爭有什麼意義？我們為什麼要打這個戰爭？」我在河南省路上看到許多走投無路的人，覺得非常可憐。於是我流著眼淚喊說：「這是怎麼回事？這是為什麼？」當時人民那樣痛苦，完全是內戰所致。

張作霖雖然有日本支持，還是未能阻止北伐軍。日本深怕張作霖完全戰敗於北伐軍，國民政府的勢力直接及於東北，遂勸告張作霖撤回奉天。一直堅持久留北京的張作霖，終於接受日本的勸告，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乘火車離開北京。

張作霖被炸死

瀋陽皇姑屯附近的交差鐵橋，這是張作霖所乘火車被炸的地點。

當時爲荒地的這個附近，現今變成市街，住宅、工廠林立，腳踏車車台上裝載著許多東西的人群來來去去。但鐵橋還遺留著當時的痕跡，橋腳的一部分仍舊是當日的石頭結構；鐵橋旁邊樹立著用混凝土作的「張作霖爆殺地點」的紀念碑。事件當時，上面是南滿鐵路，下面是聯結北京與奉天的京奉線。目前，鐵橋上面是聯結瀋陽與長春、哈爾濱幹線，下面成爲地方的鐵路。

地方線大部分是貨物列車，穿過這座鐵橋的旅客列車一天大約只有四班。從前的南滿鐵路兩旁，還有關東軍的看守小屋和戰壕，而看守小屋現在還被利用爲住宅，戰壕則成爲小孩們遊玩的場所。

關東軍將炸藥安置於上面的鐵橋部分，架設導電線於距南方大約兩百公尺處的看守小屋，在那裡裝設了起爆開關。從來自各車站的情報，事先知道張作霖所坐的車輛剛剛通過鐵橋正下面時按了開關；因此，張作霖所乘車輛被炸燬，並被塌下來的鐵橋壓碎。

發生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炸死張作霖事件，是對張學良以及日後的中日關係

史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

這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15]大佐（陸軍士官學校十五期）所策畫的事件。河本之意爲暗殺不完全聽命日本的張作霖，以此爲契機採取軍事行動，一口氣由關東軍占領南滿洲。

這是河本自己所說的，故應該是事實。但，這到底是河本的單獨行爲，還是關東軍首腦也有關係，至今仍有疑問。根據河本的說法，河本事先曾向有關人士透露，所以關東軍的某些人應當知道這個計畫才對。事實上，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16]大將也想暗殺張作霖；幾乎是同時，村岡曾派鈴木數馬參謀前往北京，與天津軍聯絡，欲暗殺張作霖。

得知這個事實的河本，認爲事件必須成爲武力占領南滿洲的契機，否則毫無意義，所以要在張作霖的根據地奉天暗殺張作霖。因此河本擅自說服被派往北京的鈴木，並要鈴木幫助河本所擬的暗殺計畫。據傳河本命令鈴木說：「絕不許隨便洩露這個計畫，只告知張作霖回來滿洲的時間就行。」

河本將其部下派往北京、山海關和新民，要其一一報告張作霖所坐火車的通過情況。六月二日晚上，工兵第二十九大隊藤井中尉在奉天郊外，皇姑屯的滿鐵交差鐵橋

下裝填了炸藥。

六月三日，張作霖從北京出發，河本等大約得知火車的通過時間、張作霖坐的是前面第五輛的展望車等等情況。

六月四日凌晨五時二十分左右，列車開進鐵橋的瞬間，獨立守備隊中隊長東宮鐵男[17]大尉按了爆破開關。

以下是河本本身的證詞。

張作霖所乘列車開進現場，慢一秒鐘爆發預備火藥，過去一點以後再予爆發。這樣恰好扣住後部車輛炸死張作霖。（「河本大作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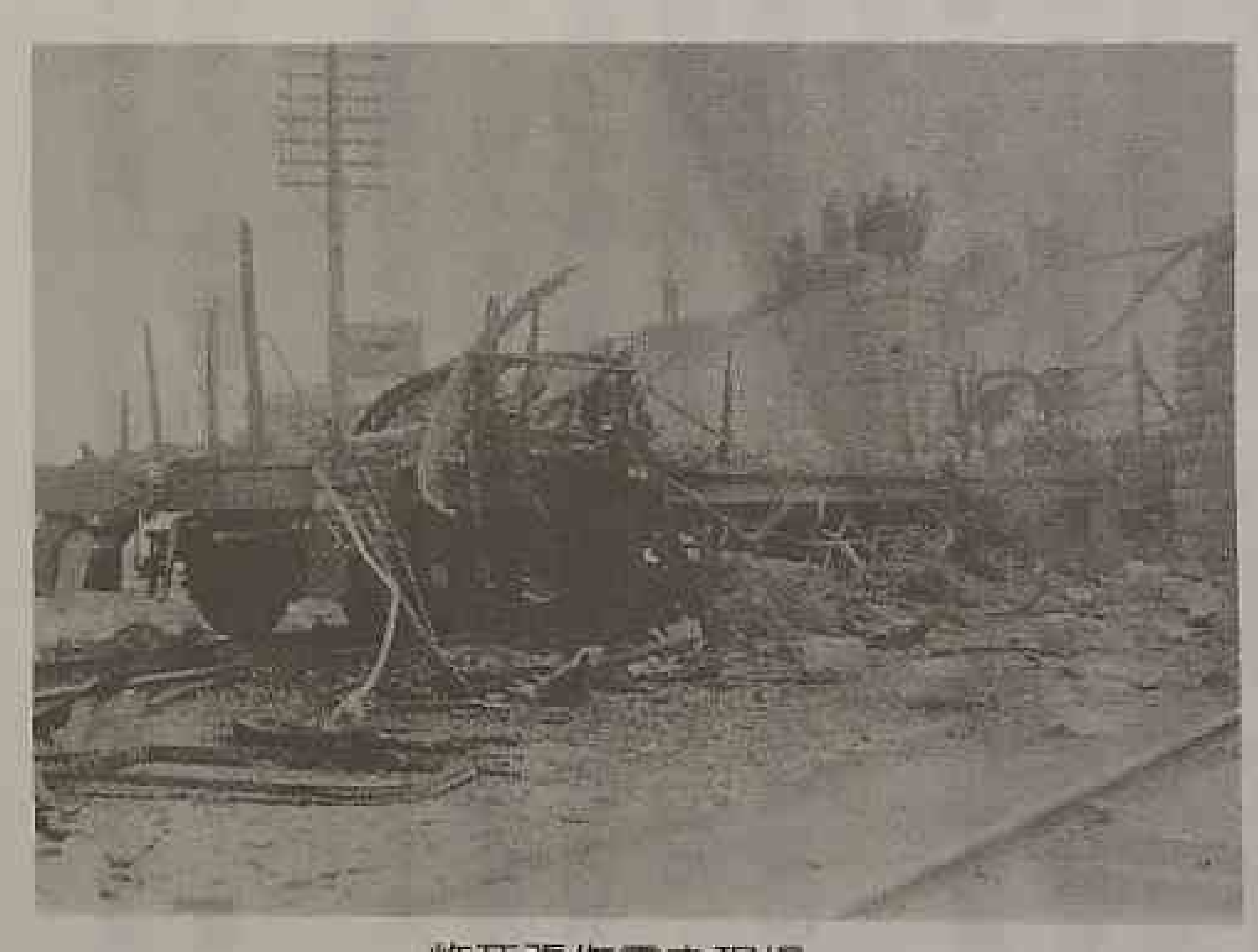
轟隆炸聲響起，黑煙飛揚兩百公尺上空。我以爲張作霖的骨頭也飛上天空了，黑煙和炸聲使我驚奇不已。所謂藥太有效了，就是指此種情形而言。（河本大作「我殺死了張作霖」）

事實上，張作霖的部下吳俊陞當場死亡。張作霖負致命重傷，由部下運到奉天市內的張帥府才斷氣[18]。

又，有一個日本軍人坐在列車上。他是張作霖的軍事顧問陸軍少佐儀我誠也（



交差鐵橋遺迹



炸死張作霖之現場

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一期）[10]。當時儀我很幸運地只受輕傷，關於其經過，儀我的長子儀我壯一郎這樣回憶說：

當時，我在奉天市內的家裡等著父親回家，等到黎明，聽見很大的聲音，我才醒過來。然後沒多久，父親回來了，胳膊受了傷，跟平常不一樣，有點殺氣騰騰。

父親說，他完全不知道會發生這種事件，因所坐列車接近奉天，想到另外車廂去拿大衣時，發生了爆炸。父親大怒說：「明明知道我坐在這火車上，還要爆炸，是什麼意思？」對此，一個日本軍人竟對父親說：「正因爲你乘坐這列火車，所以最好。這樣就可以證明這不是日軍幹的。」

實際上，河本似乎明知儀我在車上而予以爆炸。河本對張作霖的日人軍事顧問沒有好感，從他日後的回憶可以窺悉。

此時率領奉天軍趕到現場的是奉天警備司令黃慕將軍。黃慕是道地的日本人，原名荒木五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七期畢業生，欲在中國大陸有一番作爲而擔任張作霖的軍事顧問。

當天早晨，荒木率領了特別編成的一個大隊，在奉天車站等著張作霖回來。事件一發生，荒木便趕到現場，當時張作霖所坐的列車被颳跑，後續的兩部車輛正在燃

燒中。負重傷的張作霖已由護衛兵運到奉天市內的張帥府，但同車的儀我少校還在現場。儀我一見荒木便說：「明明知道我在這火車上，故意要予以爆炸，這些傢伙實在太可惡了。」荒木以自己車子將儀我送走之後，即前往張帥府。但張作霖進入家門之後沒多久就與世長辭。

荒木馬上知道這個事件是日軍的陰謀，因而禁止奉天軍開槍：「在奉天省，任何人都不許開槍。因爲日軍可能等著這個機會。」

事實上，河本的計畫是，擬與趕到的奉天軍之間製造武力衝突，乘機由之一口氣占領南滿洲。惟因奉天軍的荒木和奉天省長臧式毅[3]看穿這個陰謀，因此沒有採取軍事行動。又，受河本之令待命的日本官兵，因不知道這個計畫的參謀予以解散，所以終於無從發動武力。

隱藏真相

田中內閣的因應

炸死張作霖事件，當時被稱爲「滿洲某重大事件」，而震撼了昭和初期的日

本。這個事件，關東軍雖然於發生事件的第二天即六月五日，報告說是「南方便衣隊」即國民革命軍的「間諜」所爲，但此時已經有很多人在說這是關東軍的謀略。中國報紙自不在話下，外國報紙也報導稱事件背後有日本陸軍。對此種報導，關東軍要求嚴格執行管制新聞報導，但其眞相，最後還是爲日本政府得悉。

當時的首相，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21]，得到可能是日軍謀略的情報，據說係來自田中信賴的預備役中將貴志彌次郎[22]的報告。發生事件後，貴志馬上去視察現場，並向田中首相報告：從炸藥的量和質來判斷，不可能是南方便衣隊的東西，而且安裝導電線爆炸開關，所以應該與日本軍人有關係。

六月十九日，鐵道大臣小川平吉也收到其親信工藤鐵三郎的報告說，該事件的主謀是河本參謀。同時事件當日，偶然經過現場的在野黨民政黨國會議員松村謙三等人，也向該黨總裁濱口雄幸[23]報告了有關情況，因此民政黨也已知道這是日軍幹的。所以這個問題在國會也提出質詢，而發展成震撼日本昭和政界的大事件。

田中義一的長子田中龍夫（曾任自民黨衆議院議員）說，田中首相一得到消息，似乎就覺得關東軍參與了這個事件。田中首相獲悉其第一次報告時正在吃飯，瞬間不知不覺放下筷子說：「糟了。」

田中首相一直堅持把滿洲與中國本土分開，日本透過張作霖在滿洲發揮影響力，

滿洲不在蔣介石統一中國範圍內的方針。這是所謂「滿蒙分離政策」。事實上，蔣介石的北伐軍到達山東省時，田中內閣即出兵妨礙其北上（出兵山東）。

因此，田中首相反對關東軍除掉不完全聽從日本之張作霖的強硬主張，田中擁護張作霖，並欲透過他來確保日本在滿洲的影響力。從他的意圖來看，河本等人的謀略很可能完全廢掉他多年來的中國政策。

派遣林權助特使

接到事件報告後，田中首相最擔心的是，其父被殺的張學良變成反日，並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合作。所以，田中開始著手查明事件眞相，並努力於使張學良仍然站在日本這一邊的說服工作。

八月五日，受田中之意，日本政府派遣林權助[24]男爵爲特使，前往滿洲參加張作霖的葬禮。林權助歷任駐淸國公使、駐華公使，是日本外務省的頭號中國通。

東京港區的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有當時田中首相給林權助的命令書。題名「林大使應對張學良提出意見要旨」的這個文件，是田中首相希望直接念給張學良聽，而將日本政府的方針一條一條寫出來的，它明示當時日本的對滿洲政策。

「滿洲是日本的外圍……」在這樣開頭的這分文件，田中首相強調與張學良之間

要繼續維護日本與張作霖之間的友好關係，希望共同使滿洲「成爲全中國最發達的土地」。但其主要目的還是在於阻止張學良與國民政府合作。「有人說採用三民主義、青天白日旗沒什麼關係，但一葉落知天下秋，這是不行的，絕對要避免南方勢力入侵，否則日本的意志（意思）將無法貫徹。」

無需說，這裡所謂「南方勢力」，是指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而言。是即田中欲阻止張學良懸掛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而遠離日本影響。

根據日方的紀錄，秉承田中首相之意的林權助特使，於八月八日、九日和十二日，與張學良會談了三次。此時，張學良已經接受枱面下國民政府對他的工作，有意與國民政府合作。首次會談時，林權助對張學良念出田中首相的意見，告訴張學良絕不可以與國民政府妥協，但張學良只答說大勢難以挽回，他的立場非常困難。在九日的會談，張學良說，如果停止與國民政府妥協，他將陷於困境，只有下野。爾後，經張學良的部下劉哲與林權助折衝結果，舉行了第三次會談，雙方達到這樣的結論：「關於南北妥協……決定觀望形勢三個月。」

換句話說，與國民政府的妥協，張學良願意等三個月以後再講，對外則共同發表妥協問題還在考慮中。這一方面是給林權助面子，另方面日本同意三個月以後張學良將東三省歸國民政府管轄。

從以上所述的日方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張學良左右其詞，最後使日本默認他與國民政府合作。但此時日本並沒想到，張學良已經決定棲身國民黨旗幟下，走上中國統一、民族自決的道路。

林權助先生再三要求我不要與國民政府合作，但我從頭到尾沒有給他明確的回答，我是故意迴避的。他要回國時，我請他吃飯，也喝了酒。

那時林先生對我說：「你父親跟我是老朋友，而且我是奉政府命令來訪問你的。可是你始終沒有給我明確的回答。」

我答覆他：「林先生，您替我設想的，遠比我所想的還要好得多。」

他聽了很高興。

「但有一點您沒想到。」我說，他以很驚訝的表情問：「是什麼？」我說：「您沒想到我是中國人。」

停止調查

在另一方面，田中首相綜合林權助和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②的情報，認爲日軍參與炸死張作霖事件的可能性相當大，因而他開始積極調查事件眞相。九月二十二日，



荒木五郎



儀我誠也



田中義一



林權助

田中首相在外務省祕密成立「張作霖爆殺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表示將以很嚴肅的態度來處理這個事件。

關於這個特別調查委員會的種種，我們可以從外務省的《松本紀錄》窺悉。所謂《松本紀錄》，是戰前曾任衆議院議員的松本忠雄，以鋼筆抄寫的外務省保管紀錄，共有一百一十七本。由於當時外務省紀錄的原本（文）在日本戰敗時燒掉，所以《松本紀錄》更是珍貴的日本外交史紀錄。根據《松本紀錄》，這個調查委員會由外務省、陸軍省和關東廳組成，田中首相要求其搜集有關事件的情報，在十月中提出報告。

第一次審議舉行於九月二十三日，陸軍省軍務局長杉山元[3]報告說，不是日本人幹的，元兇還不清楚。但在十月二十三日的第二次會議，藤岡關東廳警務局長所提調查結果，暗示日軍是兇手。

藤岡的報告說，事件當日屍體留在現場的兩個中國人，是居住奉天的嗎啡患者，爲日本人伊藤謙次郎所雇用，於事件前一天交給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根據伊藤的供述，當時河本對他說：「爆炸的事由我們來負責。」

聽完了這個報告，杉山軍務局長說：「陸軍的報告請暫緩。」外務省政務次官森

恪[22]提議：「調查暫時到此告一個段落，報告書也不必再寫了。」會議至此結束。陸軍躊躇公布眞相，森政務次官欲防止情報洩漏。日本人的罪行日趨明朗，委員會對追究眞相反趨消極。而且從此以後，這個委員會也沒有再開會的紀錄。

根據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佐藤元英的說法，森政務次官不希望暴露更多眞相，特別調查委員會很可能被取消。因此，政府查明眞相之圖終於擱淺。

但幾乎與此同時，田中首相從另外一個管道獲得了絕對是關東軍幹的情報。這是與田中首相關係親密的憲兵司令官峰幸松的報告[23]。峰奉田中首相之命，於九月九日前往現地進行了三個星期的調查。由此，他得到從朝鮮赴援的日本工兵爲河本裝設炸藥的證據，十月八日，峰向田中首相提出報告。

至此，炸死張作霖事件，係以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大佐爲主謀之日本軍人所幹，已經毫無疑問，接下來的最大問題是日本政府要如何處理。日本軍人既然暗殺中國的大元帥，應該課以違反陸軍刑法的重罪，無庸置疑，並且它很可能成爲重大國際問題。

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日本政府內部有兩種意見。

一種主張公開事實，將河本等人交付軍事審判，嚴格處罰。這些人是元老西園寺公望、內大臣牧野伸顯和侍從長鈴木貫太郎[2]等等；尤其是西園寺，他要求田中首相：「爲日本之國際信譽，應公開發表事件眞相，以軍事審判從嚴處罰負責人。」

另外一種意見極力反對公開眞相。鑒於中日關係的惡化、在野黨的攻擊，以及軍方的反對，他們主張不應該公開眞相。陸軍、執政的政友會和大部分閣員屬於這一群。鐵道大臣小川平吉對田中首相說：「今日如果對張學良採取奉承的態度，……將來他們一定會提出毫無道理的更多要求，永無止境，……尤其得知奉天事件爲（日本）軍人所幹，中國輿論勢必大聲疾呼日本撤退，美國亦將與其唱和，以至不可收拾。」

田中首相本身的想法，在此種情況之下，很可能在搖擺不定；不過開始的時候，他有意接受西園寺的意見，想以軍事審判嚴懲兇犯，公開眞相，應無疑問。田中首相未能統一政府內部意見之前，即欲向昭和天皇報告事件眞相。

兩個不同的上奏

炸死張作霖事件，被稱爲滿洲某重大事件。如所周知，因爲這個事件，日後田中首相受到昭和天皇責備，田中內閣終於提出總辭。日本現代史中，因天皇的講話而導

致內閣崩潰，這是僅有的一次；正因爲如此，所以這個事件值得大書特書。一般都說，田中首相就該事件作了假的報告，觸犯昭和天皇。田中首相就該事件究竟怎樣報告昭和天皇，昭和天皇爲什麼生氣，一直並不清楚。

惟因最近昭和天皇的親信侍從武官長奈良武次，和內大臣牧野伸顯的日記分別公開發表，以及發現可能是田中首相之上奏文的抄件，昭和史的空白部分由此得到應有的補充。現在，我們利用這些史料來盡量將其「眞相」顯現看看。

田中首相第一次就此事件上奏昭和天皇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他報告說：「關於炸死張作霖事件，我帝國陸軍軍人之中似有元兇的嫌疑，目前正令陸軍大臣調查中。」（原田熊雄《西園寺公爵與政局》）

十二月二十四日，田中上奏說：「很遺憾（日本）帝國軍人似有關係，……其詳細俟調查結束後由陸相上奏。」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和海軍大臣岡田啓介[3]的《回憶錄》告訴我們，田中此時的上奏曾經報告昭和天皇，擬將河本等人付諸軍事審判，嚴格處分。

根據《牧野伸顯日記》的記載，田中首相曾親自上奏說：「將以非常之決心根本……端正軍紀，對（海）內外恢復（日本）帝國陸軍之榮譽。」但田中首相此項上奏並未經過內閣會議，更未取得陸軍之諒解，是他個人獨斷的行爲。這是後來田中「走

投無路」的主要原因。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陸軍大臣白川義則[13]晉見昭和天皇，上奏「滿洲某重大事件之調查結果」。（《奈良武次日記》）

前幾年，立教大學的粟屋憲太郎教授發現了可能是當時白川陸相報告昭和天皇的內奏文抄本。

美國華盛頓的國立檔案館藏著二次大戰後，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IPS）提出的數量龐大的證據文件。其中有可能由曾任田中內閣內閣書記官長之鳩山一郎[13]所提「田中內閣總辭前有關滿洲事件」的文件。這個文件本來要用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惟因這是可能涉及昭和天皇戰爭責任問題的證據文件，所以該庭沒有採用。

粟屋教授手上的這項文件雖然沒有日期，但無疑應該是上奏昭和天皇的「炸死張作霖事件」奏文的抄本。上奏抄本有兩份，其中一份，可能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內奏抄本」，文字如下：

嚴秘

內奏抄本

上次所奏發生於奉天之爆炸事件，以後秘密繼續調查結果，發現確為關東軍參

謀河本上校獨自發動，在其計畫下使用一些人所爲，誠不勝惶恐。

爲端正軍紀，雖準備予以處分，惟今後處理此事，如其內容洩漏於外，極可能予國家不利影響，爲此，考慮採取既不引起此種不利，又能充分端正軍紀之措施。

上述問題之處理亦屬有關陸軍將來之重大事項，故已與參謀總長、教育總監密議，並徵詢元帥之意見，所見皆同，特此

上聞

內奏後有所垂詢

立即奉答

發現此項文件時，人們以爲這或許是田中首相的上奏文，至一九九〇年，經外交史料館的佐藤元英氏與立命館大學永井和副教授的研究，大致確認這是一九二九年三月的白川陸軍大臣內奏文。

如這個內奏文所示，對事件眞相，白川陸相向昭和天皇明白報告說是河本上校的犯行。但其處分方針，卻與田中首相的想法有些不同。它不準備公開眞相，但爲端正軍紀，要予以處分。這顯示：白川接受陸軍內部的意見，不擬以軍事審判嚴處。這亦說明：從這個時候起，陸軍首腦們極力反對要嚴格處分河本的方針。

這個內奏三個月以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田中首相上了那馳名的奏文。可能是當時「上聞案」的文件，也同樣藏在美國國立檔案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證據文件裡。在這上奏中，田中說他接到白川陸相如下報告：

因事件發生地屬於關東軍之守備區域，故一直愼重調查，但並未獲得能理淸眞相之任何證跡，即皆無我軍部或軍人參與此事之證跡。

三月間報告（白川陸相）說這是河本上校的單獨犯行，這次卻說沒有日軍犯行的證據，這是與三月間陸相的內奏完全不同的內容。關於這個事件的疑問和風聞，田中首相也接獲關東長官的報告，但他還是對昭和天皇報告說，在中國人方面和日本人方面，都沒有找到任何證據。由於找不到日軍犯行的證據，田中遂對昭和天皇上奏說擬作這樣的處理：「在對其他沒有重大影響之範圍內，擬依行政處分匡正軍紀。」

怎樣解釋這個「上聞案」，如非專家，恐怕有些地方不大容易弄淸楚。因此，我們從華盛頓的國立檔案館直接複印原史料，請外交史料館的佐藤元英氏來推敲。因爲粟屋教授發現的資料是從微捲沖洗出來的，有些地方看不淸楚。

看過原史料之複印本的佐藤氏說，首先我們要特別留意這個「上聞案」不是上奏，而是上聞，他並就這兩者的差異作了說明：

田中首相起初似乎要「上奏」，後來臨時改成「上聞」。如果是上奏，必須請天

皇批准，如果是上聞，即「奉聞天皇」，是一種報告，所以上奏與上聞大不相同。如果是上聞，即意味著準備這樣處分（處理），請諒解。

以我個人的見解，它似乎可以作這樣的解釋：田中首相對昭和天皇報告說：「因爲沒找到日軍犯行的證據，所以準備以行政處分來處理，以免造成重大影響。」若然，這與以前田中對昭和天皇所作的報告，方針不一樣，所以田中對昭和天皇應該同時報告爲什麼改變方針，以及如何負這個責任，但這個上聞案都沒提到這些。問題就出在這裡。

昭和天皇的憤怒

此項報告觸犯了當時二十七歲的天皇。

最近公開的內大臣牧野伸顯的日記，對當日的情況這樣寫著：

六月二十七日

首相一時半晉謁，報告前日之內聞而退。繼續召見。皇上說剛才田中就滿洲事件上奏，皇上責問田中所說與前次所說不同，田中一再表示惶恐，欲加辯解，皇上說不必，故田中未再就此件報告而報告他事。敝人謹拜聽以上所述而退。

首相在候客室與侍從長會談，面帶憂色，透露晉謁失錯，並說因陸相之報告不

夠充分，以至不能令皇上認可，實在遺憾，陸軍應有責任，然後離去。

又，六月二十八日奈良侍從武官長的日記有這樣的記載：

因觸犯皇上，事情變成極其麻煩。……爲表其觸犯皇上之憾，首相說他決定提出辭職。

昭和天皇爲什麼震怒呢？如果單純地看，可以解釋爲：曾經上奏說這是日本陸軍軍人的犯行，後來又說不是，即報告假話。但事實似乎更複雜。現在我們來看看刊登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號《文藝春秋》（月刊）上，成爲很大話題的《昭和天皇獨白錄》就這件事究竟怎麼說。

爾後田中又來看我，並報告說擬將這個問題隱藏起來。由於這個說法與上次所說差得太遠，所以我對田中以很重的語氣說，這與上次的話有違，提出辭職如何？

現在回想起來，我這樣說，是因爲我血氣方剛，總之我是這樣說的。[12]

由以上所述，我們作如下的解釋，似乎比較正確：那就是田中首相不但對昭和天皇作了假的報告，而且對昭和天皇報告說，希望把這個事件隱蔽起來使其不了了之。換句話說，田中首相對昭和天皇報告：事實歸事實，但公開則希望說日本陸軍與事件無關。這與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田中首相上奏說，擬將其付諸軍事審判並嚴格處分的

方針顯然是矛盾的。昭和天皇之大發雷霆，就是針對這一點。九一八事變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後來出任侍從武官長的本庄繁[5]大將的日記說，昭和天皇聽了田中首相的上聞，曾就其當時的心情這樣寫道：

此事之後，皇上對侍從長說，田中首相先發表後報告：「政治上不得不這樣發表。上奏與從前不同的上奏，非常對不住，故擬請辭。」於是皇上說：「這是作爲政治家無可奈何的事。但事先請求批准其發表，而如果准許這樣做的話，我將不得不對臣民說假話。」

換言之，田中首相雖然知道其眞相，但擬作假的發表這種報告，昭和天皇認爲是不負責任的，而要其辭職。如果允許田中首相的上聞，他等於要對臣民要說假話之言說明了這一點。

牧野伸顯的日記告訴我們：在此以前，昭和天皇對田中首相已有不信任的傾向。上聞一個月前的五月六日，昭和天皇曾透過鈴木侍從長祕密問過牧野：

關於滿洲問題，陸相或者首相上奏擬以行政事務在內部處理本件，而對一般發表此非事實時，準備對首相問要不要負責任，如何？

質言之，在上聞一個月以前，昭和天皇已經知道其內容，因而徵求其親信的意見，要田中負責適不適宜。對此，牧野於五月十四日奉答說：「聖慮實理所當然。」



張學良贈林久治郎之扇面



日皇昭和



盧廣績

田中內閣總辭的劇本，事實上此時已經決定了。皇宮，已以更換政府為前提，從事極其周密的研討。

但昭和天皇是不是認為應該公開眞相呢？不見得。因為昭和天皇於田中首相上聞的第二天批准了白川陸相的上奏：

因揭發炸死張作霖事件對國家不利，故擬將其按下不動，並奏請守備區域負責人村岡司令官以下之處分。

即昭和天皇雖然對田中首相首尾不一的上聞表示憤怒，卻批准了不公開眞相和嚴格處分的方針。因此，田中內閣負起責任提出總辭，但事件眞相便隱藏起來，到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才公開。

軍部走上獨斷獨行的道路

炸死張作霖事件，爾後經過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繼河本之後出任關東高級參謀的板垣征四郎[38]，在這個事件三年後的一九三一年，竟也搞出炸燬列車的謀略事件（柳條湖事件），從而進入九一八事變。關東軍一個參謀的謀略，產生陸軍激進派的第二、第三個謀略，如此這般，日本終於走上全是泥沼的十五年戰爭道路。

日本如果嚴格處分設謀的河本等人，並向世界認錯，關東軍或許不會再有第二個、第三個謀略也說不定。因此，在此種意義上，如何處理炸死張作霖事件，對爾後日本的走向，實有決定性意義。

日後昭和天皇在其《獨白錄》這樣說：

自發生此事件（田中事件）以後，凡是內閣上奏，我即使有反對的意見，也決心予以批准。

從此以後，昭和天皇便努力做個對軍部的獨斷獨行不說「不可」的「沈默帝王」。至此，軍方藉口天皇統帥權⑥，干預政治日甚，無從抑制軍部獨斷獨行的日本，遂走上覆敗之路。

日本不僅暗殺了張作霖，而且隱藏眞相，而使張學良決心反日和抗日到底。

張帥府的因應

張作霖是重傷致命，不是當場死亡。與張作霖同車的部下，以及爲迎接張作霖而前往奉天北站，然後趕往現場的親信，用車子把張作霖運到張帥府。陳兆麟就是當日去接張作霖的其中一個人。

皇姑屯發生爆炸時，我們正在奉天北站等著張作霖的列車進來。於是我們趕往

現場。皇姑屯的鐵橋，下面走的是中國的列車，上面是日本的鐵路；上面的鐵橋全部塌下來，壓碎了張作霖的列車。張作霖及其親信黑龍江督軍吳俊陞，以車子運往張帥府。張作霖被運至第五夫人的家。車子一到，第五夫人便說：「還在車上，趕快下來吧。」我們用地毯把張作霖包起來運進其家裡，但沒多久就去世了。第五夫人守屍體三天之後，把張作霖的秘書找來，令其代寫遺書。遺書說，要張學良繼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然後打電報催張學良趕緊回來奉天，同時以電報通知楊宇霆[18]等奉天軍閥的巨頭，張作霖已死。（陳兆麟訪問談話）

通知奉天軍閥內巨頭張作霖已死之後，張帥府並沒有公開發表此事，決定暫時隱藏張作霖死訊，並為張作霖新配老花眼眼鏡。

我們知道（爆炸）是日本關東軍搞的，所以暫時沒發表張作霖之死。我們深怕關東軍如果知道張作霖已死，很可能乘機出兵奉天。我們將其隱蔽起來，致日方始終無法得悉張作霖是否還在人間。（盧廣績訪問談話）

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和關東軍為打聽張作霖生死，對張帥府下了好多工夫，都未能獲得正確消息。

張學良的行動

張作霖所坐列車在奉天附近被炸燬，在北京的張學良於六月四日當天就得到消息。那天本來準備舉行張學良的慶生會，雖然發生不幸事件，慶生會還是舉行了。應邀參加該項慶生會的愛新覺羅溥傑氏，就當時的情況回憶說：

張作霖所乘列車被炸燬當天，張學良的慶生會在北京舉行，我也參加了。我一看會場，就發現氣氛有點不大對。楊宇霆等奉天軍閥的大人物也都在場，因而我覺得很奇怪。但張學良的言行，與平常一點也沒兩樣。他說，大元帥（張作霖）的列車被爆炸，但沒關係，據說吳俊陞受傷了。他沒提到張作霖之死。此時，張學良還不知道其父親張作霖已經死了。

一個星期左右以後，我才得悉父親去世，因為部下隱匿不報。當時我只知道父親受了傷，因此我由北京前往河北省的灤州去執行撤退軍隊的任務。完成這個任務以後他們才告訴我家父死了。得知家父去世時，我非常傷心；同時覺得全部責任落在我身上。那時我身體欠佳，相當衰弱。

當日的秘書，在張學良身邊的劉鳴九，對心身交瘁的張學良這樣回憶：

六月四日，我們只接到聯絡說，張作霖遇炸受傷，連受傷的程度如何，我們都不知道。接獲這個消息以後，張學良將其司令部移到灤縣。到達灤縣之後，內部一些人已經得知張大元帥被炸死了，但誰都沒說出口。從前線撤回來的將官之中，也有人知道這個事實，但都不說。張學良來到灤縣時，留著「背類」髮型（all back，把全部頭髮往後面梳），他突然把頭髮剪掉。按照中國人的習慣，父母去世時，一百天之內兒子不可以剪頭髮。大家對張學良的這個行動覺得很奇怪。

當時，張學良與楊宇霆、孫傳芳等一起住在灤縣北部山上的一個廟裡頭，有一天我送電報去，張學良把我帶到他的房間屋角，流著眼淚對我說：「父親去世雖然很痛苦，但現在什麼也不能說。」記得這是我們到達灤縣大約一個星期時候的事情。

此時，接到有關事件詳細報告的張學良，確信這是關東軍所幹的勾當。

這個事件乃關東軍所為，大家都知道，這是公開的秘密。當時的南滿鐵路，除日本軍人外，還有誰能接近？因此我討厭日本軍人。為設計這個事件，他們曾把南滿鐵

路暫停一時。你說誰能停開火車？所以我對日本非常不滿，極其痛恨。家仇國難統統落到我身上。中國有這樣的諺語：「父仇比天仇可恨。」

張學良躲起來了

得悉張作霖死亡的張學良，突然不見蹤影。以後一直到出現於奉天，張學良那幾天的行蹤至今還是個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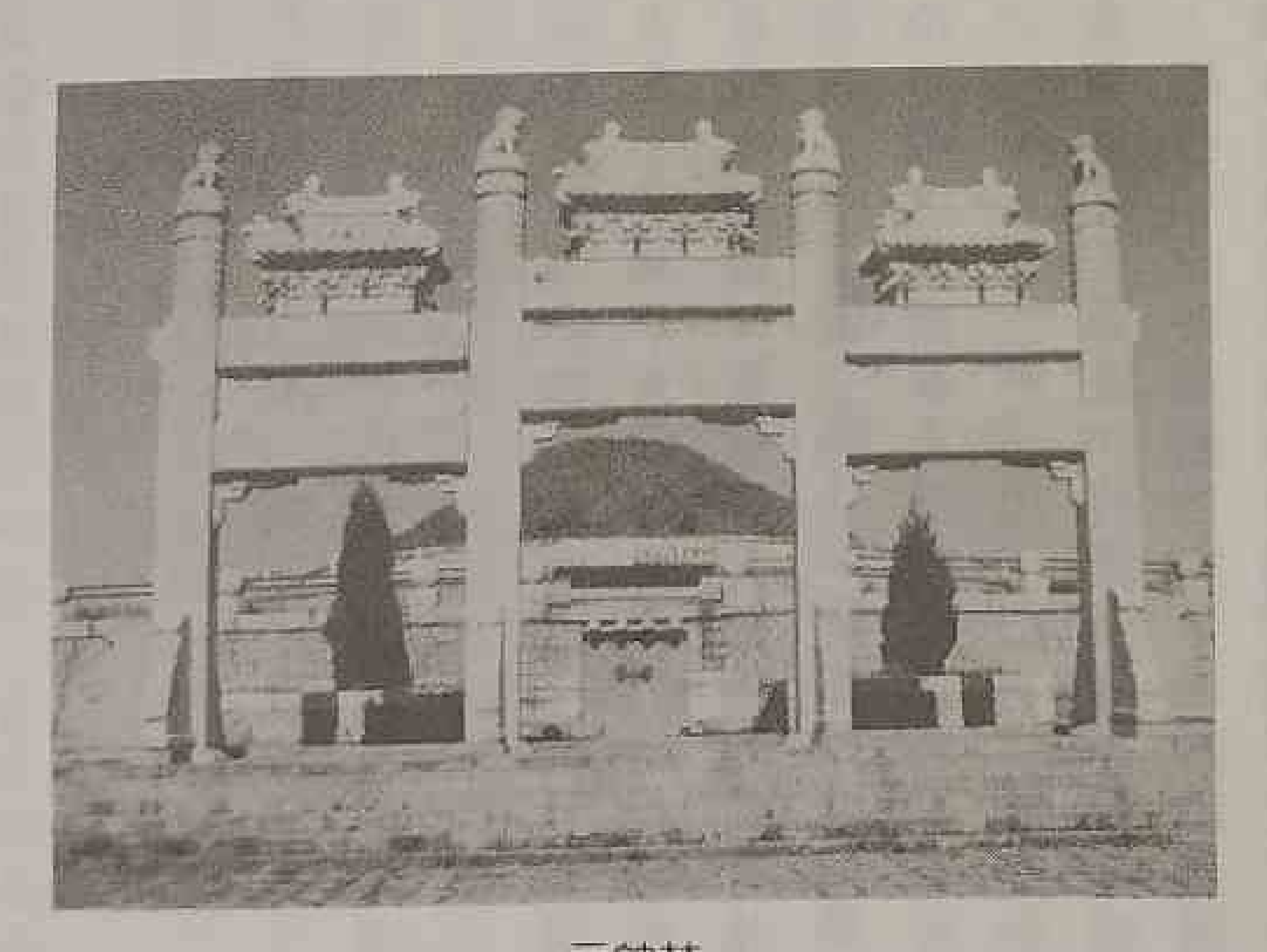
經過山海關以後，有許多日本兵。如果給日本兵看到，我可能被殺掉。因此我化裝成炊事兵乘火車回到奉天，沒人認出我。回抵奉天張帥府時，連我的部下都不相信我是張學良，我們家人也沒有馬上認出我來。我回家時家父已經死了。惟因我很能模仿父親的筆跡，而且有父親的圖章，所以我假父親之名，一連串下達好幾道命令。把黑龍江和奉天的各種懸案事項全部解決以後，我才發表父親之死。

張學良回到奉天，奉天軍閥內的政情便趨於安定，從而突破了難關。

如此這般，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因張學良從關內回來，而終於度過這個難關。東北的老將張作霖成功地把張學良培養成年輕而卓越的領導者了。張學良有某



張作霖喪禮上的張學良



元帥林

種威信，他回來之後奉天軍閥內部便安定下來。至此，日本找不到機會出兵了。（盧廣績訪問談話）

日方得悉張學良回到奉天，是六月十九日（正式發表為六月二十一日），以張學良名義向國內外公開發表張作霖之死的時候。張作霖的生死兩個星期不清楚，關東軍失去另外一個採取行動的機會。因此，擬以此事件為口實控制南滿洲的關東軍意圖，遂變成單純的炸死張作霖事件了。

家父去世那天，正是我的生日。我也許是個非常迷信的人，不過我總覺得我跟家父的確有很特別的關係。時至今日，每逢我的生日我就想起家父，想起他老人家的死。所以我不要我的生日，不想慶祝自己的生日。家父是個很慈祥的人，家父的死使我很痛苦，對我打擊很大。

現在，張學良把自己的生日改為六月一日，理由是不能把父親忌辰當作自己慶生的日子。這是張學良喜歡乃父張作霖的表徵，而由此，我們更能窺悉炸死張作霖事件給他多大多深的創傷。

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

張學良於七月一日就任黑龍江、吉林、奉天（遼寧）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以張作霖繼承者的身分，掌握了強大的奉天軍閥的軍權。八月，盛大舉行其父的葬禮。一九二九年五月，以一千四百萬元的經費，作爲張作霖的墳墓，在撫順郊外開始營造規模宏大的元帥林。

這個元帥林，現在仍然位於從撫順市坐車一個小時左右的鐵背山山麓。一九五四年，大伙房水壩完成，正面的兩個門爲水淹沒，但自一九七九年以後，因遼寧省政府的保護政策，予以修理保全，並推動觀光，目前經常有許多中小學生去參觀。

這個事業，象徵張學良是奉天軍閥的繼承者，和他所掌握權力的強大。

如此這般，張學良繼承了乃父張作霖在東北建立的權位。從此以後，年輕的「王子」開始建設其理想的滿洲，但侵略野心日趨露骨的日本關東軍阻擋了他的去路。

譯註

①張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出生於奉天省海城縣，起初爲綠林頭目，一九一六年任奉天省督軍兼省長，後來得日人援助，插足國內，一九二七年自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

大元帥，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逼近北京，見情勢不利，撤回東北，在皇姑屯遇日本關東軍爆炸負重傷，當天（六月四日）死亡。

②郭松齡（一八八二—一九二五），奉天省瀋陽縣出身，奉天陸軍速成學堂（又稱奉天武學堂）畢業，一九一六年成爲張作霖部下，組織「軍官派」，與楊宇霆的「日本留學派」分庭抗禮。後來以「反張、親俄」，成爲關東軍「制裁」的對象。

③張作相（一八八一—一九四九），遼寧省義縣人，清朝末期加入張作霖陣營，跟隨張作霖而飛黃騰達。張作霖被炸後，被推爲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但他令張學良就任此職，自己出任吉林省主席。中日戰爭期間隱居天津，戰後據說曾任國民政府顧問。

④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安徽省合肥人，留學德國，在袁世凱手下自成一派，袁死後，段祺瑞組閣數次，曾獲日本寺內正毅內閣所謂「西原借款」，意圖擴大皖系勢力。一九二〇年，在直皖戰爭中，爲吳佩孚等打敗。

⑤馮國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河北省河間人，清末袁世凱部下，歷任北洋軍要職。辛亥革命時，以北軍第一軍司令與革命軍戰鬥，在長江流域江蘇省一帶建立雄厚勢力。但他反對袁世凱帝制自爲，隨黎元洪辭去大總統職位而代理大總統。

⑥馮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縣人，搖擺於皖系與直系之間，亦與國民政府革命軍聯合，曾任國民政府要職，但又不忠於國民政府。一九四八年，自美搭俄輪赴俄途中，輪船失火死於船中。

⑦白川義則（一八六八—一九三二），日本愛媛縣人，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陸軍大學畢業，一九二二年陸軍次官，後任關東軍司令官，一九二五年升任大將。一九二七年陸軍大臣，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第一次上海事變）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該年四月，被韓國人尹奉吉等投擲炸彈重傷死亡。

⑧張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天津人。原名壽春，字伯苓，以字行。本爲海軍軍官，後留學美國，轉而從事教育事業，創設南開中學，日後改爲南開大學，出任校長，也是首任考試院院長。

⑨戰艦金剛，完成於一九一三年八月，一九三一年、三七年變更裝備，排水量爲二萬六千三百公噸，最高速度二十七·五海里，一九四四年中魚雷沉沒。

⑩戰艦伊勢，完成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一九三七年改變爲航空母艦，排水量爲三萬五千三百五十公噸，速度二十五·三海里，一九四五年七月，被美國飛機轟炸而大爲破損。

⑪戰艦陸奧，完成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一九三六年變更裝備，一九四三年六月，在柱島因火藥庫爆發沈海。

⑫關於所謂三大政策，請參閱蔣永敬〈孫中山先生與『三大政策』〉一文，《中山學術論集》下冊。

⑬關於北伐的種種，請參看《北伐統一六十周年學術討論集》，台北，北伐統一六十周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一九八八年十月十日出版。

⑭請參看拙譯《中日外交史》，此書於一九八八年由水牛出版社出版。

⑮河本大作（一八八三—一九五五），兵庫縣人，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五期，陸大畢業後曾任駐華公使館助理武官、參謀本部支那班班長、關東軍高級參謀，因炸死張作霖，一九三〇年七月預備役。後任滿鐵理事、滿洲煤礦公司理事長，戰後死於太原獄中。

⑯村岡長太郎（一八七一—一九三〇），九州佐賀縣人，陸軍士官學校第五期畢業，曾任步兵第二十九聯隊長，一九一八年少將，經步兵學校校長及第四師團長，一九二三年升任中將。一九二七年八月任關東軍司令官，一九二九年七月編入預備役。

⑰東宮鐵男（一八九二—一九三七），群馬縣人，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七期，曾任滿洲獨立守備隊中隊長、「滿洲國軍政部顧問」，推動日人移民滿洲，戰死華中，升大佐。

⑱關於炸死張作霖事件詳情，請參看一九八七年水牛出版社出版拙譯《張作霖與日本》。

⑲儀我誠也（一八八八—一九三八），東京人，陸軍士官學校二十一期，曾任哈爾濱特務機關員，參謀本部附兼張作霖軍事顧問，一九三三年齊齊哈爾特務機關長，一九三七年出任天津特務機關長，少將。

⑳臧式毅（一八八四—？），遼寧省瀋陽人，清末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曾任保定軍官學校教官、吉林督軍參謀及參謀長。爾後隨楊宇霆進入關內，在南京曾被孫傳芳逮捕。張作霖在北京時留守奉天，任遼寧省主席，後轉任奉天省長。僞滿時代，出任「民政部大臣」、「參議府議長」。日本戰敗後，被俄軍俘虜送往西伯利亞。

㉑田中義一（一八六四—一九二九），山口縣人，舊陸軍士官學校三期、陸大畢業，留學俄國，曾任參謀次長（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八年出任原敬內閣陸相。一九二一年升任上將。一九二三年任山本權兵衛內閣陸相，二五年預備役，出任立憲政友會總裁、貴族院議員。一九二七年出任首相兼外務、拓務兩大臣，以森恪爲參謀，召開「東方會議」等，出兵山東，侵略中國。

㉒貴志彌次郎（一八七四—一九三八），陸軍士官學校六期，中將。當時照顧張作霖的次子張學銘。

㉓濱口雄幸（一八七〇—一九三一），高知縣人，東京大學畢業，曾任遞信、大藏次官，一九一五年當選衆議院議員，一九二四年出任加藤高明內閣藏相，一九二六年任若槻禮次郎內閣內相。繼田中義一任首相。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東京車站被右翼青年狙擊負重傷，次年四月辭職。

㉔林權助（一八六〇—一九三九），福島縣人，東京大學畢業，曾任外務省通商局長、駐韓國、清國公使，在朝鮮推動其殖民地化。歷任駐義大利大使之後於一九一六年又任駐清國公使，一九一九年出任關東廳長官，一九二〇年任駐英大使。從官界退休後，任皇宮式部長官，一九二九年出任樞密顧問官，以至去世。

㉕林久治郎（一八八二—一九六四），栃木縣人，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駐天津、濟南、福州、漢口等地領事，一九二八年三月至一九三二年一月擔任奉天總領事，九一八事變時與

關東軍意見不合，後任駐巴西大使，日本戰敗時是陸軍司政長官。

㉖杉山元（一八八〇—一九四五），福岡縣人，陸軍士官十二期、陸大畢業。一九三〇年中將，陸軍次官，一九三四年參謀次長，一九三六年升大將，次年任陸相。一九三八年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一九四〇年參謀總長，一九四三年元帥。一九四五年四月任第一總軍司令官，日本戰敗後於九月自殺。

㉗森恪（一八八三—一九三二年），大阪人，一九二〇年當選衆議院議員，隸政友會，任田中義一內閣外務省政務次官，主持東方會議，積極推展侵略中國政策，後來出任犬養毅內閣書記官長。

㉘峰幸松（一八七三—一九五八），長崎縣人，陸士官校第七期，一九〇四年憲兵上尉，一九〇六年至一九〇九年應清廷聘請，一九二四年少將。一九二七年憲兵司令官，二九年升中將，三一年預備役。

㉙西園寺公望（一八四九—一九四〇），京都人，公爵。留學法國，創辦明治法律學校（日後的明治大學），曾任奧地利、德國、比利時公使、樞密顧問官。第二、第三次伊藤博文內閣文部大臣（教育部長）。就任立憲政友會總裁，從明治末年至大正初年，與桂太郎交替組閣。後來一直爲日本天皇推荐首相候選人，是昭和時代最後的政治元老。

牧野伸顯（一八六一—一九四九），鹿兒島人，元勳大久保利通的次男，吉田茂的岳父。九歲時留學美國。曾任駐義大利、奧地利公使、文部大臣及外務大臣。一九二五至一九三

五年，擔任內大臣，被軍及右翼視爲親英美派，二・二六事件時曾被襲擊，幾乎喪命。鈴木貫太郎（一八六七—一九四八），千葉縣人，海軍兵（軍官）學校十四期、海軍大學畢業。曾任第二艦隊司令長官、海軍次官，一九二三年升任大將。後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軍令部長（相當於陸軍參謀總長）。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擔任侍從長。二・二六事件時曾遭襲擊，死裡逃生，一九四五年四月出任首相。

㉚岡田啓介（一八六六—一九五二），福井市人，海軍兵校十五期、海軍大學畢業。曾任海軍次官，一九二四年升大將。一九二七年任海軍大臣，一九三四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出任首相。在首相任內最後一年發生二・二六事件。太平洋戰爭末期曾致力於打倒東條內閣，張作霖被炸死時爲海軍大臣。

㉛鳩山一郎（一八八三—一九五九），東京人，其父親和夫曾任衆議院議長。東京大學畢業。曾任東京市議員、衆議院議員（一九一五年首次當選，三十二歲），田中義一內閣書記官長、犬養毅、齊藤內閣文相（文部大臣）。二次大戰後就任日本自由黨總裁，組閣前夕遭盟總整肅，將自由黨交給吉田茂。一九五二年，與吉田茂爭自由黨領導權，鳩山與其同志與改進黨合併成立日本民主黨，鳩山任總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組閣，與蘇俄恢復邦交。一九五六年，鳩山首任自民黨總裁。曾任外相，現任參議院議員威一郎是他的兒子；宮澤內閣文部大臣、衆議院議員邦夫以及現任衆議院議員由紀夫兄弟是鳩山一郎的孫子。鳩山是日本最著名的政治世家。

㉜陳鵬仁譯《昭和天皇回憶錄》，台灣新生報社，一九九〇年，頁二五。

㉝本庄繁（一八七六—一九四五），兵庫縣人，陸軍士官學校九期、陸大畢業。一九二一—二四年擔任張作霖軍事顧問；九一八事變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一九三三年升任大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自殺。

㉞板垣征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岩手縣人，陸軍士官學校十六期、陸大畢業，一九二九年任關東軍高級參謀，與石原莞爾等策畫發動九一八事變。爆發中日戰爭時任第五師團長，轉戰於華北。一九三八—三九年，出任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及平沼騏一郎內閣陸相。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一九四一年升大將。A級戰犯，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絞刑。

㉟所謂統帥權是軍方有關作戰用兵（統帥）的最高權能。日本舊憲法第十一條規定：統帥權爲屬於天皇之大權，立於行政之外，陸軍由參謀總長、海軍則由軍令部總長輔佐天皇，統帥事項由兩總長直接上奏天皇。這叫做「統帥權的獨立」，是日本獨特的制度。軍的編成、常備兵員額的決定（編成大權），爲屬於國務與統帥的中間事項（廣義的統帥事項），這也不歸於一般國務大臣掌管。

㊱楊宇霆（一八八六—一九二七），遼寧省法庫人，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班步科第八期，曾任東三省講武學堂教官，長年擔任張作霖的奉軍參謀長，爲「日本留學派」領袖。

第二章　年輕的領導者張學良

要張學良做滿洲皇帝

土肥原賢二的王道論

日本政府隱藏著炸死張作霖事件眞相[1]，而拚命拉攏張學良。但張學良早已心向國民政府，因此聽不進只汲汲於自己利益的日本政府的「良言」。

在這種情況下，當時擔任張學良軍事顧問的土肥原賢二[2]曾想盡辦法接近張學良。在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土肥原拖出清廷的末代皇帝溥儀出來做「皇帝」。

態度最惡劣的是土肥原。從頭到尾，他的態度都不好，但我跟他衝突最厲害的是他寫文章給我的時候。我記得這篇文章叫做〈王道論〉。對於準備要我做皇帝這件事，我跟他吵得天翻地覆。我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你搞什麼鬼？要把我當做滿洲皇帝是什麼意思？你是我的顧問，竟要叛國？」

——〈王道論〉是什麼內容的文章？

詳細內容我已經忘記了。它把我當做皇帝，當做滿洲的皇帝。我記得其分量相當多。當時我對土肥原說：「這不是要我背叛中國嗎？」……

——這是我們第一次聽到，眞是令人驚愕。請問土肥原什麼時候寫〈王道論〉的？

我已經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

——是日本擁立溥儀當滿洲國皇帝之前嗎？

比那早得多。

——〈王道論〉是土肥原用口頭告訴您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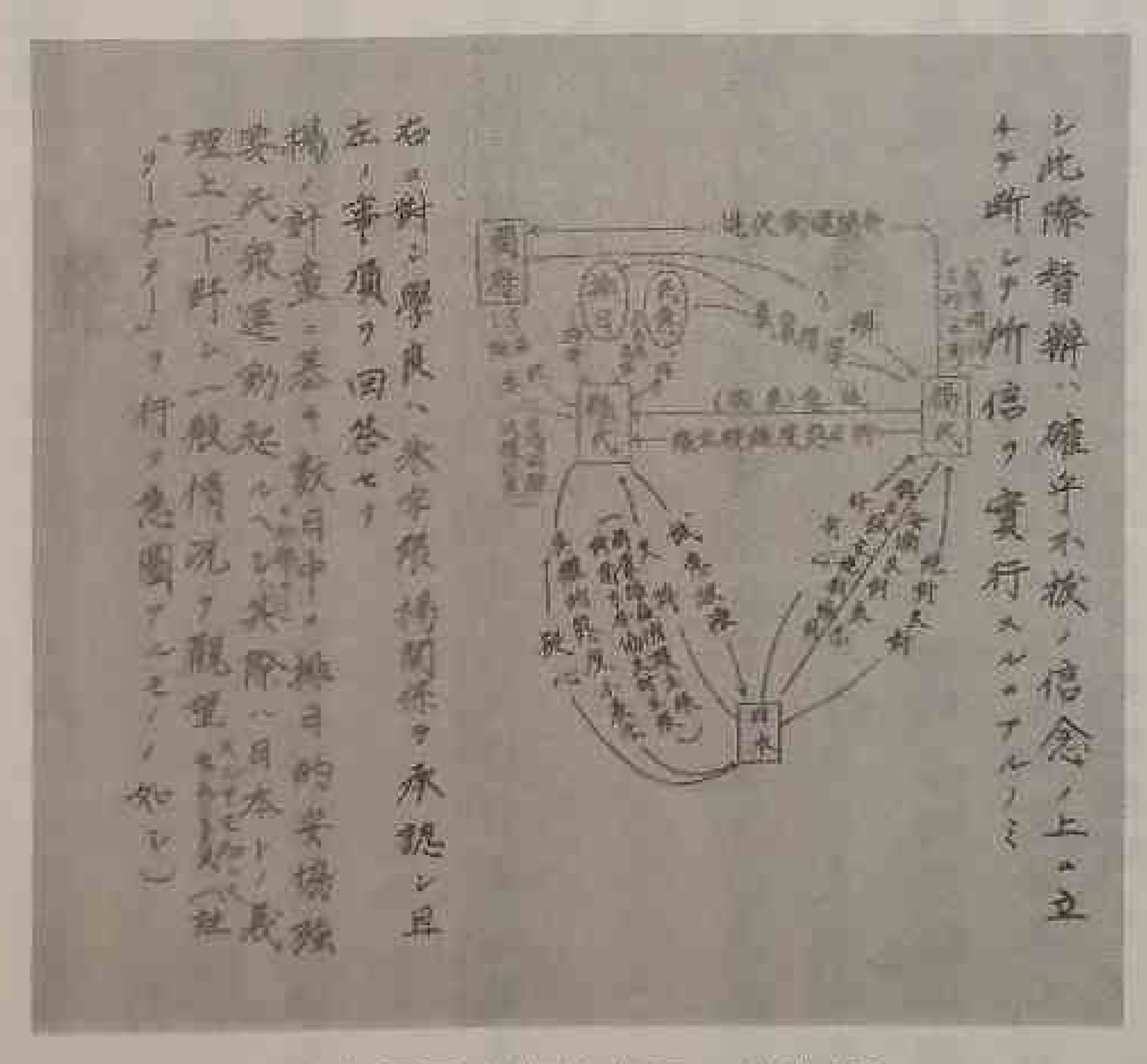
不，是一篇很長的文章，很抱歉，我已記不得內容了。我並沒有好好看這篇東西。很厚，是土肥原自己寫的呢，還是有人叫他寫的，不得而知。

——您手上有沒有這本書？

不知道到那裡去了。不是一本書，而是一篇文章。為這件事，我跟土肥原鬧得非常不愉快。那時我記得奉天特務機關有一個叫做秦真次[3]的軍人。日本的軍事顧問好像都與秦有關係。因而我到奉天特務機關[4]去請他不要讓土肥原再做我的顧問。



土肥原賢二



シ此際督辦ハ確乎不拔ノ信念ノ上ニ立
断シテ所信ヲ實行スルニアルノミ

右ニ對シ學良ハ米字張楊関係ヲ承認シ且
左ノ事項ヲ回答セリ
楊ノ計畫ニ基キ數日中ニ排日的要揚強
要ス民衆運動起ルヘシ實際ハ日本トノ
理上下許シ一般情況ヲ觀望
「リーダー」ヲ得ル意圖デアルモノノ如シ

「土肥原大佐的忠言」後半部

秦真次對我說：「你的軍事顧問是日本派來的。與日本簽訂條約時，決定給你兩個顧問，但這不是給你個人，而是因為你的職位而設的。由於是日本政府派的，故你沒有更換的權限。」

既然如此，我就沒辦法更換顧問。但最低限度，我應該有不與土肥原見面和不跟他講話的權利。我將我這種意見告訴秦真次，同時從此以後，土肥原即使來我也沒見他。

土肥原的備忘錄

這個證言是以往任何資料都沒有記載的史實，我們覺得非常寶貴。於是我們進一步追問，但張學良一再聲稱已經記不清楚了。不過，說土肥原在拖出溥儀之前，曾經對張學良也下過同樣的工夫，既極其有趣，而且非常可能。因此我們翻閱日方的紀錄，特別是有關土肥原的資料，看看有沒有這類記載，但沒有找到。我們也徵詢過對日本軍史很有研究的學者專家們的意見，他們都說這不是不可能，但沒有看過這樣的資料。

在作業過程中，我們所發現的唯一東西是，當日土肥原說服張學良，要他站在日本這一邊的備忘錄。它標題「土肥原大佐對張學良的忠言」，這分備忘錄保存在張作

霖軍事顧問儀我誠也的遺族手裡。但這個備忘錄並沒有〈王道論〉的記述。不過，此事卻能夠告訴我們當時土肥原的立場。茲介紹如下。

在這分備忘錄中，土肥原分析並圖解張作霖被炸死後東三省的政治情勢。它說，就張學良而言，在國際上，「國府」即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與日本對立，國民政府很希望張學良排日。日本雖然支持張學良，但張學良對日本有戒心，因而對日本不表示具體的態度。土肥原認爲，其中一個理由是乃父張作霖的部下楊宇霆。楊宇霆是張作霖部下中最大的實力者，且被視爲親日派。但自張作霖被炸死以後，楊宇霆逐漸有獨斷獨行的傾向，而造成與張學良的隔閡和鴻溝日趨加深。面對這個事實，土肥原得出「東三省政權絕不可能實行兩頭政治」的結論。

日本不可能同時支持張學良和楊宇霆；若是祇能選擇一個，土肥原認爲應該支持張學良。

對這件事，當時的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日後也有所敘述。土肥原以爲從前楊宇霆的確是屬於親日派，但爾後開始從事排日活動，故不能掉以輕心，所以土肥原主張排斥楊宇霆，支持張學良。事實上，關東軍首腦是準備按照土肥原的意見行動的，可是松井七夫（奉天督軍顧問、奉天特務機關長）少校[5]和財閥大倉組擁護楊宇霆，日方的方針並不一致。

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張學良很可能觀望著形勢，並構想他自己的計畫。林久治郎這樣寫著：「張學良察知日本人彼此之間的關係，因而採取以夷制夷之策，他對松井少校和大倉組的河野氏等說，土肥原上校建議盲目地辦事，故不予相信，他討厭土肥原；對土肥原上校等則與其商量排斥楊宇霆的方法，以利用土肥原。」

由此可見，爲保持日本在滿洲的權益，土肥原上校曾經從事過支持張學良的工作，應該毫無疑問。此時，爲使張學良「親日」，土肥原提出的利誘可能就是上述的〈王道論〉。但拒絕土肥原之安排，張學良的判斷並不那麼單純，當是看準複雜的政治情勢所致。土肥原在備忘錄的最後部分以紅鉛筆說：「似乎有政變的意圖。」

事實上後來張學良以非常手段把楊宇霆做掉了。土肥原是否預料了這個政變呢？

總之，此時滿洲的政治情勢是，日本、國民政府、張學良、楊宇霆這四者之間虛虛實實的「鬥法」和「討價還價」，不是一般的常識所能了解的。

關於〈王道論〉，還有一個饒富趣味的事實。此時，亦即一九二八年九月左右，日後提倡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家大川周明⑥也與張學良見過面。

這時候，大川得知，在日本國內流傳爲鴉片中毒、是個廢人的張學良，實際上是很有儒家思想教養的典型中國人，非常吃驚。

對這個青年總司令，我開始發生同情、情感和尊敬。如果可能，我很想幫助張

氏在東三省實現王道政治。（原田幸吉，《大川周明的生涯》）

大川對張學良說：「中國與日本的根本原理畢竟不外乎是王道，因此我們可以爲共同的理想而奮鬥。」據說大川這個主張得到張學良很大共鳴。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大川周明對張學良提倡「王道政治」這件事；而且大川說他曾將他這種想法告訴了土肥原，並對土肥原強調「滿洲問題的解決，唯有與張學良交涉，別無他途」。若是，土肥原上述的〈王道論〉，也許是受大川的影響而寫的也說不定。不過，這一點在今天已經無法求證了。

在大川周明的故鄉山形縣酒田市，有日後張學良寫給他的書信，它說明了此時張學良與日本人廣泛的交往。

五十萬元的政治捐款

政治資金援助床次竹二郎

談到與成爲東北新統治者張學良接觸的人物時，我們不能不提日本政治家床次竹

二郎的大名⑦。因爲他從張學良處得到五十萬元政治捐款，後來引起很大的問題。

床次是從大正時代到昭和時代的日本政界實力者，因一直想做首相，從這個政黨轉到那個政黨，而被人揶揄爲「政界的夢遊病者」。他脫離立憲政友會，組織政友本黨，經由立憲民政黨、新黨俱樂部，爾後又回到政友會，這樣在政海浮沈，雖然力爭上游，但最後還是未能如願爬上首相寶座。

從床次的這種履歷，我們當可想像，他是個社會議論紛紛的政治家，他獲得張學良五十萬元的政治捐款，也成爲日本帝國議會的醜聞，報紙大事報導，世稱「床次五十萬元事件」。

所謂五十萬元事件，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間床次竹二郎與張學良見面時，張學良給他五十萬元政治捐款的「疑惑」。而其發生問題，乃是二人見面七年後之一九三五年的事。當時，就日本來說，張學良是敵人，拿敵人的錢就是賣國行爲，但這是似是而非的邏輯，因此有人認爲這是爲陷害時任岡田（啓介）內閣遞信大臣的床次竹二郎而設計的醜聞。

在帝國議會，山口義一議員對此提出質詢，抨擊床次因拿到五十萬元而有如下的賣國行爲。他說：

床次氏雖然或不至於說要放棄我國在滿蒙的既得利益，但我相信他一定說過要

設法緩和我國對中國的強硬政策這類話。故這不只是金錢問題和綱紀問題，而是賣國的行為。

對山口義一的這種攻擊，床次竹二郎反駁說：

當時我雖然與張學良見過一次面，我對他說，你有很大的土地和很多人口，所以不要當軍閥，應該好好治理滿洲。但我從沒說過要把我國的權益送給他這種話。在議會這樣一再搬弄是非，決非好事。

——「日本的政治家床次氏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跟先生見面，得到先生的政治捐獻，對此有種種說法，有人說五十萬元，也有人說二千萬元，在帝國議會更成為話題，現在我們想請問其確實的金額，和當時先生跟床次談過些什麼內容的話。」

床次氏是不是已經去世了？會不會為他帶來些麻煩？

——「他已經去世很久了，他的政黨也消滅了。與今日的政治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跟他親自交談過。他說：「如果做了首相，我希望解決中日間懸而未決的問題。為此，我必須出來競選政友會的總裁。但需要很多錢。」

我問他：「我能幫什麼忙嗎？」

床次氏非常不好意思地答說：「如果能幫我，那太好了。」

於是我再問他：「競選總裁需要多少錢？」他答道：「需二千萬元。」

我說：「我來出好了。」他答說：「不要送我，借我就可以。等我能還的時候還您。」

我們這樣約定。惟臨走時他說目前需要五十萬元，因此我送他五十萬元。

經過沒多久，我得悉他沒選上總裁，所以二千萬元也不必要了。

當時，床次竹二郎剛脫離民政黨，另外組織叫做新黨俱樂部的新黨。床次大概想在政友會與民政黨這兩大政黨之間掌握決定性的勝券（casting vote），惟跟他脫黨者並不多，而且短缺政治資金。同時，床次以對中國政策為其新黨的政策重心。他與張學良見面，一方面是為了創造新黨的外交政策成績，另方面可能想從張學良處獲得政治資金援助。

當時床次的對中國政策是，承認蔣介石之國民政府，同時要張學良在滿洲建設一

個獨立國家，擬以支持張學良作維護日本權益的交換條件。床次曾對田中（義一）首相作過這樣的建議，並欲實現這項政策，惟因田中內閣辭職而未見實現。床次的新黨運作並不如意，一九二九年，床次又「歸隊」到政友會。

爾後發生九一八事變時，日軍（即關東軍）從張學良的金庫拿到這五十萬元的收據，這張收據被反對黨在議會作為醜聞的證據。床次在這椿醜聞後沒多久便病逝了，享年七十。

告別日本，建設東北

斷然易幟

張作霖從北京撤退，蔣介石的北伐軍便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不流血地順利進入北京城。兩年來的北伐，至此告一個段落，民國創立以來，為北洋軍閥巢穴的北京政府終於壽終正寢。國民政府大致上統一了中國，蔣介石前往北京郊外的碧雲寺，向葬於此寺的孫中山報告完成北伐。

此時，繼張作霖為東北新領導者的張學良，會不會接受國民政府的統一中國？張

學良的動向受到全國注目。蔣介石秘密而頻繁地與張學良接觸。當時國民政府如何拉攏張學良，曾爲張學良秘書的劉鳴九這樣說：

蔣介石派人前來商量與東北的合作事宜。奉天與南京的往還極其頻繁，南京政府爲完成統一全國，希望張學良早日更換國旗。惟不僅有日本的壓力，奉天內部譬如楊宇霆就在反對，因此張學良無法綜合意見。

不過，這時張學良已經拒絕了日方執拗的拉攏，並爲壓住奉天軍閥的部分反對意見，而決心接受國民政府的統一全國。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整個東北斷然易幟，即懸掛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國旗。由此，張學良明確地表示要與日本分手的態度。

——「從統一中國的觀點來看，在歷史上，易幟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分岐點，而這個易幟是怎樣準備的呢？」

我命令部下三天之內作好準備。我們令衣服工廠製作青天白日旗。當時部下都很怕我，我非常嚴格，我規定的事必須做到，我不許部下說做不到。那時，日本人以為他們很了不起，但實際上他們對中國一點也不了解。當時日本人完全不知道我會把國

旗換成青天白日旗。這不是一支國旗，而是作了更換全東北國旗的準備。由此可見日本情報工作的馬虎，當日日本用於情報活動的金錢，等於全部丟進垃圾筒了。

——「先生願意服從國民政府，是不是因爲令尊張作霖被暗殺所致？」

即使我父親沒有被日軍所殺，我也會走上這條路，因為我一直主張中國統一。那時對自己國家力弱，我非常傷心，所以不是父親之死動了我的心。不過因為這個事件，往後我更努力於抗日運動，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當時張學良的親信對易幟是怎樣的看法呢？除楊宇霆公然主張反對張學良的政策外，也有不少人不歡迎國民政府統治東北。

張學良富有愛國心，同時認爲要對付日本，只有東北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有全國的力量。因而他決心懸掛青天白日旗，置身國民政府統治之下。我們覺得茲事體大。

我們東北軍有三十萬兵力，也有海軍和飛機。當時蔣介石的軍隊只有二十萬，

既沒有海軍也沒有飛機⑧。從數字來看，我們的勢力比對方大，所以如果張作霖在世，我相信東北絕不會服從國民政府。但張學良以為，為了國內統一和對抗外國，中國必須統一，而毅然決然掛起青天白日旗。（盧廣績訪問談話）

剷除楊宇霆和常蔭槐

張學良易幟，結束了奉天軍閥內部領導權的爭奪，並全力貫注於加強東北的統治。當時，奉天軍閥內部有以張學良為代表的中國國內陸軍大學等畢業的「陸大派」，和以楊宇霆為首之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即軍官）學校的「士官派」，這兩派在爭奪領導權。

士官派代表楊宇霆是奉天軍閥親日派的首領，且日本關東軍中有人想以楊宇霆為張作霖的繼承人。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成為奉天軍閥的新領導者以後，楊宇霆並不聽命於這個年輕的領導者，因此他們之間對立日深。

張學良為祝賀楊宇霆父親的生日，曾訪問過楊宇霆家舉辦的派對。楊宇霆卻待在客廳，沒有出來迎接張學良。派對快要結束的時候，楊宇霆才從二樓下來，說「楊監督要出門了」。這時張學良是東北的領袖，楊宇霆不過是個監督，卻竟以裝模作樣的態度對張學良說：「漢卿（張學良的字），看戲去吧。」帶

走了張學良。（陳兆麟訪問談話）

楊宇霆常常採取反對張學良政策的態度，而使他們的對立進入攤牌階段的是「易幟」。在張作霖時代，因爲與日本的關係很深，所以奉天軍閥本來就是親日的軍閥集團，親日派代表楊宇霆則絕對反對東北「易幟」。

當時，楊宇霆和常蔭槐[9]要求張學良收回蘇聯擁有權益的中東鐵路權益。那時常蔭槐擔任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長，他希望把中東鐵路掌握在自己手裡。張學良沒同意。常蔭槐又抓住鐵路監督署，但也沒有爲張學良所同意。於是楊宇霆用信紙寫「派常蔭槐爲鐵路署監督」，強逼張學良簽字。

楊宇霆和常蔭槐的作法實在目中無人，簡直沒有把張學良當作上司看待。可能由於這種原因，張學良才決心宰掉楊宇霆和常蔭槐。張學良對楊宇霆和常蔭槐說：「晚上再商量吧。」把他兩人送走之後便開始準備。當天晚上，張學良將楊宇霆和常蔭槐請到張帥府青大樓的老虎廳，在那裡把這兩個人幹掉。處死以後的屍體，以地毯包起來交給他們的家族。（劉鳴九訪問談話）

這是易幟次年亦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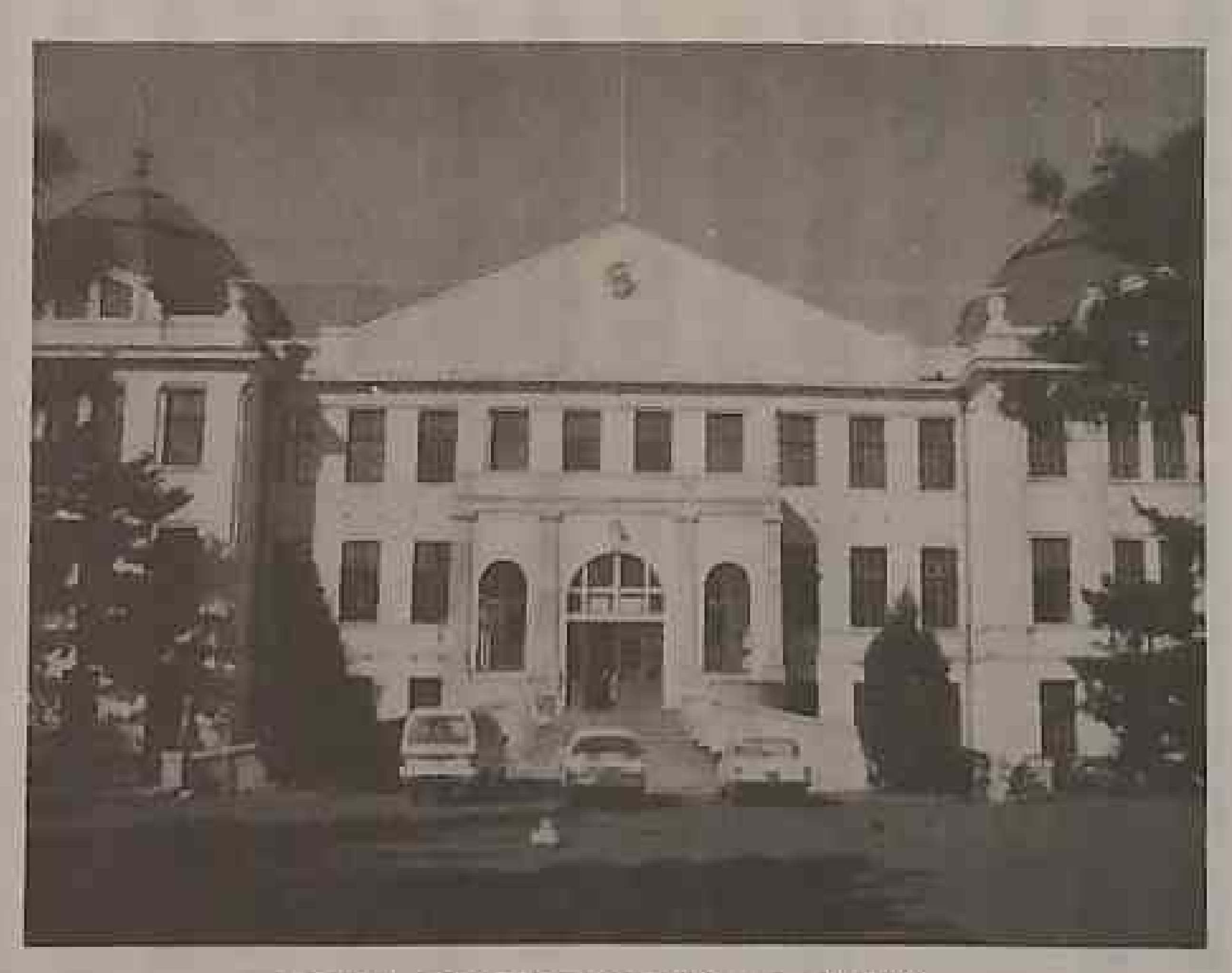
除掉楊宇霆和常蔭槐，可以說是「陸大派」與「士官派」的對立，以及兩派爭奪領導權的總決算。在張學良而言，這一定是他不大喜歡人家問的事件。



床次竹二郎



楊宇霆



東北大學(現爲遼寧省人民政府)

——「先生把楊和常除掉了，現在是否可以將其理由告訴我們？」

這個事件與郭松齡的叛變有關係。當時我已經看出楊宇霆和常蔭槐的企圖，他們準備盜取武器和彈藥從事叛變。起初，我認為他們即使起來叛變我也必定能消滅他們，但後來我想還是不能這樣做。因為這樣做，人會覺得我這個人太殘酷。但如果任其起來叛變，勢將與郭松齡的時候一樣，陷百姓和部下於苦海。這樣，不如在起來叛變之前宰掉。因此，不管人家說我如何殘酷，怎樣罵我，我決定把他們給做了。

軍隊現代化與建設學校

張學良易幟，清除奉天軍閥親日派首領，明確表明與日本分手的態度，並加強他在東北的基礎，從此便根據自己的理念大刀闊斧經營東北。

你們日本人殺死了我父親，而且日本不明不白地意圖隱藏真相。我父親是希望跟日本合作的，我自己的想法也是一樣。但日本人卻出於這種作法，這樣我怎麼能再跟日本合作呢？

換句話說，我父親與日本合作而被日本人暗殺，如果我與日本合作，不是會變成



更値得日本人暗殺的人嗎？因此我不能跟日本合作，跟日本合作，我便是賣國賊。

首先張學良致力於東北軍的組織和裝備的現代化。他改善和擴大兵工廠，以強化對東北軍武器的供給體制，並積極引進戰車、飛機等現代武器。同時設立東北海軍總司令部，著手建立海軍，並請法國教官充實空軍。東北軍因而成爲擁有陸、海、空三軍陣營的現代軍隊。

張學良一方面推動軍隊現代化，另方面在奉天創設東北大學，在各地創辦中學，培育人才。張學良建立的東北大學圖書館和教學樓，現在被利用爲遼寧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而從這很出色的西洋建築，我們可以窺悉他對這所大學非凡的期待。

在我們拿到的影片中，有一九三〇年張學良在遼寧省海城創辦海城同澤中學建校式的影片。從這部影片，我們可以看到盛大的建校式情況，和體操以及教練的學生活動。

我不但希望把東三省搞好，更希望把全國搞好。父親給我留下很多財產和金錢，因此我捐出大部分金錢創辦東北大學等學校。費用都是我出的，完全沒有使用公家的錢。我喜歡這樣做。我認為要把國家搞好，要國家富強，必須培育人才，教育是國家

建設的根本。

建設鐵路與葫蘆島建港

張學良設立東北交通委員會，並積極從事鐵路建設。一九二七年，打通線（打虎山—通遼）；一九二九年，吉海線（吉林—海龍）分別通車。與已經完成的鐵路聯絡，聯結吉林省的敦化與京奉線的東方幹線（敦化—吉林—海龍—京奉線），以及聯結黑龍江省的克山與京奉線的西方幹線（克山—哈爾濱—昂昂溪—洮南—通遼—打虎山—京奉線）的兩大幹線，於此大功告成。

後來我建設了從打虎山到黑龍江的鐵路。當時東北的主要物產是大豆，我們從黑龍江運大豆時不能自由使用南滿鐵路（簡稱滿鐵），同時滿鐵經常妨害我們的運輸。而且經由滿鐵，一切貨物都直接到大連。因此我們需要建設自己的鐵路。

這條鐵路被說是與滿鐵並行，而與日本發生很大的問題。但我並不認為這兩條鐵路是並行。

——這是不是說開始並沒想建設與日本正面衝突的鐵路的意思？

是的。

我建設這條鐵路不是要與日本的滿鐵競爭。因為如果沒有自己的鐵路，則非使用滿鐵不可，所以才要建設自己的鐵路。不過，因為我的鐵路，滿鐵的經營受到影響是事實。

我很想盡量與日本合作，譬如建設鐵路，這從我父親時代就著手，並不是從我開始的。

可是日本沒有合作的誠意。合作需要互相讓步，但日本祇想控制我們。這樣一來，當然無從合作。

在另一方面，與建設兩大幹線的同時，從一九三〇年七月，張學良在錦州南方的葫蘆島，與德國資本開始大規模建設港灣。葫蘆島的建港如果完成，因張學良所建設的兩大幹線，吉林與黑龍江省將與葫蘆島聯結起來，由此，中國將能把東北的物產直接輸出海外。

葫蘆島建港也引起問題。當時我們將東北出產的大豆輸出海外，所以我們需要自

己的港口。在大連，我們受到日本許多限制，因此我們很希望有自己的港口。日本人大概很想掌握東北的經濟，但我們當然也盼望發展我們自己的經濟。日本人完全站在不平等的立場來看問題，日本人簡直把中國當殖民地看待。

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張學良一方面致力經營東北，另方面加強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一九三〇年春天，以山西省為地盤的軍閥閻錫山[10]，與馮玉祥、李宗仁合作，開始反蔣軍事行動，要求蔣介石辭職。國民政府軍在河南省南部和安徽省北部與馮玉祥軍、在山東則與攻擊濟南的閻錫山軍激烈戰鬥。在這個史稱中原大戰與反蔣聯合的內戰中，蔣介石的中央政府曾經陷於困境。

此時，人們認為，決定這場戰爭勝負的，將是擁有二十萬至三十萬現代化東北軍之張學良的向背。蔣介石想盡辦法要張學良與國民政府站在同一戰線，並於一九三〇年六月請張學良出兵。

當時，張學良並沒有立刻動兵。迨至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表通電：「防止內亂，維持和平為今日第一急務，」公開表明擁護國民政府，同時對閻錫山和馮玉祥發出警告，要其「靜待中央之處置」，並將十萬軍隊開進華北。由於張學良

「武裝調停」，蔣介石才打敗反蔣聯軍。

因為中原大戰的功勞，張學良於一九三〇年九月，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十一月十二日，張學良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身分參加南京的中國國民黨第三屆四中全會，受到國民政府盛大歡迎。十二月，在北京設立副總司令行營，至此張學良集東北和華北軍事權力於一身。這是張學良二十九歲時候的事情。

這次我們所拿到有關張學良的影片中，也有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張學良前往南京時候的片子，有張學良與蔣介石前去中山陵獻花的場面。蔣介石在台上令張學良站他旁邊，慷慨激昂地向國民政府高官和軍人演說；張學良在他所住房舍舉行盛大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坐坦克車拍照；最後的鏡頭是國民政府有關人士與記者們圍著張學良走上長江的遊覽船。這個片子象徵著張學良的登峰造極，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在南京備受稱讚的張學良如何得意。

相對於公開而華麗的政治舞台，在南京與國民政府高官頻繁接觸，目睹政府實際情況的張學良，對國民政府卻開始非常不滿。

起初，我以為國民政府比軍閥好，但後來我覺得它比軍閥還糟。國民政府的軍隊，一開始我就知道它的作風比舊式的軍隊還差。尤其在政治方面，政治家更是腐

敗。其他部分則好些。

當初我並不覺得怎樣，但到南京以後面對的難題愈來愈多，令我非常不滿。當日的國民政府，我可以「爭權奪利」這四個字來形容。

九一八事變前夕

張學良經營東北，與滿鐵的衝突日趨明顯，幾乎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的事實。

滿鐵——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被喻為日本在滿洲的「生命線」。俄日戰爭之後，日本為經營購自俄國的中東鐵路而創設的這個公司，不僅鐵路，而且經營撫順煤礦和鞍山鐵礦，是一家支配整個東北經濟的日本國策公司。

可是自張學良在滿鐵東邊和西邊建設與其並行的鐵路以來，在滿洲多年擁有獨占地位的滿鐵受到很大威脅。日本政府認為，這不僅是對「滿鐵」的威脅，而且將威脅到日本在滿洲的權益。

東京銀座有一個團體叫做「滿鐵會」。這是前滿鐵社員的親睦團體，目前有六千會員，每年十月在明治神宮召開會員大會，對曾經安置於滿鐵總裁辦公廳的明治天皇銅像行禮。一位前滿鐵社員說，滿鐵是建立於日本在日俄戰爭中苦鬥上的「明治天皇

遺產」，這座明治天皇銅像便是它的象徵；日本戰敗後，大連神社的神官將其帶回日本，安置於明治神宮。許多滿鐵社員強調，日本人必須固守明治天皇時代流過許多士兵之血才獲得的日本的「生命線」——滿洲。

因此就他們來說，張學良無疑是敵人。昔日的滿鐵社員森山誠之氏說：

從一九二九年，滿鐵的貨物減少，運費收入大減。由於出現了與滿鐵對抗的並行線，競爭非常激烈，滿鐵的經辦貨量和收入遞減，經營日趨發生問題。由於使滿鐵日暮途窮的是張學良，因此張學良成為（我們的）眼中釘。

事實上，滿鐵的經營從一九三〇年即開始惡化。旅客收入從前一年的一千七百四十五萬日圓減少到一千一百四十六萬日圓，貨車收入由一億一千一百零八萬日圓降到七千七百九十三萬日圓。鐵路事業的利潤，從七千五百萬日圓減少到五千八百萬日圓。又，次（一九三一）年的營業損失三百四十萬日圓。

不過，根據某滿鐵社員的說法，滿鐵經營惡化，與其說是因為張學良建設的並行線，毋寧是當時世界經濟恐慌影響的結果。

的確，（滿鐵）的經營是在惡化，但這不是因為張學良（鐵路）包圍網所造成，而是當時的不景氣所致。

實際上，世界經濟大恐慌也波及滿洲，滿洲的特產大豆等農產物價格由之大跌。

由此，貨物流通減少，滿鐵的營業受到影響。

但到一九二九年，張學良繼打通線、吉海線也降低運費以後，更促使滿鐵經營不佳，也是事實。

一九三一年，滿鐵停止了定期的增薪，夏季獎金也減半。當時的滿鐵爲了節省經費開支，解雇了月薪一百五十日圓以上的高級職員。

因此，許多職員都覺得，事情已經發展到不是滿鐵這樣蕭條下去，以至日本從滿洲撤退，就是中國必須屈服於日本。

滿鐵經營欠佳，意味著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發生動搖，因而加深了居留滿洲的日本人和關東軍的危機感。由此，他們的矛頭也自然而然對準張學良。

與佐分利貞男的接觸

田中（義一）內閣崩潰之後，推動日本外交的是外相幣原喜重郎[11]。相對於田中首相之強硬政策，他採取「協調外交」，不主張使用武力，「軍閥外交成爲過去」說受到肯定。

而受幣原之意，被提拔爲中國公使的便是佐分利貞男[12]。佐分利是曾經以隨員身分參加過日內瓦裁軍會議和華盛頓會議的精英外交官，出席一九二五年召開於北京的

「中國關稅會議」時，爲中國要人所信賴。由於這種原因，幣原說服原定駐蘇公使的佐分利，改任駐中國公使。

一九二九年八月，佐分利前往南京，開始從事準備修訂中日條約的交涉。他的意圖是，修正不平等的中日條約，並與國民政府建立平等的外交。他這種態度，也受到中國歡迎。此時，張學良也與佐分利交談過。

我與佐分利氏在日本領事館談到深更半夜。那時，滿洲有許多懸案等著解決。佐分利氏說：「我回去日本以後，將盡我最大的努力。」我答說：「我也將盡我所能，能做的我一定會去做。但你們不必指示我該做什麼，做不到的還是做不到。」

我跟佐分利氏談得很多，他是個非常好的人。

爲與中國進行正式交涉，佐分利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回到日本。可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佐分利突然死亡。

佐分利猝死，《大阪朝日新聞》報導說：

佐分利中國公使以手槍自殺於箱根。

爲準備開始中日交涉，於二十一日回到東京的駐華公使佐分利貞男氏，二十九



當時的張學良



佐分利貞男

日凌晨在箱根宮之下富士屋飯店第一九七號房以手槍自殺。在重要的對中國交涉前夕，佐分利氏死亡，實在很可惜。

佐分利右手握著手槍，手槍子彈貫穿他的頭部，驗屍結果，警察機關斷定是自殺。

但有人認爲，佐分利是左撇子，右手拿手槍有問題。至於他自殺的動機，有人以爲其妻去世，而變成神經衰弱，也有人說是不是中日交涉困難多端，壓力太大所致，但這些都欠缺確實證據。因此，至今還有不少人對其死因表示懷疑。

幣原外相便是對其自殺表示懷疑的一個人。他說：「（十一月）二十七日，我與（佐分利）公使見過面，他看起來很好。絕不像神經衰弱。我不知道他要去箱根，不過從他那健康的態度和行動看來，決不會自殺。如果是自殺，我想不出任何原因。」

佐分利死亡，也給中國當局很大衝擊。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王正廷接到佐分利猝死的消息時，據說改變臉色說：「佐分利公使去世，將使我們彼此的諒解化爲泡影。……這是中日兩國莫大的損失，實在太可惜。」

對國民政府來說，這是在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前夕，失去了最能理解中國的人。

作家松本清張[13]在其所著《發掘昭和史》中，就佐分利公使離奇的死亡說，佐分利被暗殺的可能性很大，同時強調，當時有許多對佐分利的協調外交非常不滿的國家

主義團體。

時至今日，佐分利的猝死還是一個謎；總之，因爲這個事件，幣原外相的和平外交受到很大的打擊。

我認為他不是自殺，而是被殺。當時，日本的軍人發瘋了，不但對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元老和重臣，也用暗殺的方法。軍人這樣失去判斷力，國家還沒滅亡，可以說是神的恩惠。

佐分利氏去世，我非常難過。這時我覺得日本已經完了。我認為，我已經不可能與日本合作了。

當時我對日本非常不滿，但又很清楚中國根本沒有與日本交戰的能力。因此，能讓步的我都想讓步。但那時的日本軍人都已經完全失去理智，所以實在束手無策。我們很想跟日本合作；但這個合作的所謂條件，絕不能說是條件，他們把我們中國人當做奴隸看待。

與日本對立日深

開始覺得日本在滿洲的權益受到威脅的人，對於對中國採取協調路線的幣原外交

逐漸不滿。一九三一年一月，幣原外相在第五十九屆議會，表明日本和中國將探尋共存共榮的道路。對此，滿鐵副總裁松岡洋右[14]抨擊說，幣原外交是「絕對無爲旁觀主義」的「懦弱外交」（原文爲「弱腰外交」）。「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這句話，是松岡洋右喊出來的，而這句話，乃是點燃當時日本民族主義的火種。

事實上，幣原對滿洲的鐵路問題並沒有袖手旁觀，對於將給予滿鐵致命影響的競爭鐵路的建設，曾經指示要予以阻止。但在實際上，一九三一年年初舉行，木村銳市滿鐵理事與張學良政權有關鐵路的交涉，並沒有得到太大效果。張學良雖然肯定幣原的協調外交，但他壓不了東北中國人民怒潮澎湃的排日運動。

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不能只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滿足，還要討回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了。在張學良統治下的東北，中國資本主義和民族工業已有發展。因此，中國和日本的民族主義，在滿洲要正面衝突了。

當時的日本完全是侵略的態度，對此我們看得非常清楚。現在我舉一個例子。譬如旅順和大連，當時旅順和大連的租借期限即將屆滿，所以我們準備收回。

惟我們覺得日本多年來建設了旅順和大連，因而我們提出也考慮到日本立場的解決方策。我們的提案是將這兩個港口變成自由港，並在此地舉辦自由選舉，由居民中

選出負責人治理。其構想是主權屬於中國，但經營管理權屬於居民——日本人。

對日方的回答，我覺得極其悲傷。

「這個城市是我們以武力取得的，想要回去，儘管可以武力拿回去！」

這等於說，如果想要旅順和大連，以戰爭來決勝負！

在此種情況下，一九三一年發生了加速中日兩國對立的事件。七月間，遷居長春近郊的朝鮮人與當地中國人發生糾紛，在朝鮮引起排斥中國人的暴動，因而中日間緊張升高，是爲所謂萬寶山事件[15]。

八月，發覺中村大尉被殺事件。參謀本部的中村震太郎上尉爲搜集情報，潛入禁止日本人旅行的興安嶺地區，於六月二十七日被中國軍隊槍殺[16]。中國當局起初否認這個事實，迨至八月十七日發表其眞相，居住滿洲的日本人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

「事態演變至此，眞一觸即發。如果這樣被壓迫下去，只有坐而待死。因此全滿日本人站出來呼籲關東軍，說『軍在幹什麼』，『關東軍被迫到這種地步，還在搞什麼！』」當時的滿鐵職員森山誠之，就那時居留滿洲的日本人的情緒這樣回憶。

關東軍占有東北的計畫

面對滿洲這種情況，欲以軍事力量一口氣解決的，便是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17]中校。石原被認爲是日本陸軍的頭號精英，一九二八年十月出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他結合他對拿破倫和斐特烈大帝的戰略研究與他的日蓮宗[18]信仰，主張所謂「世界最終戰論」。一九三〇年，他秘密完成擬以武力占領滿蒙爲日本領土的計畫。

山形縣鶴岡市立圖書館保存有當時石原寫的構想（計畫）。它說，將來的世界，將由東方文明的代表日本，與西方文明的代表美國兩國之間的世界最終（後）戰爭來決戰。爲準備這場戰爭，日本必須趕緊增強國力，更得把滿蒙併爲日本領土。石原認爲，如果能以滿蒙爲日本領土，其農產品可解決日本的糧食問題，亦能成爲日本重工業的基礎，而且能幫助經濟大恐慌以後在日本增加的失業者，從而打破經濟蕭條的局面。石原強調：這個軍事行動，必須在美國海軍軍力還沒增強，蘇聯尚未完全從革命混亂中恢復，最遲在一九三六年以前發動。

對於占有滿蒙，雖然沒有像石原那麼尖銳，日本陸軍的中央也有過構想。一九三一年六月，日本陸軍制訂了「滿蒙問題解決方策大綱」；它說，如果不能緩和張學良的排日方針，採取軍事行動也是不得已的事，但認爲關東軍的行動要愼重，並說軍事

行動的發動應該在一九三二年春天以後。

石原稱中央政府即使不接受他的構想，他也準備用軍部的主導（力量）「以謀略製造機會」來實現他的計畫。陸軍省軍事課長永田鐵山[19]大佐支持石原的構想，並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令人從東京把口徑二十四公分的榴彈砲偷偷運到奉天。

譯　註

①關於張作霖被炸死的經過及其眞相，請參閱拙譯《張作霖與日本》，由水牛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

②土肥原賢二（一八八三－一九四八），岡山縣人，陸士第十六期、陸大畢業，曾任奉天督軍顧問、奉天特務機關長，在北京創設「土肥原機關」，有「東方之羅倫斯」之稱，一九一六年升任上將。最積極侵略中國，故中國人稱他爲土匪原，戰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

③秦眞次（一八七九－一九五〇），福岡縣人，陸士十二期、陸大畢業，曾任駐荷蘭公使館武官、奉天特務機關長，一九二七年升中將。後任憲兵司令官、第二師團長，一九三五年編入預備役。

④原文爲參謀本部，但參謀本部在東京，張學良不可能到東京的參謀本部去講這個事，應該是奉天特務機關。秦眞次是當時的特務機關長。

⑤松井七夫（一八八〇—一九四三），愛知縣人，陸士第十一期、陸大畢業，占領南京時的指揮官松井石根大將的胞弟。曾任關東軍參謀、奉天特務機關長、二十一旅團長、中將。

⑥大川周明（一八八六—一九五七），山形縣人，東京大學畢業，法學博士，曾爲滿鐵社員，爲右翼和軍人的理論家，與昭和初期的「三月事件」和「五·一五事件」有關係，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精神有問題而未獲起訴。

⑦床次竹二郎（一八六六—一九三五），鹿兒島人，東京大學畢業，一九一三年當選衆議院議員，曾任原敬內閣及高橋是淸內閣內相，一九二四年，脫離政友會，自組政友本黨，一九二七年與憲政會合併成立立憲民政黨，出任顧問，次年脫離民政黨組織新政俱樂部自任總裁，又次年回到政友會，一九三一年就任犬養毅內閣鐵道大臣，三四年違背黨的決議出任岡田啓介內閣的遞信大臣而被政友會開除黨籍。是一個換政黨最多次的政客。

⑧蔣介石直屬軍隊有五十萬人，如果包括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軍，當在兩百萬人。又，政府該時已有海軍。

⑨常蔭槐（？—一九二九），吉林人，一九二七年出任張作霖的安國軍政府交通部次長，二八年，黑龍江省長，在張學良之下擔任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副委員長。二九年，與楊宇霆被張學良處死。

⑩閻錫山（一八八三—一九六〇），山西省五台人，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民國成立以後掌握山西軍政權，主張「山西門羅主義」，參加北伐，抗戰期間受到日軍與共軍攻擊，戰後曾任國防部長與行政院長。

⑪幣原喜重郎（一八七二—一九五一），大阪人，東京大學畢業，曾任外務次官、駐美大使、外相（第一、第二次加藤高明內閣、第一、第二次若槻禮次郎內閣及濱口雄幸內閣），戰後出任首相及衆議院議長。

⑫佐分利貞男（一八七九—一九二九），東京大學畢業，在幣原外相下擔任通商、條約局長，是「幣原外交」的眞正推動者，擔任駐華公使時回國，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手槍自殺。但他的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

⑬松本清張（一九〇九—一九九二），福岡縣小倉市人，小學畢業，作家，以專門撰寫內幕性文章馳名，很長時間曾是日本文人所得最高的一人，尤長於長篇推理小說。

⑭松岡洋右（一八八〇—一九四六），山口縣人，美國奧勒崗大學畢業，曾任上海總領事、滿鐵副總裁。一九三〇年當選衆議院議員，在國會主張「滿蒙是我國的生命線」。一九三三年二月，國際聯盟臨時大會通過《李頓報告》時，退席大會的日本首席全權代表。後任滿鐵總裁。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的外相。戰後，以A級戰犯被起訴，病死。與岸信介、佐藤榮作是親戚。

⑮萬寶山事件，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發生於長春郊外萬寶山，朝鮮農民與中國農民開拓農

田水路發生衝突的事件。七月三日，朝鮮爆發朝鮮人對中國人實行報復的暴動。

⑯中村震太郎大尉事件：一九三一年六月，日本參謀本部的中村，爲偵探東北興安嶺一帶，假裝蒙古人，進入禁止外國人進入之地區，被中國軍槍殺的事件。這是九一八事變的遠因之一。

⑰石原莞爾（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山形縣人，陸士二十一期、陸大畢業，曾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是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關鍵人物。一九三七年出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爆發中日戰爭時主張不宜擴大，而被降級爲關東軍參謀副長（副參謀長）。一九三九年升中將，任第十六師團長後編入預備役。

⑱日蓮宗，亦稱爲法華宗，是鎌倉時代僧日蓮（一二二二—一二八二）創立的宗教。今日的創價學會（其所支持出來的政黨就是公明黨）是日蓮宗的後身，其佛法精髓爲「法華經」。

⑲永田鐵山（一八八四—一九三五），長野縣人。陸士十六期、陸大畢業。曾任駐德國、瑞士武官，陸軍省軍事課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少將）、陸軍省軍務局長。在軍務局長任內，被皇道派的相澤三郎中佐以軍刀殺死於辦公廳。他可以說是昭和時代軍閥明爭暗鬥的犧牲者。

第三章　九一八事變與滿洲國的建立

九一八事變

乃木將軍

張學良對日本怨恨非常之深，一談到東北與日本激烈敵對的那個時候的事，他的口氣便變成很尖銳，他歪著嘴臭罵日本的侵略野心。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日軍奪取

了他祖先之地和墳墓之地，並趕走了他和他的家人。許多日本人聽起來好難過，有如錐子刺在心胸一般的話是沒辦法的。

他雖然很健康，但已經九十高齡了。長時間興奮，對其健康有害。所以他的親信限制我們的訪問，一天不能超過三個小時。

訪問之後吃飯時，張學良也很健談。

——「先生最喜歡吃什麼？」

鮑魚。日本海的鮑魚味道最好。但我不能吃螃蟹。因為牙齒不行。

他把端給他的菜吃得一乾二淨，葡萄酒也喝光。據說他最喜歡這樣熱熱鬧鬧地用飯。

飯局快要告一個段落時，張學良突然回憶過去說：

從前，我去過旅順。你們所知道，日俄戰爭的激戰地……。當時的嚮導是日本軍人，他參加過日俄戰爭。在二〇三高地他對我說乃木希典將軍的故事。我聽了非常感

動。

張學良這樣邊說，邊向我們要筆和信箋。他說他年齡愈大眼睛愈不行。張學良經常戴著淡顏色的墨鏡，就是爲了保護眼睛。他拿起筆，在桌上的信箋寫著：

爾靈山嶮豈難攀
男子功名期克艱
鐵血覆山山形改
萬人齊仰爾靈山

這是乃木將軍的詩。應該作於攻下二〇三高地之時，我很崇仰乃木將軍，故背了我最喜歡的這首詩，雖然是年輕時背的，我現在還能背誦。

——「先生喜歡乃木將軍那一點呢？」

做為一個軍人，我很尊敬乃木將軍。我尊敬乃木將軍的人格。日俄戰爭是日軍的鼎盛時期，打仗時不僅勇敢，指揮官的紀律也好。即使是敵人，也尊重其人格。陪我

爾靈山險豈難攀
男子功名期克堅
征馬不前人不語
鐵人齊仰爾靈山

張學良手書〈爾靈山〉詩，
與原詩稍有不同。



石原莞爾



板垣征四郎

到旅順的日本軍人對我說明了當時的戰鬥情形。乃木將軍時代，日本還有武士道，還有武士道精神。但以後，我認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逐漸消失了。

張學良說出乃木將軍的名字，我們覺得非常意外。但這並不是他對我們日本人的客套話，而是抗日英雄「張學良」對乃木將軍由衷的敬意。

極其溫和的口氣，愈接近尾聲愈不留情，其腦海裡好像很清楚地重現了蹂躪東北的日軍的影子。

一九三一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三十歲。

炸毀柳條湖的滿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時二十分左右，在瀋陽郊外，靠近中國軍營北大營的柳條湖，滿鐵線路軌被炸毀。這是關東軍石原（莞爾）參謀和板垣征四郎高級參謀策畫的謀略。不過根據滿鐵理事木村銳市的說法，這是只毀損兩根枕木，爾後列車仍然能夠通過的小規模炸毀行動。板垣等卻誣指爲中國軍所爲，而獨斷下令攻擊北大營。

那時候，張學良的東北邊防軍有四十四萬人，他帶了主力十一萬人出動於關內，

在瀋陽只有一部分留守部隊。石原、板垣等以此爲良機而發起軍事行動。

> 當時，我在北平養病。我接到九一八事變的報告，是我邀請英國大使正在觀賞梅蘭芳演戲的時候。接到報告以後我遂回家，並指示部下不要抵抗。因為我完全不知道狀況，需要暫時觀察情勢。

事變第二天早晨，張學良在其住院中的協和醫院召開緊急幕僚會議。是項會議決定：日本人違反國際法、破壞東亞和平，我們採取不抵抗主義，一切由國際法來判斷。爾後，張學良派其顧問端納往訪英國公使和美國公使，轉告張學良命令其部下留在東北邊防軍的營房內，對日軍不採取報復行動。

九月十九日下午，張學良對日本記者說：

> 昨天晚上接到來自瀋陽的報告，得知中日的衝突，因為既沒有抵抗的能力，也沒有戰爭的理由，因此我嚴命部下絕對不要抵抗，讓日軍為所欲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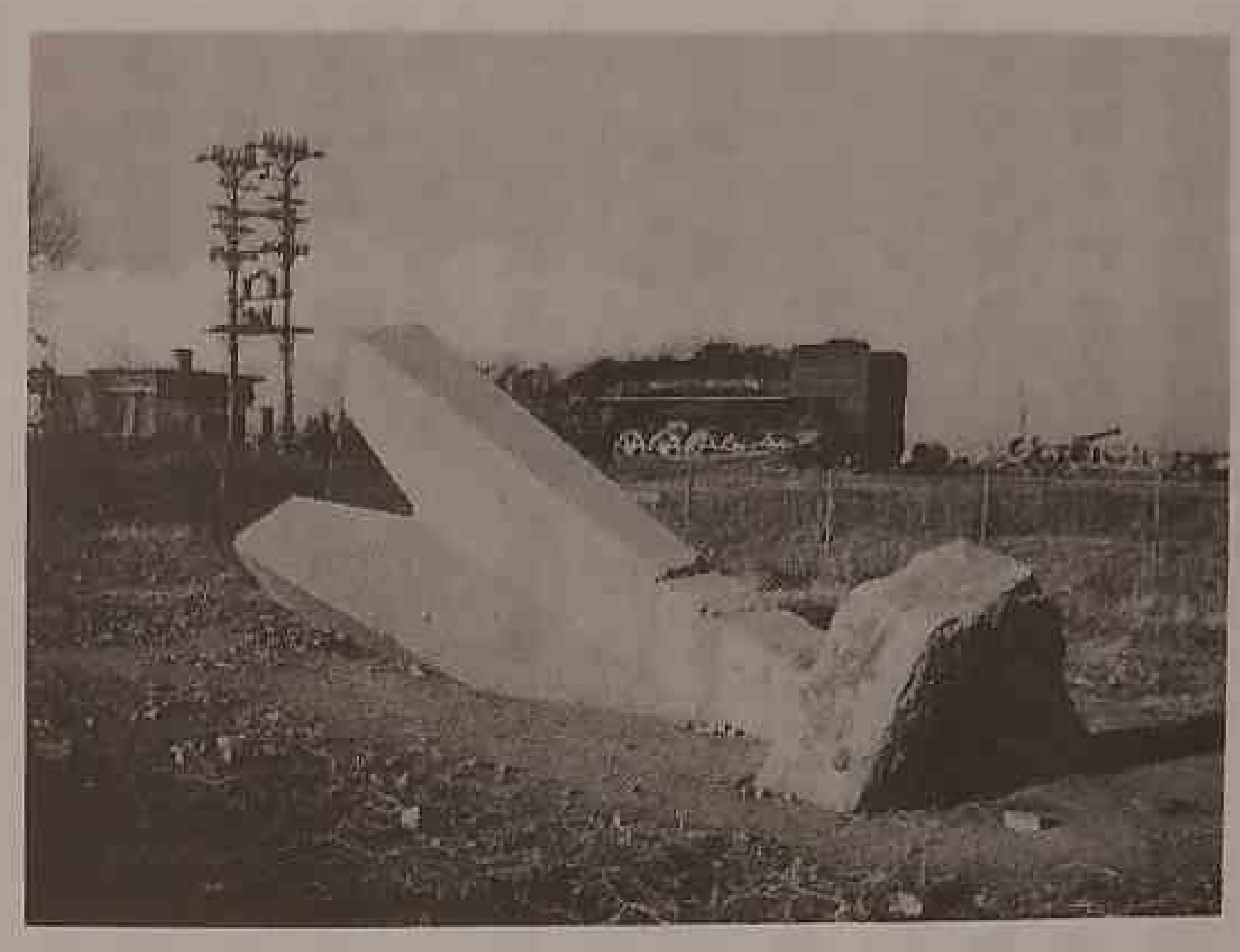
由於張學良指示不要抵抗，所以東北各地相繼被關東軍占領。當時，瀋陽的北大

營有東北軍第一旅長王以哲的六千八百名部隊，因接到張學良不要抵抗的命令，故只有一部分抵抗就撤退。關東軍乘東北軍的不抵抗政策，十九日便占領了瀋陽、長春和營口等滿鐵沿線的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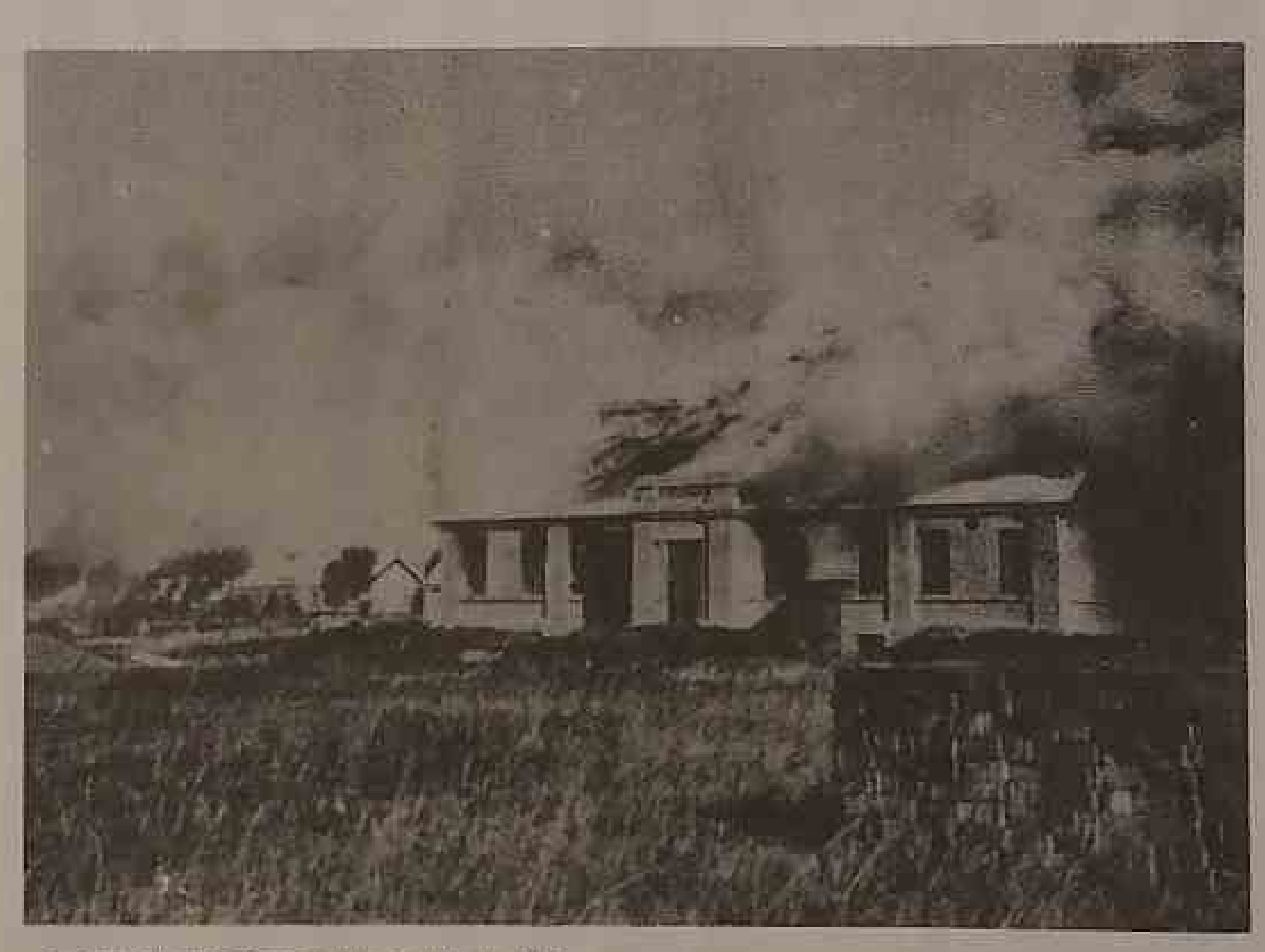
獲得中國軍炸毀滿鐵線並開始攻擊之僞報告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接受石原參謀的建議，命令關東軍出擊，同時請求朝鮮軍增援。九月十九日上午八時三十分，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向參謀本部報告說：他正在準備令混成第三十九旅團出動瀋陽方面。參謀本部指示暫緩，該日若槻禮次郎內閣召開緊急內閣會議，決定不擴大事態，並通知了本庄司令官。

關東軍的石原等幕僚卻不服從，於九月二十日在吉林製造險惡情勢，二十一日出兵吉林。面對這個情況的朝鮮軍司令官，獨斷令混成第三十九旅團越境開向瀋陽。當時關東軍有一萬四千人，但以這個兵力是不可能占領整個東北的。由於朝鮮軍獨斷越境，相反於日本政府的方針，事變更擴大了。

本來，朝鮮軍之出兵中國係出兵國外，故必須有基於日皇大權的敕命，但林司令官沒有獲得昭和天皇的許可就獨斷獨行，很顯然是干犯大權的重大罪行，日本政府不應該允許他的行動才對。可是若槻首相給予「已經出動者沒辦法」的言質，因而二十二日的內閣會議予以通過。同時昭和天皇也沒有追究違反軍紀，並追認了這項軍事行



柳條湖鐵道爆破地點
圖前方倒下者爲日軍所建之滿洲事變戰功紀念碑



日軍攻擊而起火之北大營

動。如此這般，日本政府被派遣軍獨斷造成的謀略和軍事行動拖住，無法堅持不擴大方針，終於踏入泥濘的十五年戰爭（九一八到太平洋戰爭）而後已。

從此以後，關東軍一面對張學良政權的要人進行離間工作，一面擴大占領地區。十月八日轟炸錦州，十月下旬開始侵犯黑龍江省省會齊齊哈爾，並於十一月十九日把它占領。一月三日占領錦州，二月五日占領哈爾濱。去事變僅五個月，日軍幾乎控制了整個東北。在這期間，張學良的東北軍幾乎沒有什麼抵抗就被趕出他們的故鄉。

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

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命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我認為，日本這樣做，不僅是中國的不幸，在國際上日本將受到責難，對日本也不好。我以為日本不應該這樣做。

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

當日我判斷：日本這樣做對她沒有任何好處。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發動戰爭，

我會與他們拚命的。

據聞：日本的幣原（喜重郎）外相或者元老西園寺（公望）說過：

「因為九一八事變，日本受到有如爆炸的傷。」

但我得承認：我對日本判斷錯誤。

——「先生有東方人的美德，所以也許不喜歡自我辯解，不過能不能對剛才所說不得不承認判斷錯誤這一點再作些說明？」

我們判斷事情時，不能只憑自己的主觀來判斷，我們必須站在對方的立場來判斷情況，並考慮對方的利益。

當時我曾站在日本的立場想過。即九一八事變顯然違反國際條約，勢必成為國際問題，所以這種軍事行動不可能成功。九一八事變的這種作法，對日本也是不利的，因此我相信他們不會擴大事件。

剛才我提到，連幣原外相、西園寺等日本的領導者和元老也都說九一八事變是猶若突然挨了炸彈。連日本人都這樣想，因而中國人的我以為日本不會擴大戰爭，應該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而且，不必以九一八事變那樣激烈的手段，東北的權益還是會逐漸轉移到日本人手裡的。

由於發動那樣的戰爭，日本甚至失去了她自己的權益。

——「實際上日本軍部一連串地製造既成事實。那時先生採取不抵抗政策，是不是因爲日本的軍事力量壓倒性地強大所致？還是國民政府指示不要作無謂的抵抗的結果？是先生自己的判斷呢還是？」

關於這一點，從前許多學者的研究認為中央的國民政府指示不要抵抗。但其內容並不是不要抵抗，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是看情況去辦的意思。這等於說，中央是不負責任的。因此，我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有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

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了不抵抗政策。我要再重複一遍：當時我以為日本不會來真的。我覺得我們不能上日本軍部挑釁的當，擴大事端。那時我如果知道日本的真正意圖，情況可能變成兩樣。

與張學良一樣，起初國民政府也沒有料到日軍會作全面性的侵犯。事變初期，以爲這是一時的軍事挑撥事件，故稱其爲瀋陽事件。還沒判斷它是否要發展爲對整個滿洲的軍事占領。（俞辛焞，〈九一八事變期之中日外交史研究〉）

爲幣原外相的不擴大方針所惑，以爲日本政府壓得住日本軍部，可以說是國民政府最大的失算。

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訴諸國際輿論，俾牽制日本的軍事行動，可惜美英爲首的國際安全保障機構沒有對日本施壓的力量。當時世界正值經濟大恐慌，推行著「地區」經濟，同時英國和美國的步調也不一致。

張學良與本庄繁

歷史時或會產生我們無法想像的人際關係。這次我們訪問張學良，問他有關與日本人的交往時，他首先指出的就是本庄繁。本庄繁是發生九一八事變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對張學良來說，是奪取其故鄉的日軍負責人。但到現在張學良對他一直有好感。

本庄繁先生，他對我非常好，我也很尊敬他。我倆彼此都有好感，我去日本時是他陪我的。

張學良與本庄繁認識，是本庄擔任乃父張作霖之軍事顧問的時候。本庄兩度出任駐中國公使館武官，是日本陸軍數一數二的中國通。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本庄擔任過張作霖的軍事顧問。此時本庄非常爲張作霖所信任，任期到了要回國，張作霖曾經親自慰留他。一九二一年張學良訪問日本時，本庄與其同行，兼任「嚮導」。由於這種關係，加以本庄爲人正經，所以張學良非常尊敬他。

可是這兩個人在九一八事變變成敵人，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

本庄繁於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日出任關東軍司令官，抵達旅順。不到一個月就爆發九一八事變，而事先本庄似乎不知道石原、板垣等部下要發動占領東北的謀略事件。此次訪問才公開：發生事變以後，本庄曾經欲暗中告訴張學良表白他的心情。

本庄先生派人說希望與我的部下顧維鈞見面。根據顧維鈞日後的說法，本庄說希望與他在瀋陽（奉天）市內叫做「綠屋」的日本料亭會面。顧維鈞是我的朋友，也是本庄先生的朋友。本庄先生有話要跟我說，因而想與顧維鈞見面。

我知道本庄先生的心情，所以我派了一個很重要的人去見他，這個人就是當時的外交部次長劉氏。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劉氏替我與本庄先生會面。回來之後他這樣說：

「本庄先生說他不知道會發生九一八事變。」

本庄先生於發生事件前兩天到瀋陽，然後回到旅順去。他說如果他事先知道會發生事件，他就會留在瀋陽，不會回去旅順。九一八事件當天晚上，他說他去參加宴會回來已經睡著了。部下對他報告說瀋陽發生事變，由之趕往瀋陽。本庄先生說：「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絕不會讓它發生。」

「一到瀋陽，情況已經變成那個樣子，我不知道應該如何收拾。二、三日，我不曉得應該怎麼辦，因此只向中央報告事件。」我相信本庄先生的話。

因為發生九一八事變以後的二、三日，日本沒有果敢的軍事行動，因此在這期間，許多中國人得以由東北逃出。如果採取軍事行動，他們可以逮捕這些中國人。所以我認為本庄先生的話是真的。

九一八事變與本庄

根據張學良的作證，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並不知道關東軍的謀略，以及擬就未能

收拾事變，暗中欲向張學良說明他的眞意。

若是，在軍司令官本庄不知道的情況下，眞的能發動爲十五年戰爭之導火線的謀略事件嗎？

於是我們訪問了當時關東軍參謀，目前住在東京都目黑的片倉衷氏。他今年九十四歲，有些重聽，但記憶很清楚，對我們的質問，他一一查資料，正確地回答，以避免歷史的作證有所差錯。

本庄先生不知道會發生九一八事變，發動事變的是石原和板垣，本庄先生事先並不知道。

根據片倉氏的說法，剛上任的本庄司令官覺得情況緊迫，這樣下去可能發生事情，但事先並不知道石原要搞炸毀鐵路的謀略。同時片倉參謀事先也不知道這個謀略。

九月十八日晚上，一發生柳條湖的炸毀路軌事件，片倉氏馬上趕往旅順的參謀長官邸。

參謀長官邸前面有一棵柳樹，在這柳樹底下，新井、武田、中野和我等參謀交談。此時新井參謀說「這或許是謀略」，大家也都這樣猜想著。但如果我們不協助、不採取行動的話，它將成爲第二河本事件。所以大家覺得應該予以協

助，俾一舉解決滿蒙問題。（《歷史月刊》從今年九月份起，開始連載片倉衷在爆發九一八事變當時所撰寫，拙譯《九一八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請參考——譯者）

所謂河本事件，如所周知，在其三年前，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所發動的「炸死張作霖事件」。事件發生後，參謀們略知這是石原和板垣的謀略，但如果置之不理，日後被公開其眞相的話，日本勢必非從東北全部撤退不可，因此大家決定協助，採取軍事行動。

當天，本庄造訪大連的野田畫家，欣賞油畫以後於下午十時左右回到家裡。下午十一時多，板垣高級參謀來了「在瀋陽中日衝突已令獨立守備隊及駐紮聯隊出動之緊急電報」。於是本庄於上午零時前往旅順的司令部，召集幕僚，與板垣通謀的石原參謀則建議本庄下達攻擊命令。此時，本庄是想集中兵力於瀋陽附近，以解除中國軍之武裝的。但爾後，與東北軍交戰中，得悉中隊苦戰，中隊長野田中尉受重傷以後，本庄才不得不採取軍事行動。戰後石原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供述說：「本庄司令官閉上眼睛沉思默想大約五分鐘，睜開眼睛就一般形勢作了十分判斷以後說：『好，以本人的責任來做。』而以堅定的決心下達了命令。」

然後本庄與其幕僚們前往瀋陽，以因應事態的急變，結果是按照石原、板垣所計

畫的「劇本」進展，本庄予以許可。但決心這樣作的本庄，其內心似乎充滿了痛苦。尤其關東軍要決定派兵吉林時，開會開到深更半夜。對於不輕易決心的本庄，板垣說服到黎明，才使本庄裁決。

擁立宣統帝

如上所述，本庄並不知道石原和板垣的謀略，爆發事變之後卻追認了他們的獨斷獨行，選擇了命令軍事行動的最高負責人的立場。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之下，他還是想請回來張學良，以便進行交涉。

片倉氏說：「本庄先生希望張學良回來，故命令打電報給張學良回來收拾時局，但張學良沒有回電。」

張學良不應答是理所當然的，而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自己命令攻擊東北軍，而又打電報的本庄的複雜立場。

事變爆發四天後的九月二十二日，關東軍首腦聚會於瀋陽市內的瀋陽館，討論解決滿洲問題的方策。此時，石原和板垣提出了老早計畫好的，擬在滿洲建設新國家的方案。當時，根據片倉氏的說法：

大家討論了要以誰為首腦的問題，宣統帝溥儀、其弟弟溥傑，和孔子的子孫都

成爲討論的對象。

最後，幕僚會議作成「滿蒙問題解決策案」，其第一方針這樣寫著：

樹立受我國支持，以東北三省和蒙古爲領域，以宣統帝爲首腦的中國政府，使其成爲在滿各民族的王土。

其第二要項又說：

國防和外交，依新政權的委託由日本帝國掌理，以及管理主要交通與通信。內政及其他則由新政權統治。

即此時始確認擁立宣統帝溥儀爲日本的傀儡政權，日後的「滿洲國」的國家構想。

此時本庄認爲已經不可能請回張學良採取日滿合作的政策，因而將上述方案作爲關東軍的全體意見向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報告。至此，他們完全否定張學良統治東北，關東軍的行動遂遵循這個「解決方案」，往建設新國家的方向邁進。

曾經準備擁立張學良作皇帝的土肥原賢二，這次轉而奔走拖出清朝最後的皇帝，宣統帝溥儀。十一月八日，土肥原在天津製造暴動，並乘其混亂把溥儀帶往營口。東京大地震時屠殺大杉榮的甘粕正彥在那裡等著。被甘粕軟禁的溥儀，後來被擁立爲「滿洲國」的執政。



本庄繁



「滿洲國」皇帝溥儀



溥儀一行離開天津前往營口在船上所攝。
後列左端爲後來出任滿洲國國務總理之鄭孝胥。

把張學良的財產運到北平

張學良和本庄繁雖然完全分道揚鑣，但他們兩個人之間還存在著古代的武士道。本庄把張學良遺留在瀋陽的財產，用火車專車運到北平張學良處。在以謀略爲家常便飯的關東軍，還有像本庄這樣有誠意和重視榮譽的人士，既難得又令人覺得寒心，因此張學良的記憶也就更加清楚。

本庄先生把我的財產裝載於二輛貨車，運到北平來。同時派專人帶來了他的親筆信。我對這個人說：

「我不能接受這些行李。本庄先生和我雖然曾經是好朋友，目前卻是敵人。他對我這樣做，我好像受到侮辱。」

據傳，往昔美國的華盛頓，對戰爭時看守他房子的部下曾經這樣說過：

「我作為軍人在打仗，不是為保衛自己的房子而作戰。你們這樣作無異是侮辱我。」

當時我的心情，與華盛頓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我對本庄先生的使者說：

「請把這些行李帶回去，並將我的房子恢復原狀，否則我要把這些行李燒毀。但

這樣做將是對本庄先生的侮辱，因此還是請你帶回去。」

這是表示張學良軍人風度的證言。但張學良送回去的行李，此次問了片倉氏的結果，並沒有運回到關東軍。在戰亂的忙亂中，這些行李「失蹤」了。

陸軍上將自殺

一九三二年九一八事變一年後，本庄「凱旋」日本。從神戶到東京，沿路人山人海歡迎「滿洲國建國之父」本庄將軍，九月八日在皇宮，昭和天皇賜以詔敕。此時昭和天皇問他說：

「據聞，九一八事變是一部分人的謀略，是不是這樣？」本庄答說：「職後來也聽說過一部分軍人和民間人有過謀略，但關東軍與職當時絕對沒有從事過謀略。」據說昭和天皇對這個回答非常滿意。

因而日後本庄很受昭和天皇的信賴，就任侍從武官長，成爲昭和天皇的親信。而作爲現代史資料非常有價值的紀錄「本庄日記」，就是在他侍從武官長時代撰寫的。

日本戰敗那年，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本庄繫切腹自殺。作爲九一八事變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本庄被指定爲戰犯。據說，被發現時，本庄面向皇宮端座，依

照切腹的正統方式把肚子割成十字形三次，割心臟三次、脖子三次，完全割裂頸動脈，伏著。

他出生於兵庫縣多紀郡丹南町。對於一般人，說是丹波篠山或許比較容易懂。從大阪搭火車大約一小時的山村是本庄的故鄉。每年本庄的忌辰，在其菩提寺的願勝寺都舉行本庄會。今日，曾經受到本庄照顧的人，為緬懷其遺德，從日本全國各地來參加。有人說，本庄是品德的將軍，他去世後，還有許許多多人懷念他的為人。

本庄繁的長子本庄一雄氏夫人登美子女士認為，本庄繁是個非常重視榮譽的人，她說：

有人說本庄是負九一八事變的責任而自殺，但我以為他最擔心日皇被追究戰爭責任。在其遺書中，他說九一八事變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他要負一切責任。本庄常常對他的兒子一雄說作為一個軍人的精神準備，去世後也沒有留下什麼財產。

在其菩提寺的願勝寺，有本庄自殺前一個月寫的〈滿洲事變的本質〉一文。

這是以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為前提而寫的，而從「關東軍為自衛而站起來，只為自衛而行動」這些話，我們可以知道他是想為日本的立場辯解，但同時也可以窺知本庄對九一八事變的一些想法。

在此文中，他就張學良說「常與其接近，私交匪淺，而且我知道他非常聰明」。當時張學良將軍如果在滿洲……，即使不能防止事變之發生於未然，我相信事變不會那樣擴大，甚至於或許能夠轉禍爲福，從而使其成爲日滿關係乃至日華兩國關係全面正常化的開端。思及爾後日華關係變遷，實在非常可惜。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本庄對張學良的眞實感情。但儘管個人感情再親密，在歷史的奔流之中，日後他倆所走的道路，何其不同！

張學良總結有關本庄的訪問說：

本庄先生是令我很懷念的人。如果我有機會再去日本，我一定要去掃本庄先生的墓。一談到本庄先生的事，我便很難過。

「滿洲國」的建立與溥儀

幾乎占領了整個東北的關東軍，開始具體化其早先計畫好的新國家構想。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雇用天津的中國人製造暴動，乘其動亂把清廷最後的皇帝宣統帝溥儀帶出來。藏在汽車後面行李廂從天津逃出來的溥儀，於十一月十日化裝搭乘日輪在營口登陸，前往旅順，住進大和飯店。

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說服大傷日軍腦筋的馬占山，以要令其做黑龍江省長爲條件歸順。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召集奉天省長臧式毅、吉林省長熙洽、黑龍江省長張景惠和馬占山到瀋陽，召開新國家會議。於是創設東北行政委員會，二月十八日宣布獨立。三月一日，由張景惠正式宣布「滿洲國」建國。三月九日，溥儀就任「滿洲國」執政。

「滿洲國」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實施帝政，溥儀作了「滿洲國」皇帝。

「滿洲國」雖然以「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爲號召，但在實際上，外交、國防係由日本掌握，主要交通和通信也都在日本人手裡。「滿洲國」名副其實是日本的傀儡國家。

北京市護國寺街——在擁有古老風情的四合院的一隅，「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弟弟溥傑，愛新覺羅溥傑氏靜靜地生活著。我們於一九九〇年十月訪問了溥傑。九一八事變當時，溥傑氏留學於日本的陸軍士官（軍官）學校。他說在九一八事變以前他就發覺日本對東北有野心，並想利用他哥哥溥儀。

當時陸軍士官學校的教官中有一個叫做吉岡安直的人物，他一天到晚想爲日本如何來利用我的哥哥溥儀。九一八事變之前他曾對我說：「張學良在東北爲所欲爲，因爲缺德，我們必須把他趕走。這樣你哥哥就有希望了。屆時要請你哥

哥到滿洲。」這時我發覺日本對滿洲有野心。我哥哥到東北以後，或許想以「滿洲國」為本錢來統一中國也說不定。但實際上是受到日本種種勒索，屈服於日本的壓力。

在天津時代，張學良與日後的「滿洲國」皇帝溥儀有來往。

我與溥儀及其弟弟溥傑都認識。有一天，在天津的飯店吃早餐的時候，溥儀突然一個人來。我問他：「外出嗎？太好了。」並勸他說：「讓您做皇帝時代身邊的那些人走路怎麼樣？他們在您身邊只想得到些利益而已，今天您從他們那裡逃出來我很佩服。到南開大學讀讀書如何？如果不喜歡南開大學，到美國去進修怎麼樣？」我又忠告他：「您原來是皇帝的身分，但今後要好好做一個平民。若是，將來有一天中國選舉總統時，您或有資格當選為總統。您如果老跟這些人在一起，您一定會被他們利用，丟掉您的腦袋瓜。」

李頓調查團

國際聯盟責備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軍事行動，並於一九三二年三月派遣李頓調查團到中國來。該調查團在上海、南京和北京受到中國方面歡迎。張學良在北京歡宴

李頓調查團，並抨擊日軍在東北的不當行動。

我們眼看事態束手無策，遂以為國際聯盟會幫助我們而寄予一線之希望。但國際聯盟只是嘴巴講講，對日本一點影響力也沒有。因此我只有在人們面前說個明白，並且我知道我只能這樣做。於是我對國際聯盟不抱任何希望。九一八事變從而成為二次大戰的導火線。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李頓調查團發表其報告書。報告書認爲成爲九一八事變之開端的，在柳條湖的日軍軍事行動「不是合法的自衛措施」，並斷定：「(我們)以爲現在的政權(滿洲國)不是純粹和自動的獨立運動所實現的。」

爲審議李頓報告書，國際聯盟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開理事會，日本的松岡洋右代表抨擊李頓報告書不遺餘力，同時再三與表示願意接受以報告書的提議作爲解決問題之基礎的中國代表顧維鈞激烈辯論。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由中日兩國以外的理事國所構成的十九人委員會，全體一致通過李頓報告書，和以不承認「滿洲國」爲內容的該委員會報告書。二月二十四日，國際聯盟大會通過十九人委員會的報告書，松岡代表演說「日本不能接受」，率

領日本代表團退席。

日本於三月二十七日正式退出國際聯盟。從此以後，日本在國際社會上一股勁走上孤立的道路。

我覺得我對日本這個國家沒有好好研究，是我的責任。我是根據道理來看日本的，後來我才理解日軍的行動，理解當時的日軍如何瘋狂。日軍不僅對中國殘酷，在其國內也是亂來；如果不聽他們的話，則予以幹掉。日後我才知道這是日本這個國家的現實。我認為如果這樣下去，日本將滅亡。我以為軍人這樣瘋狂的國家日本，恐怕很難生存下去。

與汪精衛的爭執

因為九一八事變而被趕出瀋陽的張學良，在錦州設立臨時政府，準備抵抗日軍。惟因中國的抗日運動激烈化，十二月十五日蔣總司令下台，張學良的政治立場隨之不安定，因而放棄抗戰的念頭，並從錦州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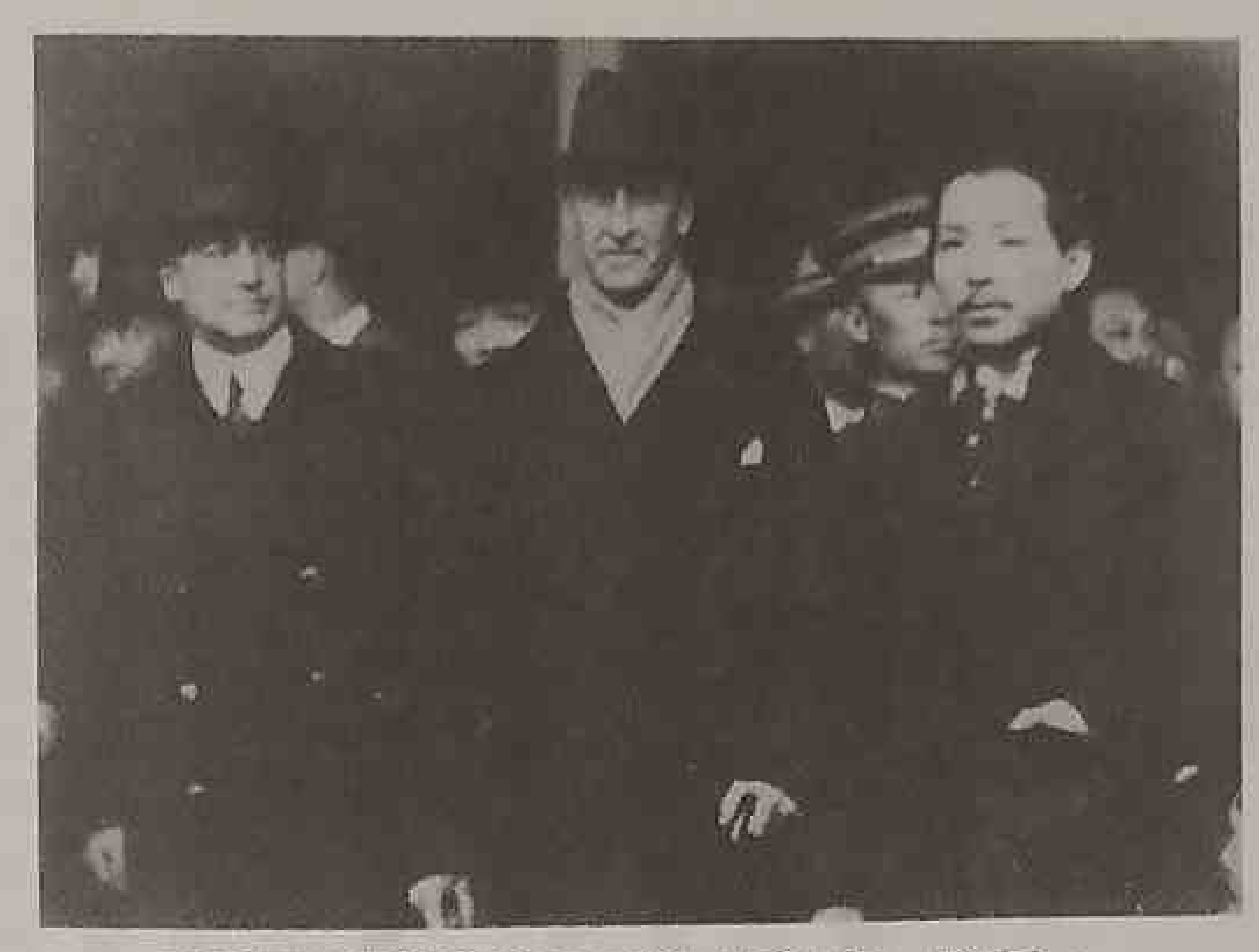
因此，一九三二年一月，錦州終於被日軍占領。被趕出故鄉，違反其意思不能與

日本作生死門的張學良，非常失望。這時，汪精衛往訪張學良。對於抗戰的方法，張學良與汪精衛針鋒相對，從而成爲一九三三年張學良下台的一個原因。

那是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長時候的事情。他到北平來看我，汪精衛帶著蔣委員長的信。他對我說：「你應該與日本作戰。」於是我反問他：「對與日本作戰政府有什麼準備？有沒有勝利的把握？」他回答說：「沒有。」「那麼為什麼要我的東北軍與日軍去拚？」他說：「目前政府面臨外邊的很大壓力。如果你來作戰，政府就有說詞。」

蔣委員長的信是要他與我商量，所以我應該可以表示我的意見才對。因此我說：「如果政府決心作戰，蔣委員長一定對我下命令。如果這樣，情形就不同了，我要服從命令。如果說只是要與我商量，我當然可以表示意見。」對此他說：「如果這樣，我行政院長沒有面子。」但我還是不能接受，我說：「我做不到。你也沒有準備吧。有沒有把握打垮日本？」他說：「此戰必敗。」因而我問他說：「你想以我部下的生命來換取你的政治生命，這是絕不可以的。」因此我們兩人發生很激烈的衝突。

從此以後，張學良與汪精衛的政治對立愈來愈深，一輩子沒有消除。



李頓(中)與張學良(1932年4月11日，北京)。



汪兆銘

這是一個插曲。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舉行了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委員會議。開會典禮之後，與會者在拍攝紀念照片時，發生汪精衛被狙擊受重傷的事件。犯人是晨光通信社記者孫鳳鳴，理由是痛恨汪精衛的對日妥協外交。

此時張學良拚命幫助負致命傷的汪精衛。知道張、汪對立的人問張學良，爲什麼要救其政敵。

不錯，汪精衛被狙擊時，我救了他。當時有人問我：「您為什麼要救汪精衛？」那時我就近看到有人要殺人，有人受了傷。為什麼要管他是誰呢？我看到一位先生倒下去，就趕緊去扶他。當時根本沒有工夫去考慮他是誰，看到受傷的人，自然有那種行動罷了。

侵犯熱河

占領整個東北以後，日軍還不知足，繼續侵略。一九三三年，日軍開始侵犯東三省隔壁的熱河省。

熱河省本來就在奉天軍閥張作霖的統治之下，主席是其部下湯玉麟。一九二八年，張學良接受國民政府的中國統一，實行省制以後，把東北三省和熱河省加起來叫做東四省。故在地理上，熱河省並不屬於東北，但政治上與東北連在一起。

日軍以此爲藉口，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開始進攻熱河省。對日軍來說，作爲鴉片的特產地，熱河省是非常有魅力的地區。

此時，張學良決以一死與日本侵略者周旋，而將東北軍帶到熱河省。

但在東北軍的守備體制還沒完成之前，日軍便分三路侵犯熱河省。這時，東北軍的守備軍大多還沒進入作戰計畫的守備狀態。結果是，熱河省負責人湯玉麟的部隊相繼投降或逃亡，其官兵幾乎喪失了戰鬥意志。湯玉麟本身也以二百部汽車裝載其財產逃亡。三月四日，省會承德被日軍占領。

當時，我的立場非常痛苦。東北軍雖然在我指揮之下，但熱河省的負責人湯玉麟是我父執輩。他把我當做小孩，完全不聽我的命令。我不但命令他要抵抗，而且如果他不聽命令的話，我準備免他的職。但為時已晚。

由於繼東三省之後失去熱河省，其軍事上的負責人張學良遂爲衆人所責備。國民

政府裡頭則以汪精衛爲首，紛紛追究張學良的責任，使張學良的立場極其困難。

張學良手上雖然有兵力卻不能抵抗日本，繼東三省之後又丟了熱河。以汪精衛爲首的南京政府的人，發出「因爲張學良不抵抗而失去許多領土」公開責備信，並給張學良以「不抵抗將軍」的不名譽稱呼。

在這樣內外情勢非常不好的情況之下，張學良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辭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

到歐洲去

因爲蔣總司令的勸告，決定前往歐洲的張學良，在上海治療鴉片中毒。由於痛失東北，張學良沉淪於鴉片，中毒非常嚴重。

當時我的工作極其繁重，沒有鴉片就不能應付，因而中了毒。所以我順著出國的機會，決心把它治好。鴉片中毒之痛苦，你們是無從理解和想像的。一個人因為鴉片變成有如死人，很是悲慘。我以為除非戒掉鴉片，什麼事都做不成，因而專心治療。但這很不容易。



抵達熱河省會承德之關東軍車隊



張學良(右起第三人)與夫人于鳳至(右起第六人)
抵達羅馬後接受歡迎。

張學良治好鴉片中毒，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與其家人往歐洲出發。

那時候，我很想到外國去看看。由於我沒有去過日本以外的外國，因此很想到歐洲去。當時我對法西斯主義格外有興趣，很想知道其究竟。

除歐洲以外，我也很希望到蘇聯，盼望能夠知道共產黨在俄國搞些什麼名堂。當然我對共產黨毫無認識，但很想了解蘇聯的政治。

張學良在義大利逗留最久。在義大利，張學良一家人住在以前就認識的義大利駐華公使吉阿諾伯爵家裡。由於吉阿諾是墨索里尼的女婿，所以張學良與墨索里尼來往頗多。

首先我到義大利，與墨索里尼見面。我屢次與他會面，有家族與家族的來往。墨索里尼給我說明政治情勢，他似乎很知道我在中國的政治立場。他說：「你們中國要求歐洲幫助，也不會有希望。歐洲本身現在頭暈腦脹，歐洲人只看美國。」我剛到義大利時很佩服墨索里尼的事功，因而非常尊敬他。但後來我對墨索里尼很是不滿。

我前往德國時，本來預定與希特勒見面的。惟因我在德國的時間很短，希特勒到

別地方休養去了，因而未能見面。但我與戈林見了面，他對我很好。

在歐洲，我受到法西斯主義很大影響，雖然它是否適用於中國大有疑問。回國之後，在中國我也主張擁護領袖，我相信中國需要擁有強大權力的領導者。

第四章　西安事變

國共內戰

西安事變的舞台——華清池

華清池，唐朝詩人白樂天的〈長恨歌〉提到它，是以玄宗皇帝與楊貴妃之愛情故事的舞台而馳名的風景美麗之地。華清池從西安市乘車大約一個小時，作為國際觀光

都市西安的觀光點，不僅從中國大陸各地，從世界各地也不斷地有人前往參觀。

華清池，中國現代史上一大轉捩點，是把張學良的名字深深刻畫於中國現代史的西安事變的舞台。張學良在這裡監禁蔣介石，要求停止與中共的內戰，一致抗日。

當時蔣介石投宿的五間廳，其辦公室和寢室已恢復原狀，窗上的玻璃，仍有當日槍戰留下來的彈痕。

華清池後面的驪山，徒步爬上大約三十分鐘，在其半山腰，有西安事變另外一個「名勝」兵諫亭（「捉蔣亭」）。這是東北軍叛變，避難到後山的蔣介石被發現的地方。兵諫亭，係基於張學良用兵諫告蔣介石而營建。作爲紀念抗日戰爭之地，今日仍然有許多人往訪。一個大陸的女學生說：「西安事變以後，中國形成統一戰線，舉國能夠從事抗日戰爭，我覺得這在歷史上非常有意義。我來這裡很是興奮，我一直想來這裡，今天與朋友一道來。」

一個男教師說：「西安事變大大推動了我國歷史，令全國人民起來抗日，使中國脫離外國的奴隸狀況。從這個觀點來說，我認爲張學良迫蔣介石抗日，是我國歷史上光輝的一頁。在這種意義上，我覺得張學良對國家的貢獻非常大。」

我們以麥克風請他們表示意見時，他們對西安事變都有大致的知識，對西安事變對抗日戰爭的影響，和張學良的「功勞」予以很高評價。現在中國大陸的小學和中

學，一定要教西安事變。全國共同的小學教科書「歷史·下冊」（用於五、六年級）有三頁，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第四冊」（初中二、三年級用）有兩頁半，詳述西安事變。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對今日的中共政權，西安事變有多麼重要的意義。但這個西安事變卻完全改變了張學良日後的命運，因爲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過了半個世紀的監禁生活。

世上有張學良於一九五六年所撰〈西安事變懺悔錄〉一文。據說〈西安事變懺悔錄〉是張學良於一九五六年爲向蔣介石提出，其所寫有關西安事變的唯一資料。這個「懺悔錄」，不知何故落到台灣的雜誌社手裡，一九六四年七月刊登於《希望》雜誌。因張學良抗議，《希望》手上的東西大部分被收回，但其一部分又被帶到香港，刊載於一九六八年的《明報》（雜誌）第三十二到第三十四期。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刊登於《明報》的部分。

關於〈西安事變懺悔錄〉是不是張學良自己親自撰寫的，尚有爭論。在此次訪問採訪，張學良沒有作肯定的回答。不過，比照〈西安事變懺悔錄〉的內容和訪問採訪的內容，大致是一致的，所以我們認爲應該是他自己寫的。

現在我們根據〈西安事變懺悔錄〉和訪問採訪，來看看西安事變的眞相。



華清池



五間廳

國共內戰與日本侵略華北

張學良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從歐洲回到中國。此時在中國，國民政府圍剿中共已經到了最後階段。

蔣介石自一九三〇年以來，五次圍攻中共的江西根據地，動員二百萬人次之大軍，採取經濟封鎖等一切手段圍剿。

一九三四年，受不了國民政府攻擊的中共終於放棄其根據地。十月，共軍第一方面軍十萬人由江西根據地往西方出發。即其所謂「長征」（西竄）。

中共西竄途中，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所謂〈八一宣言〉），對全國國民呼籲抗戰的必要。中共軍為國軍追擊，於該年年底抵達陝西北部。

開始西竄時，中共的軍力為十萬人，抵達陝北時只剩下一萬多。蔣介石以為消滅中共就在眼前，著手計畫對陝北中共根據地大規模攻擊。

蔣介石一再對中共大舉圍攻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華北加緊進行。因一九三三年五月的塘沽停戰協定，日軍獲得越過長城線以行動的根據（藉口），又因一九三五年六月梅津·何應欽協定，和土肥原·秦德純協定，日軍更加強了對河北和察哈爾的

控制。

因此，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遂以在華北建立傀儡政權，使其由中國分離獨立，即以所謂「華北分離工作」的形態具體化。該年十一月，在依塘沽停戰協定所定非武裝地帶的二十二縣，以殷汝耕爲「主席」，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國民政府面對這種動向，爲避免與日本正面衝突，欲使河北自治化，使其成爲與日本的緩衝地帶，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河北、察哈爾成立以宋哲元爲委員長的冀察政務委員會。

日本侵略華北，以及國民政府的對日妥協政策，使中國人民產生很大的危機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學生要求抗日，舉行大規模遊行，即所謂一二·九學生運動。國民政府雖然以武力予以抑制，但以這個事件爲開端，全中國迅速掀起了抗日戰爭的風潮。

張學良就任剿匪副司令

回到中國以後，我已經不想再帶兵了。我想加強對蔣介石先生的認識和理解，希望做蔣先生的侍從室主任。我想使蔣先生成為像墨索里尼那樣強有力的領導者。但蔣先生沒同意我做他的侍從室主任。

我本來就不希望跟共產黨打仗。但蔣先生要我從幾個工作中選擇一項，說：「國

民對你不滿，所以這次要好好幹。」我問他：「那一個工作最難？」他答說「與共產黨打仗最難」。於是我選擇了最難的，與共產黨作戰。

我本來就不想與共產黨作戰。因蔣先生對我很好，他要我選擇，沒辦法我只好選擇最艱難的與共產黨作戰。但實際上我不喜歡與共產黨打仗，我討厭中國人互相殘殺的內戰。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分離華北工作的形態踏實地進行。在國民抗日趨勢日漸高漲的一九三五年四月，爲攻擊遷移到陝北的共產黨，張學良將東北軍的一部分移至西安，他自己也常常到西安去。該年九月，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並任命張學良爲西北剿匪副司令。〈西安事變懺悔錄〉就那個時候的情況這樣寫著：

共產黨西竄陝西後，我預測討伐共產黨將告一個段落，而留在湖北教練士兵。此時不料奉命到陝西；我因爲在峨眉請蔣先生讓我再出國，所以覺得非常意外。但受到命令時我又這樣想：陝西的共產黨祇有劉志丹的兵數千人，而且與陝西的當局者又是老朋友，他們曾經透過人說願意跟我合作。如果能使西北成爲抗日戰爭的後方根據地，我應該服從蔣先生的命令。於是我入陝西，著手建設根據地。首先建設醫院和醫療品的製造工廠。在平涼購買土地，施行土木建

築。

如此這般，張學良將司令部移到西安，以指揮與共產黨的作戰。西安城內靠近東南的東門的建國路，還有當時張學良大本營的張學良公館，分成東樓、西樓、中樓的西洋建築，現在仍然原封不動地保存著。今日以「西安事變紀念館」，公開給一般人參觀。

東北軍官兵動搖

東北軍對共產黨根據地的攻擊，遭遇到共軍激烈抵抗而遲遲不進。一九三五年九月，被認爲東北軍精英的第一一〇師，在陝北的甘泉和勞山被共軍圍攻，幾乎全軍覆滅。師長何立中戰死，三千七百多人被俘虜，損失慘重。

共產黨對這些俘虜灌輸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觀念，並給他們旅費令其回去，所以東北軍裡日趨瀰漫對共產黨內戰的厭戰氣氛。該年十一月，第一〇九師在直羅鎮被林彪和徐海東部包圍殲滅。由此，東北軍官兵開始動搖。

就自九一八事變被趕出故鄉以來歷盡滄桑的東北軍官兵來說，非與日軍戰鬥，而與共軍戰鬥消耗兵力，是很難忍受的。擔任過張學良行政處長的盧廣績，就當日東北軍官兵的心情這樣說：

蔣介石說共產黨算不了什麼，人數又少，有三個月或者半年就可以把它解決。但實際去打才知道不是三個月或半年就能消滅共黨和共軍，這個戰爭不是那麼簡單。移往西安以後，我們的形勢變成不利，戰死兩位師長，犧牲慘重。我們之中，有人認爲這樣下去，東北軍可能要被消滅，回不到故鄉。

有這種危機感的東北軍官兵，對不與日本打仗，只服從蔣介石命令與共產黨打仗的張學良開始不滿和責難。

——「先生被任命爲勦共副司令，消除共產黨的副司令。從那時候起，先生是否已經覺得與共產黨打仗雖然重要，但抗日更重要？」

我本來就不希望與共產黨作戰。因受蔣介石先生之託，我雖然答應了，但還是不希望內戰。

——「先生率領的東北軍被譽爲中國最強的精幹軍隊。這個東北軍，因日本占領滿洲，被趕出東北。是長期備嚐辛苦的軍隊。

他們也出生於東北，當然盼望回到東北，想回到自己家鄉的意願一定很強

……。」

是的，沒錯。

──「回到東北意味著要與日軍作戰，即東北軍的人目前雖然在西北與共軍戰鬥，但他們卻很想回到東北。為與日軍作戰，他們很想到東北去，對不對？」

他們很想回到自己家鄉。要回到家鄉，必須與日軍作戰，因此不希望與共產黨作戰消耗兵力；即希望保持力量回到家鄉。當時，我的立場非常困難。我的部下嚴厲責難我說「您只要服從蔣介石就可以，但想回去家鄉的我們怎麼辦呢？」我真是很為難。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懺悔錄〉就東北軍的動搖這樣寫道：

我得悉東北軍在陝北的剿匪戰中戰敗，急忙回到陝西。首先一一〇師消滅，師長何立中陣亡，繼而一〇九師消滅，師長牛元峰拒絕投降而自殺。這兩個人是東北軍數一數二的俊才。

兩次慘敗，加倍了我精神上的痛苦，更加強了爲內戰犧牲優秀軍人的悔恨，以及不能小看共產黨的戰鬥力。此種情況震撼了我的心靈，終於令我決心要以「和平」的手段解決共產黨的問題。

回到陝西以後，我召集了會議。爲督促我的部下更努力剿共，我這樣演說：「東北軍如果這樣無能，我必須引咎辭職。」但我的話不特沒被接受，而且引起大家反彈，部下譁然。「我們東北人離鄉背井，跟隨您越過長城而來，但在心裡一直盼望有一天能夠回到自己家鄉。您陷於窮境就不要我們，這是什麼意思？」「您忘記了令尊的仇人，不顧抗日大業，盲目服從上司，只求自己的祿位。您不但不珍惜東北軍的犧牲，還一味把東北人趕上死滅的道路。」

與中共接觸

於是張學良開始摸索能夠和平解決與共產黨之關係的方法。當時張學良對中共有什麼看法呢？

——「對當日的中國共產黨，先生是怎麼看法？」

當時，共產黨很能夠抓住人心。那時中國瀰漫著抗日的空氣，可是國民政府想避免與日本對決。在這過程中，共產黨利用政府這種方針，抓住人心。我覺得共產黨非常善於抓住民心。

——「當時在北京，學生運動非常盛行，尤其十二月九日發生那次著名的學生運動，知識分子的抗日氣勢日熾。據說先生對他們很同情，……。」

請容許我話只談到這裡，我不希望再談下去。

此時我們發現張學良滿臉通紅。他在台灣，必須考慮到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不能無條件地說中共好（張學良赴美期間，中共百般邀他到大陸，但他仍然回到台灣來，說明這段話不盡正確——譯者）。他的話或許說過頭了……。其通紅的臉，顯然有後悔的影子。因此，我們就沒有再問下去。

關於張學良與中共的關係，以下引用〈西安事變懺悔錄〉的一部分：

當是時也，共產黨之停內戰，共同抗日，高唱入雲，實攻我心，不只對良個人，並已搖動大部分東北將士，至少深入少壯者之心，當追剿再見不能成功，

良覺一己主張，自問失敗，徵詢衆人意見，遂有聯絡共產黨同楊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實力，共同抗日種種獻策。良不能委罪於他人；雖然出於他人，但實力有動於我心，該當時，未知共黨眞意何在？研討之下必先設法同共黨取得連繫，方能知其眞意，而良等皆從未同共黨有過來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滬，向李杜徵詢，李派一代表來，名劉鼎者，後自稱曾參加共黨，被捕經保釋放，彼可向滬方負責者接洽，其自身並非全權代表也。由彼介紹，共黨表示，願同良個人一談，但不敢來西安。良到滬，在滬西郊外某西餐館會見一人（彼未露姓名，據劉言，彼似乎潘漢年），談判未得要領。因當時良以招撫態度，而該人言詞含混，未有結果。

王以哲來電言，共匪派來負責代表一人，到彼軍部，請良親爲接見。此時良憶及昔年左文襄收撫馬化龍之故事，同時心中早已存有上述種種，遂飛洛川，會見該人，彼自稱爲李克農，良當時不悉李克農爲共黨中何等人物，談判之下，所提之請，要與後來共黨所提之條件大致相似，良答覆如彼等眞誠，可以容納轉陳，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該黨，表示懷疑，促其首領如毛澤東、周恩來輩來見，彼答以共黨所提諸事曾經其全體表決者，如良誠信，彼可商請毛、周來見，彼立即北返，得其答覆，周恩來願同來見，約請地點和時日；良本先對

李克農之約，諒彼等未必眞敢前來，待周答覆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動扣留之念，再一尋思，偶起『豈有酖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來，余當磊落光明，既然彼等聲言爲國，聲言抗日，何不推誠相見，本前已自動向彼方探索眞意，今其自來，如能化敵爲友，豈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將此一群強悍，爲國家收撫，從事抗日，自以爲對國家、對領袖爲無上之貢獻，並可實現良一往心中諸幻想。即毅然答覆，約周來見，囑周師長福成妥爲款待。

接受這次採訪時，張學良似乎在心裡已經做了這樣的整理（準備）：「該說的事」、「可以說的事」和「絕對不說的事」。而從他目前的政治立場來說，這也許是無可奈何的事。

不知是否因爲要打破半個世紀以上的沉默，他屢次談到相當「深」的部分。我們乘機想問下去，但自覺話說過了頭的張學良便突然閉緊嘴，「我不想再說什麼了，我們就說到這裡」，而故顧左右。

對年輕時候的回憶和時事問題（訪問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沒多久）滔滔不絕，話頭轉到西安事變，他便不大喜歡開口，開始支吾其詞。他大概非常在乎，所以談話逐漸成爲片斷的，採訪的場面隨之開始充滿不調和的氣氛。

西安事變，半個世紀多以前的這個事件，對今日的張學良、中國大陸和台灣仍然是傷痕未癒的事件。張學良的這個態度，充分說明了西安事變的「分量」。

不過，〈西安事變懺悔錄〉多涉忌諱，難怪張學良要要求停止刊載。從其內容來看，這不是為公開發表所寫，而是對蔣介石總統個人提出的報告和懺悔。張學良要能夠毫無保留地統統說出來，恐怕還需一段時間。

兩天的採訪，在有點發窘的氣氛下結束。西安事變他究竟能談到什麼程度？這是我們最關心的事。看樣子，第三天的採訪似乎不能有太大的期望，我們心情有些沉悶。

第二天晚餐時，張學良的不高興已經好了；又變成好好先生張學良，似乎一個一個地看著我們的臉坐上餐桌，並開始飯前的禱告，這是虔誠基督徒張學良每天的習慣。可是他的禱告詞令我們很驚奇，而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緊張氣氛。

上帝，請給我說該說的，不說絕不該說的嘴。感謝上帝賜予我生命。阿們。

朱慧姬小姐把這句話翻譯給我們聽時，我們都笑出來。張學良以充滿愛開玩笑的表情望著大家，他似乎比我們高一籌。

與周恩來會談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張學良在延安與周恩來會談。會談時，陪張學良到延安的前東北軍軍官還在上海。前東北軍軍官孫鳴九（現年八十二歲）是此時張學良的左右手，西安事變時與張學良同其行動的人物。

孫鳴九目前有心臟病，我們往訪的兩星期以前也因爲心臟病發作而住院。那時他剛出院，但還是很高與地接受了我們的訪問。文化大革命時，由於是前東北軍軍官，他受到極嚴厲的批判，當時的資料和照片全給拿走了。現在他身邊只有張學良送給他的有張學良畫像的懷錶。他說，文革時他一直帶著。

孫鳴九就他陪張學良前往延安會談的情形這樣說：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是我一生不能忘懷的日子。我們於四月八日搭乘飛機由洛川出發，張學良親自駕機飛往延安。飛機上只有張學良、中共派來的劉鼎、軍長王以哲和我四個人。八日下午飛抵延安，我們進入一座天主教堂。與中共代表約好的日期是四月九日，我們從八日晚上就準備歡迎其代表團。當天，我在教會門口迎接了周恩來。

如此這般，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實現了命運的會面。

我在南開大學學生時代就知道周恩來的名字。但不是作為政治家，而是作為一個很能唱京戲的學生。他很善於旦角，演技非常出色。但當時我跟他並沒有什麼來往，因為那時作夢也沒想到他日後會成為那樣的政治家。

——「與周恩來先生見面的印象如何？」

這話應該怎麼說呢？他的確是個非凡的人物。反應很快，對事情的理解很深，談話的反應非常快。他話不多，但能指出要點，很有見識。因此我們一見面便意氣相投，好像老朋友，很談得來。

張學良與周恩來的會談，在很和諧的氣氛中開始。孫鳴九就這個延安會談的情形，這樣回憶著：

周恩來一進房間便開始會談，會談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停止內戰。

對於停止內戰，共產黨與張學良將軍的想法是一致的；但當時的共產黨案是



張學良(左二)自駕飛機進入西安，其左爲楊虎城。



西安之舊張學良公館(中樓)，
圖左爲周恩來一行下榻之東樓。

「反蔣抗日」，張學良的想法則是「聯蔣抗日」，即支持蔣介石，共同對抗日本。此時的張學良的思想，似曾予共產黨以很大的影響。周恩來說，這個問題極其重要，他自己一個人不能決定，必須帶回去請示黨中央。周恩來同時又說：「你從裡頭，我們共產黨從外頭來推動的話，能達到令其停止討伐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目的。」

停止內戰與一致抗日，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但對於其方法，如孫鳴九所說，主張「聯蔣抗日」的張學良與主張「反蔣抗日」的共產黨之間，意見分歧。在第二次周、張會談，對共產黨妥協的張學良，與由「反蔣抗日」轉變其政策到「逼蔣抗日」的共產黨之間，成立了十項協定。

第二次周、張會談的時日，有人說是五月十二日，但並不清楚。最近中國大陸出版的《周恩來年譜》有從五月上旬至中旬之間，周恩來與張學良舉行會談的記載。關於這個會談的內容，〈西安事變懺悔錄〉也有詳細敘述：

>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來會面，約談二、三小時，良告彼，中央已實施抗日準備，蔣公宵旰爲國；雙方辯論多時，周詢及廣田三原則，良答以蔣公決不會應允，周承認蔣公忠誠爲國，要抗日，必須擁護蔣公領導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蔣公舊屬，如中央既決心抗日，爲什麼非消滅日人最恨而抗

日最熱誠之共產黨不止？在抗日綱領下，共產黨決心與國民黨恢復舊日關係，重受蔣公領導，進而討論具體條件（大約如下）：

㈠共黨武裝部隊，接受點編集訓，準備抗日。

㈡擔保不欺騙，不繳械。

㈢江西、海南、大別山等地共產黨武裝同樣受點編。

㈣取消紅軍名稱，同國軍待遇一律。

㈤共產黨不能在軍中再從事工作。

㈥共產黨停止一切鬥爭。

㈦赦放共產黨人，除反對政府、攻擊領袖外，准自由活動。

㈧准其非軍人黨員居住陝北。

㈨待抗日勝利後，准共黨爲一合法政黨，一如英、美各民主國然等等。

㈩抗日勝利後，共產黨軍與國民政府軍一樣，令其復員歸鄉。

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懷疑，彼等言不忠實，願受指揮，意受監視，任何時可以譴責。當時良慨然承允，並表示良有家仇國難，抗日未敢後人。上有長官，不能自主，當向蔣公竭力進言，以謀實現，各以勿食言爲約。……

同周恩來會談之後，良甚感得意。想爾後國內可以太平，一切統可以向抗日邁

進矣。

與蔣先生的對立

「安內攘外」與「攘外安內」

——對蔣介石總統，先生怎麼看法？

蔣先生與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政策不同。對，我們的政治見解不一樣。蔣介石先生主張「安內攘外」，我主張「攘外安內」。

——「我們覺得剛才的回答非常重要。『安內攘外』、『攘外安內』，應以何者爲先，對日本與中國的歷史來說極其重要，先生認爲『攘外』應該優先於『安內』。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對蔣先生的『安內攘外』有意見？」

這個質問很難，其實我與蔣總統一開始就有不同的意見，不過沒像後來那麼對立

就是了。

——「這是不是目的相同，作法不同，順序不一樣，還是目的也是不一樣？」

當然目的不同。我想先對外即與日本作戰，然後再來安內。但蔣先生要先安內，然後與日本作戰。這完全不同。我也許是錯誤，但當時我認為應該這樣做。

說服蔣先生

張學良結束延安會談，前往南京與蔣先生會面，準備坦白告訴蔣先生與周恩來會談的事，並想說服蔣先生停止內戰和一致抗日。但蔣先生不大理張學良，張學良也就未能告訴其與周恩來會談的事實，而一直拖下去。〈西安事變懺悔錄〉就當時的情形這樣寫著：

曾憶在京，某晨，蔣公偕良同車至憲兵司令部，舉行畢業典禮，良向蔣公陳述共產黨有投誠之意，並擬乘時向蔣公直述已與周恩來會面之事，不幸車已抵司令部門前矣……當日夜間本擬再續陳述，因東北軍餉事，蔣公責良時以煩瑣相

擾，並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陳述，因之錯過機會。

共黨曾派葉劍英求見，並攜有雙方停戰計畫和毛澤東之約書，願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軍隊則聽受指揮。良要求彼等須暫向北撤退，以期隔離，給予時間，容余醞釀；彼等認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補給，良曾以巨額私款贈之，令彼自籌。共匪遂撤出瓦窯鋪，向三邊北行。該時共黨在西安設有代表處，鄧發已曾到過西安。救國會、學聯會皆有代表。

如上所述，共產黨與張學良之間，對於停止內戰與一致抗日的作業，著著在進行。張學良一直想說服蔣先生，並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在洛陽與閻錫山對蔣先生建議停止內戰和一致抗戰。但蔣先生很生氣，不接受。

「委員長只安信他身邊者不正確的片面之詞，很是糟糕。曾攄情的詩說：『華山雖高，奈何周圍因黃砂不見事物。』這最適合於委員長身邊者的形容。」（〈西安事變懺悔錄〉，但〈明報〉所刊該文沒找到這些話——譯者）

因此，張學良於十一月一日又想說服蔣先生，但蔣先生在洛陽軍官學校的訓話「痛斥共匪為大漢奸」，以牽制要求與共產黨和談的張學良。張學良在〈西安事變懺悔錄〉就當時的失望這樣說：

蔣公至洛陽，又逢閻百川先生同在，良預想此乃一好機會，不料蔣公在閱兵後

訓話，痛斥共匪為大漢奸，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聽之下，有如冷水澆頭，良欲向蔣公陳情者，至是則絕望矣。沮喪萬分，回至寢室，暗傷飲泣。

良由洛返陝，答覆共黨，一時無法向蔣公請求實行停戰計畫，遂乃共相約商，局部暫停，仍由良負擔向蔣公從容陳情。

與楊虎城密談

在西安，張學良向以前就對停止內戰與一致抗日深表贊成的西北軍領導者，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說明在洛陽發生的情況。

有一《活路》小冊子出，內主張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合抗日（此冊乃出於高崇民之作），但此時良尚未明告楊虎城，擬向共產黨之勾結計畫。不過在某一個時期，楊已知之。至於楊虎城到底同共產黨是何等關係，是如何得以結合，良實不知其詳（彼時楊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確係共黨也）。關於停止剿匪，團結抗日，楊深表同情。力促以向蔣公進言，以期早日實現，節省雙方消耗。迨至良從洛陽返來，心情十分懊喪，對楊談及蔣公難以容納余等之意見，該時良對蔣公發有怨言，並問計於楊，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內戰，敦

促蔣公領導實行抗日之目的。楊反問良，是否眞有抗日之決心？良誓志以對，楊遂言待蔣公來西安，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良聞之愕然，沉默未語，彼露有懼色，良即撫慰之曰：「余非賣友求榮之輩，請勿擔心！不過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譏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討，請其安心，余絕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見也」。（〈西安事變懺悔錄〉）

爾後，與張學良實行監禁蔣先生，成爲西安事變的另外一個主角的就是楊虎城。楊虎城於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到台灣時，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殺死。

楊虎城是個性格很粗野的人，出身與土匪沒有什麼兩樣。當時他走在流行的最前面，其部下有許多是共產黨員。楊虎城受他們很大影響，但他自己並沒有太深的思想。

但楊虎城「挾天子」的建議搖動了張學良的心，從而促使其決心採取「兵諫」的強硬手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生了令張學良憤慨的事件。在上海呼籲停止內戰



楊虎城



孫銘九

和成立抗日聯軍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要分子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史良，所謂救國七君子，被國民政府逮捕。這個事件使張學良深深感覺到要說服蔣先生如何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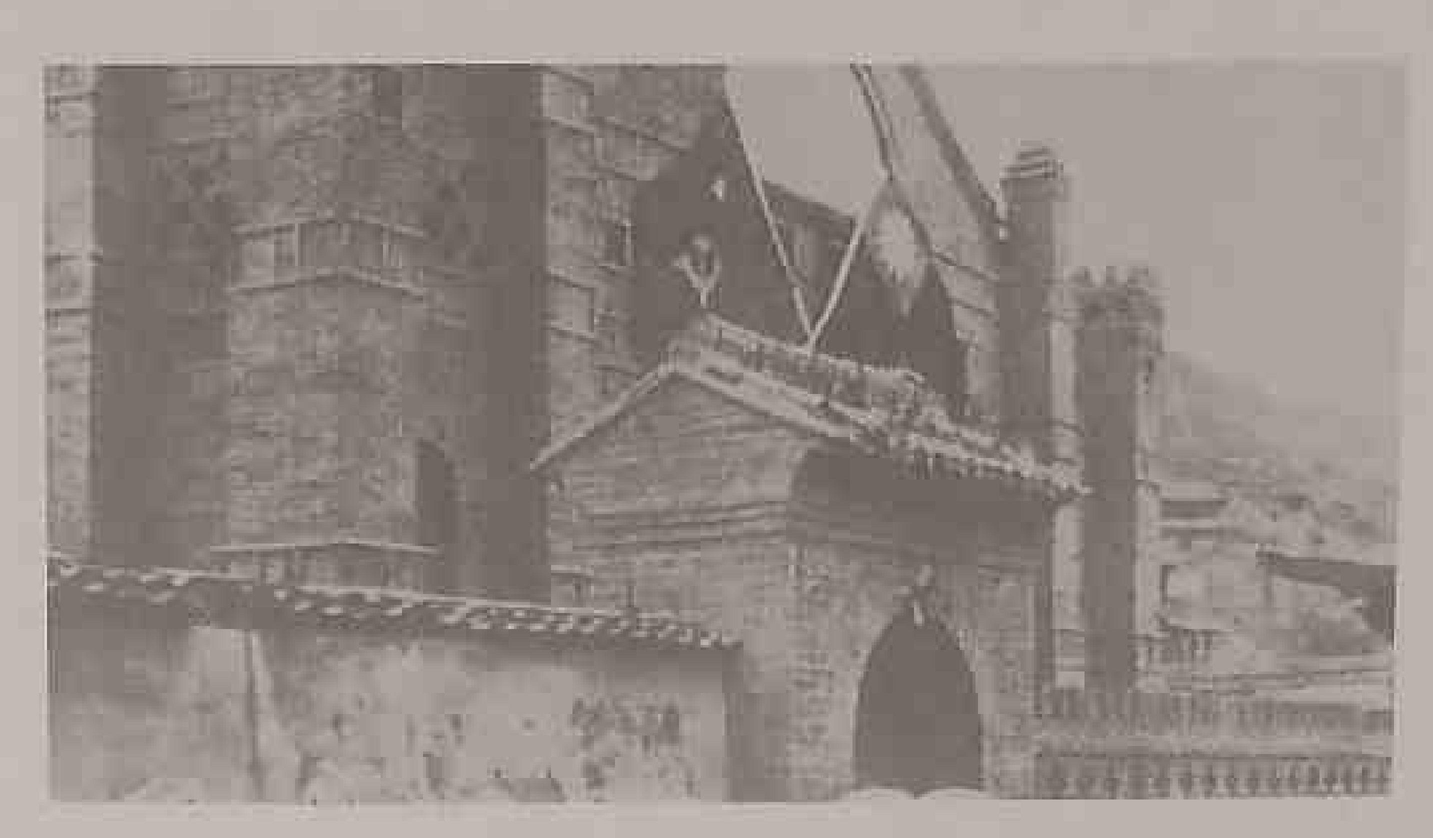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的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軍裡被認爲最優秀的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師在山城堡，被共軍紅一軍和紅十五軍包圍，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戰鬥，二三二旅和二三四旅被殲滅；又第七十八師以外的師也被紅二軍擊破。

震驚於第一軍打敗仗的蔣先生，急忙飛往洛陽。得悉胡宗南敗北的張學良也前往洛陽，十二月三日在第六次剿共軍事會議席上再度主張成立民族統一戰線和停止剿共戰爭。由此蔣先生大發雷霆，於是張學良與蔣先生的意見對立變成感情上的衝突。

蔣先生前往西安

對攻擊共產黨根據地遲無進展感覺不耐煩的蔣先生，爲督促張學良和楊虎城對共產黨的攻擊，於十二月四日親自率領國民政府高官和親信到了西安。十二月五日，在王曲軍官學校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官兵演說，強調與共產黨作戰的重要性。此時，官兵對此演說很反感。盧廣績接受我們的訪問時說：

蔣介石有一天在王曲軍官學校對官兵訓話，在台上踏著腳說：「打敗共產黨以



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會談之天主教堂



洛陽：（右第二人起）閻錫山、蔣介石、宋美齡、張學良（1936年10月31日）。

後，才要來打倒日本。如果有人主張先攻擊日本以後才要攻擊共產黨，那就是反對我的安內攘外政策，即反對我，必須逮捕。」以威脅張學良。

十二月七日，張學良前往蔣先生住宿的臨潼縣華清池，流淚請求蔣先生停止內戰和一致抗日，但蔣先生還是不肯接受，兩人發生激烈口角。至此，張學良與蔣先生的對立到達了最後階段。

一二・九學生遊行

當時西安有來自全國要求抗日救國的學生，西安因而成爲學生運動的「大本營」。而爲學生運動的核心者，就是因爲九一八事變被趕出家鄉的東北大學學生。他們與北京和西安的學生聯繫，展開了要求開始抗日戰爭的運動。

一九三六年十月，在西安活動的兩個東北大學學生被憲兵逮捕，監禁於國民黨部。張學良要求釋放學生，被拒，遂以東北軍的親衛隊包圍西安的國民黨部，用實力把學生救出來。張學良對學生運動很同情，是西安成爲全國學生運動據點的很大原因。

十二月九日，這一天是去年在北京發生一二・九學生運動的一周年，學生們在西安要求停止內戰和一致抗日，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李連璧曾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後

來曾任中共駐比利時大使、陝西省主席、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等職務。這一天，他以學生代表的身分指揮西安的學生示威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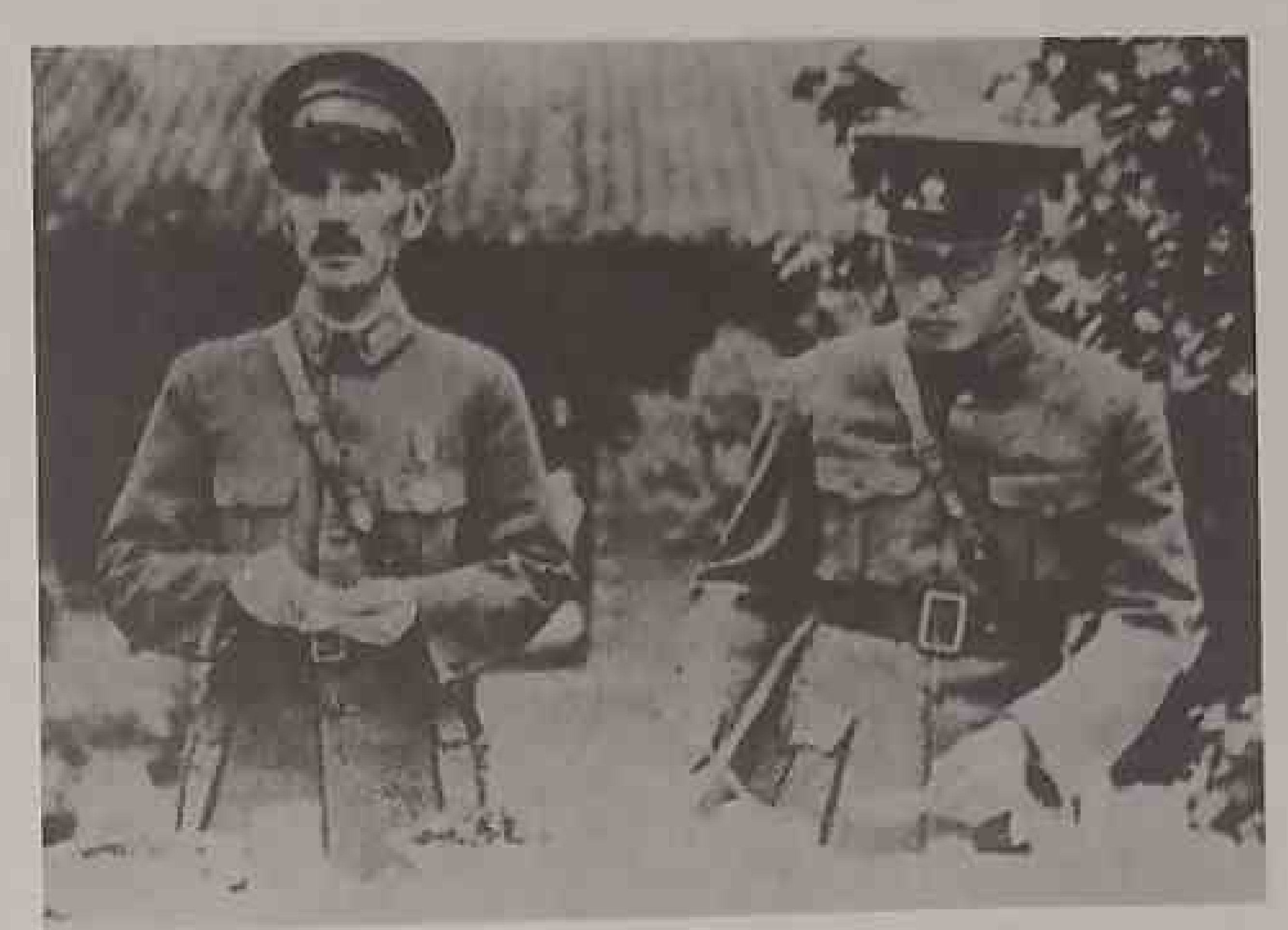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是北京學生一二·九運動的一周年，在西安的學生舉行請願遊行，對國民政府當局要求停止內戰，全國國民一致團結以反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政府的軍警包圍學校，以妨礙學生集合遊行。」（李連璧的訪問）

這一天，張學良命令其部下孫鳴九出動一部分東北軍以保護學生。

十二月九日發生學生示威遊行時，我與士兵一起出動。我們派兵，名義上是與蔣某的軍警一道取締學生遊行，實際目的是保護學生。我們擔心蔣某的憲兵或軍隊加害於遊行隊伍，學生受傷。（孫鳴九的訪問）

學生對西安市內的政府機關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和一致抗日，未能得到滿意的回答，決定到蔣先生住宿的華清池去直接請願。

遊行隊伍前往張學良的司令部、楊虎城的司令部、陝西省政府去請願，但都沒得到滿意的答覆，於是準備前往臨潼的華清池，直接向蔣介石請願，而自西安城出發。到灞橋時，國民黨憲兵隊架著機關槍，排著騎兵。騎腳踏車走在前面大約二十名的學生被憲兵隊逮捕。憲兵說，欲從這裡往裡頭前進者，要予以槍



前往西安督戰之蔣介石(左)，與張學良在華清池。



12月9日之學生示威

殺。遊行隊伍與憲兵隊正在對峙時，張學良將軍乘車子抵達了遊行隊伍面前。（李連璧的訪問）

此時，蔣介石已經准許憲兵隊對學生開槍；因此遊行隊伍如果渡過灞橋前進，勢必發生大事件。張學良拚命說服學生，要他們回到西安。

張學良將軍說，我張學良也是一個愛國的軍人，很想到抗日戰線，我對學生諸君的行動非常共鳴。學生們懇求張學良將軍統率東北軍與日本作戰，也請張學良將軍把他們的要求轉告蔣委員長。張學良將軍答說：「我一定把你們的要求報告蔣委員長。所以請各位回到西安。」但一部分學生喊說：「我們還是要到臨潼，與蔣委員長見面。」欲往前前進。於是張學良將軍說：「請相信我張學良。如果各位相信我，一個星期以內我將以事實來回答各位。」

張學良將軍說完之後，一萬以上學生非常感動，給予很大的鼓掌。學生們大喊「相信張學良將軍抵抗日本」、「奪回東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許多學生哭著，張學良將軍也流了眼淚。（李連璧的訪問）

對學生說「一個星期以內將以事實回答各位」的張學良，因爲這個事件終於決心只有以武力監禁蔣先生，並強迫蔣先生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途，於是命令其部下唐君堯、孫鳴九等人率領東北軍部隊前往華清池，拘束蔣先生。

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召開了東北軍軍長會議，我也參加了。張學良在這個會議上命令要實行兵諫。他給我的任務是前往臨潼的華清池，把蔣委員長帶來，即把他抓來。但絕不可以傷害或殺他。（孫鳴九的訪問）

西安事變

襲擊華清池

我從當軍人的時候起便受教：開始行動就不要顧自己的生命。我當軍人時，家父對我說：「你要做軍人，就把你的脖子經常掛在腰帶上。」他的意思是說，隨時隨地要有不要命的覺悟。因此，從我當軍人那一天起，我便有隨時可以死的覺悟。而當時，我便反對內戰，討厭戰爭；所以我決心犧牲自己，以停止內戰。

張學良與楊虎城，在楊虎城司令部的新城大樓召集東北軍和西北軍的主要軍官，告訴了他們的決心。

我記得張學良對集合在新城大樓的人說過：「被迫得走投無路時，我想到這個

兵諫的方法。我曾以各種各樣的方法想說服他，但蔣先生都不接受。因此只有脅迫他。」我記得張學良以很沈痛的表情說這番話。繼而他又說：「今天請各位到這裡來，是因爲明天不知道有沒有機會講。如果成功自沒有問題，如果失敗，我們將沒有命。派去抓蔣某的人，我已下達命令：如果未能完成任務，我要他們的命。」（盧廣績的訪問）

隔天（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一時，東北軍的主要軍官被召集到張學良公館。張學良說明了自洛陽以來與蔣先生交換意見的經過以後，告訴他們兵諫的決心。上午二時，張學良率領東北軍的官兵進入楊虎城的新城大樓。

上午五時三十分，孫鳴九等東北軍部隊到達有華清池的臨潼。上午六時，他們乘卡車到達華清池門口。門口的警衛問「口令」，東北軍士兵不懂，遂發生槍戰。

張學良指示我們，不要由我方先開槍，惟因警衛開了槍，故我們把他解決了。裡頭的衛兵得知我們襲擊，發生激烈槍戰。本來我們的計畫是要抓警衛的，但沒有成功。

我率領士兵進入華清池，華清池有幾個小池和橋，必須通過這些地方才能到蔣某住宿的五間廳。我們遭遇到激烈的抵抗，非常著急。好不容易趕到蔣某的房間時，他已經離開了。但一摸其床還是溫溫的，可見蔣某剛才還在。（孫鳴九

的訪問）

得悉東北軍襲擊的蔣先生，由後門越牆，避難到華清池後面的驪山。惟越牆時可能腳滑了而跌到牆外的小溝，碰傷腰部。蔣先生雖然受了傷，還是走到驪山的半山腰，所以東北軍官兵沒有能夠馬上找到蔣先生。上午九時，他們終於找到了蔣先生。

我在山的途中抓到了蔣某的親信蔣孝鎮。我問他蔣委員長在那裡，他說不知道，卻往後面看了一眼；我有所感，而繼續往半山腰搜索。沒多久，一個班長大聲喊叫「蔣委員長在這裡」。我趕緊跑過去，此時蔣某剛由岩石間隙要下來。他臉上有好多泥巴，手腳受傷，好像有點緊張的樣子。他一看到我便說：『你如果是我的同志，就在這裡打死我」，而無力地坐下來。我覺得這個場面很危險，因而向他報告說：「我是奉張副司令的命令，為奉陪委員長到西安商量有關與日本作戰事宜而來。」（孫鳴九的訪問）

孫鳴九一行正在偷襲華清池的時候，在西安，楊虎城的西北軍部隊襲擊了國民政府的機關。憲兵隊本部被包圍攻擊，憲兵皆被殺，警察和保安隊也被繳械。機場等重要設施也為西北軍控制。楊虎城的特殊部隊突襲了國民政府要人投宿的西安招待所，一網打盡這些要人。

在驪山被找到的蔣先生，以汽車被帶到西安，監禁於新城大樓的一室。上午十時

三十分，張學良前來新城大樓看蔣先生。

張學良見到蔣某時說：「委員長，嚇了一跳吧。」蔣某大怒說：「你如果是我的部下，就馬上帶我出去，如果不是我的部下，就立刻把我打死。」我覺得蔣某被監禁了，還想作英雄。從此以後，張學良的態度變成「不要急，慢慢來」。（盧廣績的訪問）

此時，張學良對蔣先生說：「關於此次事件的是非，應該由人民去審判。國民如果贊成我們的主張，便能證明代表民意的是我們。」蔣先生對「人民的審判」這句話非常震怒，從此他一概不聽張學良的話。張學良說「您太頑固了」，而離開了新城大樓。

呼籲全國

監禁蔣先生的那一天，張學良和楊虎城通電全國，主張八項，其通電內容大致如下：

失東北已五年，國家主權削弱，領土日益縮小。先受辱訂上海停戰協定，後簽塘沽停戰協定，國民無不為此心痛。最近國際情勢大變，互相勾結欲犧牲我國家民族。綏東戰爭一爆發，民情沸騰，士氣大振。此時中央領袖應鼓舞軍民，

發動全國之全面戰爭。在前線防衛國土之官兵流血在戰鬥，但在後方，外交當局卻仍然意圖妥協。在上海，愛國者七人無辜突然下獄，世界震驚，全國國民痛恨，愛國若犯罪，其前途實不堪設想。蔣委員長為小人所包圍，放棄民衆，誤國之罪重。學良揮淚諫言，屢被拒絕申斥。數日前，學生在西安舉行愛國運動時，令警察槍殺愛國子弟，此為有人心所不能為。為多年來同僚之學良等，不忍坐視，特向蔣先生作最後之勸告，並保障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要求以下各項：

一、改組南京政府，令各黨各派參加，負起救國責任。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即時釋放逮捕於上海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衆之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之集會、結社以及一切政治自由。
七、切實遵守總理遺囑。
八、即時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為我等西北軍民一致之主張。希望諸公遵從民意，誠意採行，開國家

今後生存之路，以贖過去誤國之過失。大義在眼前，不許回頭。我等只尋求貫徹救國之主張與國家之福利，此舉功罪，委諸國民之判斷。

西安事變的衝擊

蔣先生在西安被監禁的消息，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一時傳達到南京國民政府，其要人爲之震驚。何應欽遂召集國民黨中央臨時常會，討論如何因應，以至深夜。常會分成以「爲求蔣委員長安全，不能不顧及國家綱紀」而主張以武力討伐的強硬派，和以「張學良還有說服的餘地，不要輕易採取軍事行動」的愼重派，很難獲得結論。

在另一方面，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於該日下午八時在上海得到西安事變的報告，隔日蔣夫人與孔祥熙等人前往南京。蔣夫人到達南京時，中央常會的大勢傾向於何應欽、考試院長戴季陶等的強硬派。蔣夫人就當時常會的情形，在日後口述的〈西安事變回憶錄〉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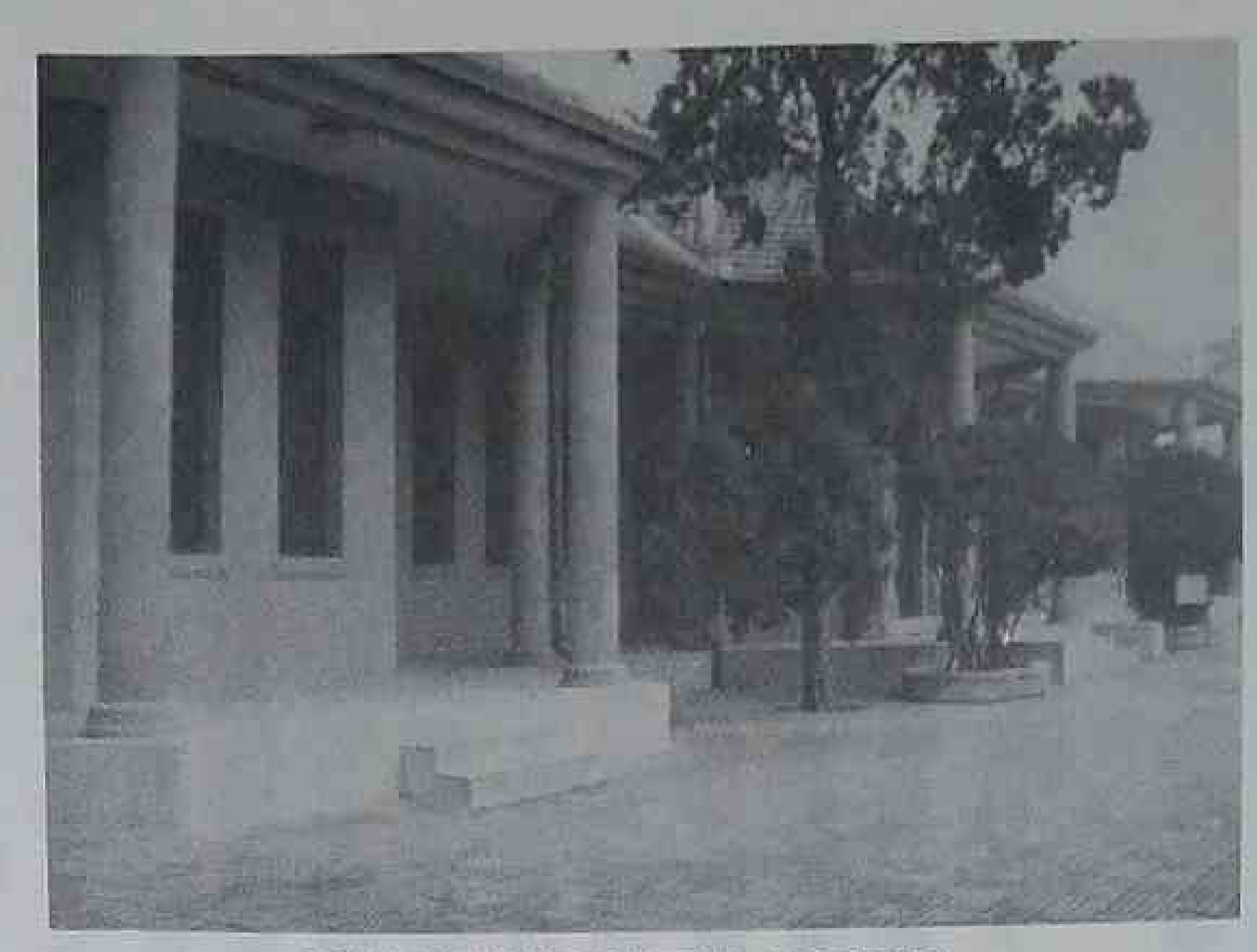
余偕孔部長及端納（余已約彼伴余飛赴西安）匆促入都。時政府中人深受事變刺激，情態異常緊張。中央常務委員會及中央政治委員會已於星期六深夜開會，決定辦法，立付執行；並將叛變首領張學良明令免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及西

北剿匪副司令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命令措辭，異常嚴峻。中央諸要人，於眞相未全明瞭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余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爲其不容諉卸之責任，余更不能不臆斷其爲非健全之行動。軍事上或有取此步驟之必要，委員長或亦盼此步驟之實現，然余個人實未敢苟同。因此立下決心，願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是非得失，將付諸異日之公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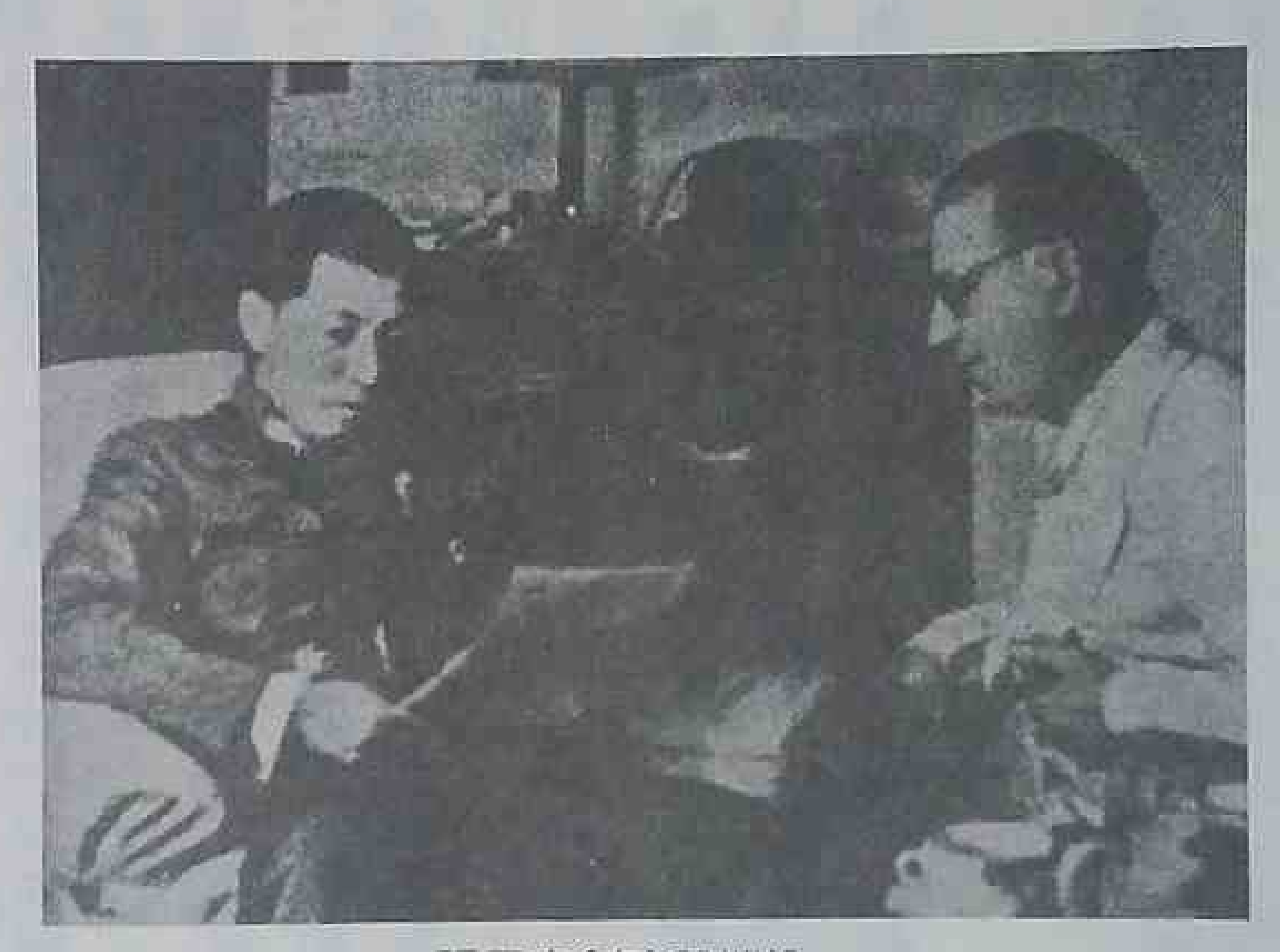
蔣夫人擔心何應欽等國民政府要人之強硬態度，開始摸索如何才能和平解決事變，於是決定請與蔣先生和張學良都是很要好的澳洲人端納（W. H. Donald）前往西安。端納以前爲張學良的顧問，後來出任南京政府顧問。

端納先生從前是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原來是澳洲人。跟他認識以後，我們成為好朋友。他來瀋陽以後變成親友，他為人很好。我的力量減弱後，我把他介紹給南京政府。端納先生自己也承認，他非常喜歡中國，愛中國。我不但受了他的影響，他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多。

十二月十四日傍晚，端納抵達洛陽，在這裡他收到張學良「歡迎前來西安」的電



新城大樓(現爲陝西省人民政府)



張學良(左)與端納

報。十四日端納飛抵西安。就當時的情形，蔣先生在其《西安半月記》有這樣的敘述：

下午五時，端納來見。以一異國人而不辭遠道冒險前來省視，其忠義足令人感動。見余，詢安好畢，出余妻之手函示余。

端納到達，蔣先生似有些放心，遂接受張學良的請求，同意由新城大樓搬到位於張學良公館隔壁的高桂滋公館。

十四日晚上，張學良透過電台廣播說明兵諫的經緯和前述八項主張，同時強調蔣先生安全。

端納確認了蔣先生的情形，於次（十五）日回到洛陽，並與蔣夫人通電話說：「張學良表示他準備陪蔣委員長到南京，其行動雖然錯誤，但自認爲其動機是單純的。張學良希望孔祥熙與您到西安。」該日晚間，蔣夫人與在洛陽的端納通電話說：「孔祥熙因爲健康上的理由，和行政院代理院長的身分不方便到西安，所以請代詢由宋子文或者顧祝同去可以不可以。」

十二月十六日，在西安革命公園，十萬人參加了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主辦的民衆大會。張學良在這個民衆大會席上說明了此次事變的經過，並說這是「以保障蔣介石的安全，促其反省爲目的」。

同一天上午九時，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議下達討伐西安的命令，並任命何應欽爲討伐軍總司令。下午，洛陽起飛的三十架轟炸機轟炸了東北軍的占領地區。南京政府與東北軍、西北軍之間發生新內戰的危險性日高。

面對這種局面的張學良，遂請所扣留南京要人中之一人的蔣方震說服蔣先生；十七日，蔣先生接受蔣方震和張學良的請求，同意命令何應欽停止攻擊三天。並派遣蔣鼎文前往南京。

周恩來上場

毛澤東等中共首腦得知西安事變，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深更半夜。張學良之監禁蔣先生，對中共實在是青天霹靂。

中共幹部之中，雖然有主張把蔣某殺掉的強硬意見，但大部分的人都認爲，應該探詢莫斯科的見解，暫時看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相當愼重。次晨，張學良給共產黨拍電報，要求「擬說明兵諫，邀請周恩來，和共軍南下」。共產黨接受張學良的要求，便派周恩來前往西安調停。

向世界打出第一則西安事變的電報，是日本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松本從孔祥熙的秘書喬輔三得悉西安事變，十二日晚上打電報到東京。

次日，日本報紙大事報導上海專電蔣先生被監禁消息，消息遂傳遍全球。可以說中國國家元首蔣先生遭到監禁，給予全世界很大的衝擊，而各國對這個事件究竟有何種意義，正在苦於判斷；他們更關心蔣先生的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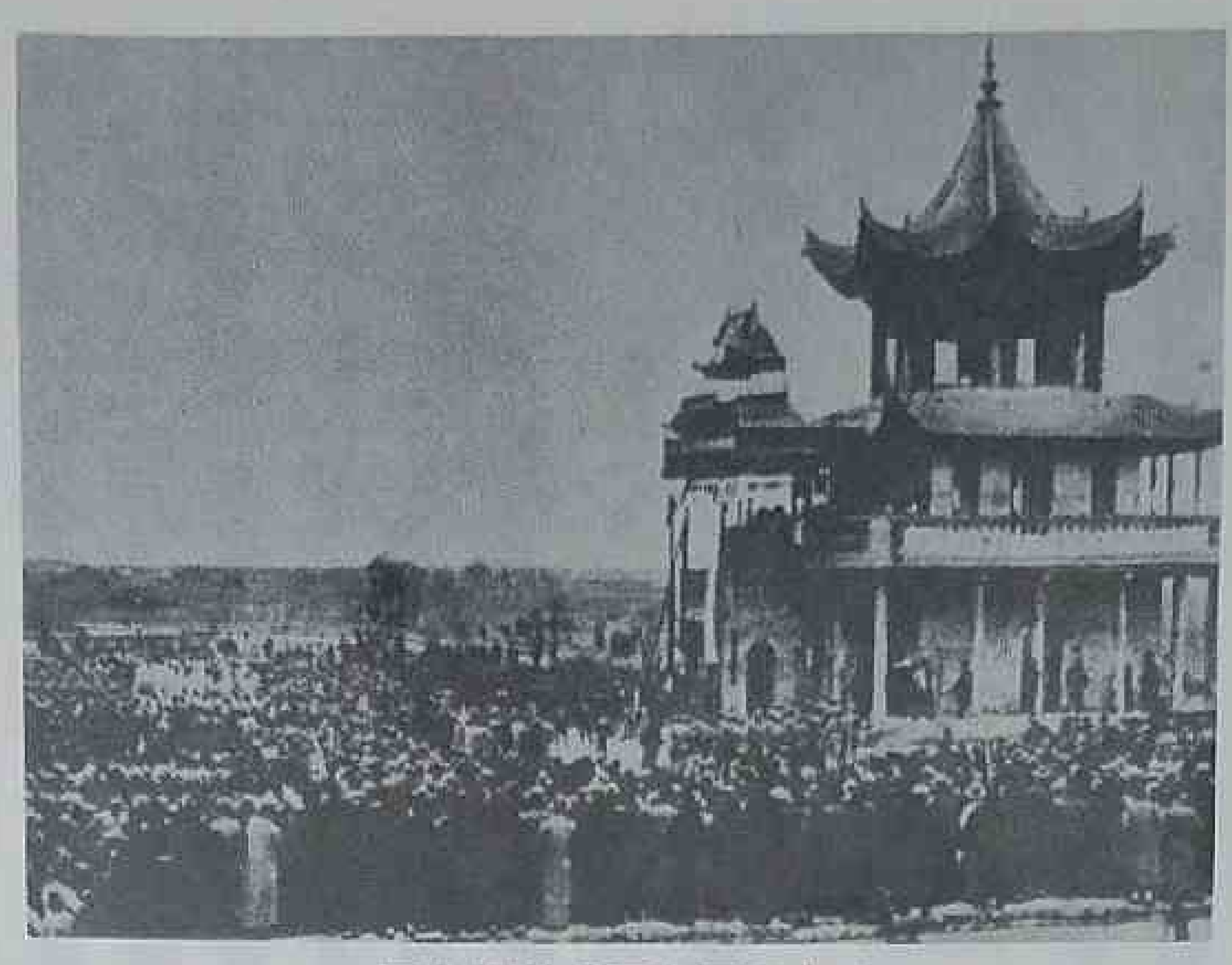
西安事變的第一則消息由日本記者報導出去，令史大林認爲這個事變是欲製造中國內戰的日本的陰謀。同時又有正在德國的汪精衛與希特勒會面的情報，因而史大林擔心蔣先生被殺，汪精衛執政時，中國或者會參加當時剛締結的德日防共協定。於是史大林於十二月十四日透過第三國際，以電報要求中共釋放蔣先生。

周恩來受到邀請，於十二月十七日搭乘張學良派來的波音機飛抵西安。張學良的〈西安事變懺悔錄〉就當時的情形這樣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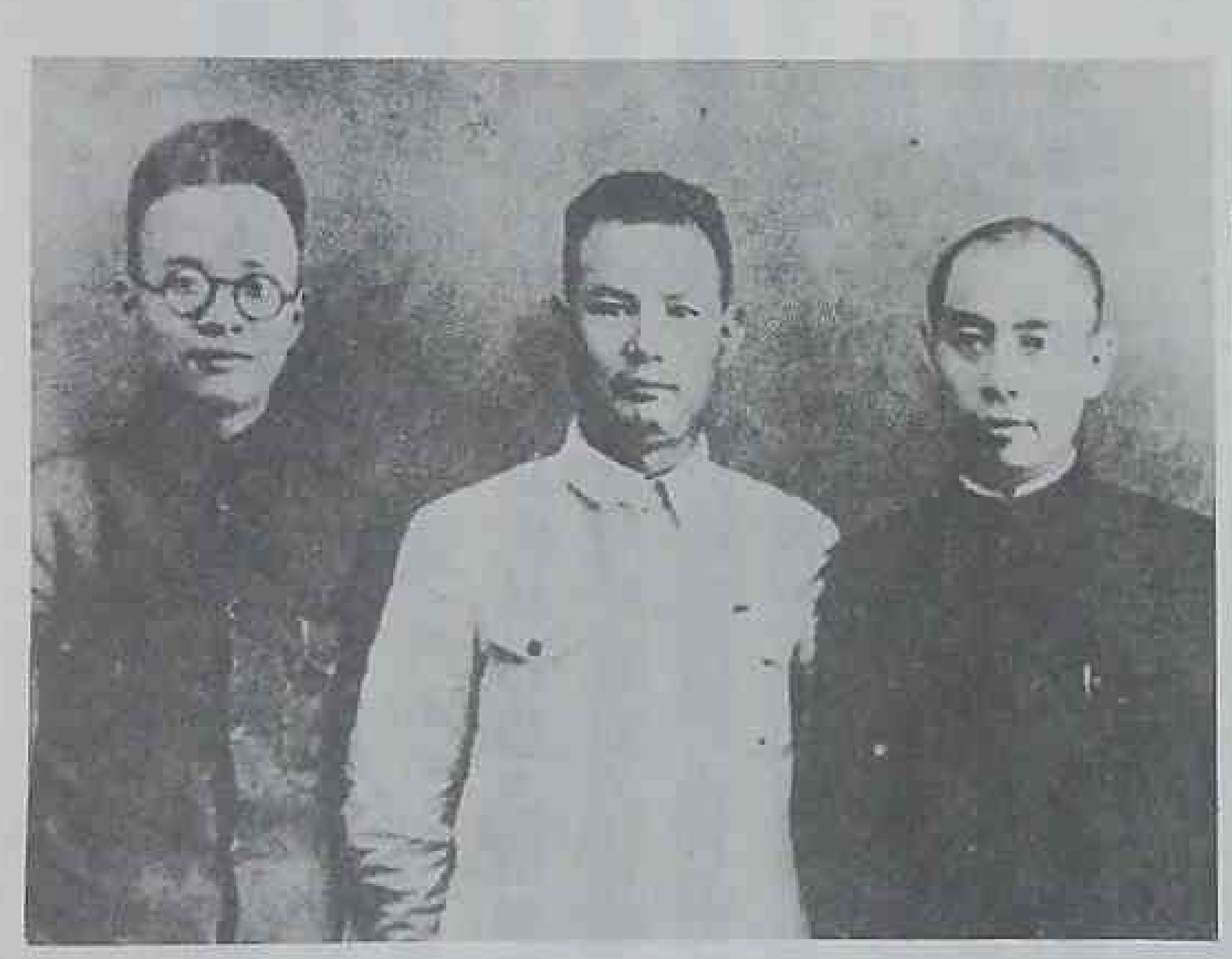
二、三日後，周偕二人同來，一爲博古（秦邦憲），另一人則記憶不清矣。周至此時，儼然爲西安之謀主矣。

宋子文與蔣夫人登場

十二月十八日，蔣鼎文攜帶蔣先生的親筆函回到南京，何應欽同意停止戰鬥三天，同時討伐軍逐漸縮小對西安的包圍網，內戰的危險並沒有消逝。



西安革命公園之民衆大會



前往西安之中國共產黨代表團



宋美齡抵達西安

為解決這個局面，十二月十九日，孔祥熙、宋子文和蔣夫人協議善後之策，結果決定遣派宋子文前往西安。十二月二十日，宋子文與端納聯袂到了西安。蔣先生在其《西安半月記》，就宋子文之登場這樣寫著：

上午，聞上空有飛機聲，以為停戰期滿，前方已開始作戰，故飛機到西安偵察敵情也。詎未幾，子文偕張及端納來見，始知此機乃載子文來陝者，殊出余意料之外。與子文相見，握手勞問，悲感交集，幾不能作一語。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謂：「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余讀畢，不禁泫然淚下。

宋子文和端納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到南京。得到宋子文報信的蔣夫人，決定要前往西安與張學良親自談判。隔（二十二）日，蔣夫人與宋子文和端納到了西安。蔣夫人就到達西安時的情況這樣說：

機方止，張學良首登機來迎，其狀甚為憔悴，侷促有媿色。余仍以常態與之寒暄。離機時，乃以不經意之語氣，請其勿令部下搜查我行裝，蓋懼紊亂不易整理耳。彼即悚然曰：「夫人何言，余安敢出此！」時楊虎城亦踵至，余坦然與握手，似偶然過訪之常客。楊狀甚窘，但余鎮定，又顯覺釋然。

下午四時，蔣夫人出現於蔣先生被軟禁的高桂滋公館。

余妻忽於下午四時乘飛機到西安，乍見驚訝，如在夢寐。余日前切囑子文，勸妻萬不可來西安，不意其竟冒萬險而入虎穴。感動悲咽，不可言狀。妻見余強作歡顏，而余則更增憂慮。蓋旬日以來，對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後乃更須顧慮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愛，平時已信其必能為黨國效忠；且與余同心互勉，誓為　總理之主義奮鬥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犧牲於危城中乎？……妻告余以外間種種情況，謂今日同來者有蔣鼎文、戴笠、端納、子文等四人，並勸余應設法脫離此間，再言其他。（《西安半月記》）

四者會談

由於蔣夫人登場，局面似將迅速展開。十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宋子文和蔣夫人為釋放蔣先生事積極與張學良和楊虎城談判。其結果，就停止內戰與一致抗日獲得了基本上的同意。但楊虎城及其部下以釋放為條件，堅決要求蔣先生在同意書上簽名，情勢由之又複雜起來。

十二月二十三日，蔣夫人與周恩來會談兩個小時，商議打開局面的方法。蔣夫人在《西安事變回憶錄》，沒提到周恩來的名字，就當時的會談這樣記載：

時張學良正竭力解勸疑懼中之各將領，並介紹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

見，謂此人在西安組織中甚明大體，而為　委員長所不願見者。余與此人長談二小時，且任其縱談一切。彼詳述整個中國革命問題，追溯彼等懷抱之煩悶，以及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與如何釀成劫持　委員長之經過。余注意靜聽，察其言辭中，反覆申述一語並不厭贅，其言曰：「國事如今日，舍　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袖者。」述其對於國防上所抱之杞憂，亦喟然曰：「我等並非不信　委員長救國之眞誠，惟恨其不能迅速耳。」

彼又言此次兵變實出意外。余又告之曰：「如此小規模之政變，彼等尚無力阻止其流行與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國家大政之能力耶？」彼又言，彼等崇敬　委員長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奈　委員長始終不聽彼等陳述之意見何！

談話結果，彼允勸告楊虎城早日恢復　委員長之自由，並約次日再見。

蔣夫人在《西安事變回憶錄》故意隱藏「周恩來」的名字，反而突出解決這個事變的關鍵人物是周恩來。

解決事變的商議，到二十三日晚上，在宋子文和蔣夫人保證答應停止內戰和一致抗日的基礎上，幾乎要達成協議。

與楊虎城的對立

但到十二月二十四日，西北委員會的偏激分子又提出七個項目，局面又陷混亂。楊虎城認爲，宋子文和蔣夫人的保證還不行，而要求一定要由蔣先生在同意書親自簽字。

我如果繼續扣留蔣先生，南京政府與我們之間勢必開始新的內戰。我們是為反對內戰而發動這個事變的，所以如果發生新的內戰，將全功盡棄。

張學良在這一點與楊虎城發生爭執。

當時，南京政府的人非常強硬，他們的態度是不惜與我們一戰。請不要問我是誰強硬。因此我覺得我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

我的思想是這樣，但楊虎城卻不能決心。這一點後來成為很大的爭論。我逼楊虎城：「你的作法，與我們當初的想法相反。如果照你所說，沒有保證就不釋放蔣先生，勢必擴大內戰。」

而打開與楊虎城對立僵局的是周恩來。張學良在〈西安事變懺悔錄〉說：

就是到最後，因蔣公離陝問題，良與楊虎城發生歧見，亦為此點，良責楊，我等最初動機，是不顧一切，請求蔣公領導抗日，我等既已看過蔣公之日記，確知蔣公有抗日之決心，並已應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見，提出中央會議討論，我等目的可達，不應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反(譯按，「反」當為「又」)何必當初乎？在此爭論上，良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乃係由周恩來在座解圍，勸良稍加休息，容他會議商討商討，被周將楊說服。良認為抗日目的既可達，其他不應多所顧慮，不想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違初衷(我等反對內戰，反將引起更大之內戰，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結合之趨勢；我等所希求者，蔣公領導全國一致抗日，反致蔣公將要失去領導地位和聲譽)。

若是，楊虎城對當時一連串的會談怎麼看法呢？我們訪問了楊虎城的長子，西安事變以後不久聽過楊虎城談其會談情形的楊拯民。日後楊拯民參加了共產黨，曾任陝西省「副主席」、天津「副市長」、政治協商會議祕書長等職。由於其父被殺時他已經在共產黨活動，所以他的家族中只有他一個人「倖免於難」。

在這個會談中，家父屢感痛苦。因為宋子文、宋美齡和張學良幾乎都以英語交

談。宋美齡不大會說中國話，宋子文講廣東話，周恩來聽懂英語。會談沒有設口譯人員，因此家父不能參與，殊覺痛苦。

「會談在大的方向上有了共識。但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家父認爲蔣某必須在同意書簽字，反對簽字前釋放；同時也反對將其釋放得太早。但宋美齡和張學良面對民衆運動，非常著急。家父想要蔣某留下文字，但蔣某不肯。張學良主張：「以人格保證就行。」對蔣某，家父和張學良的看法是不同的。家父並不相信蔣某。

蔣先生、周恩來會談之謎

與楊虎城激烈對立的張學良認爲，非由國民黨代表蔣先生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直接見面，就停止內戰與一致抗日會談，無由即時解決局面。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時許，蔣先生與周恩來在高桂滋公館舉行了歷史性的會談。

——蔣先生與周恩來先生會面，當時先生也在場嗎？

對我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質問，但請不要再問下去了。我不但在場，把周恩來帶到蔣先生那裡去的也是我。對不起，我只能回答到這裡。

——「蔣夫人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宋子文、蔣夫人和周恩來會談的場面。他們談了些什麼話呢？」

不消說，我在場。但對他們談話的內容，對不起我不能說。當然我可以藉口說我忘記了，但我不想這樣做。

——「美國人愛特加·斯諾所寫《中共雜記》一書說，當時史大林曾命令中國共產黨釋放蔣總統。」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回事。

——「據聞，許多人說，當時中國共產黨想把蔣總統付諸人民裁判？」

我不知道有這個事。我的決定是我自己下的，完全沒有受到外面的壓力。我什麼都不知道。當時與楊虎城有些意見的不同，但沒有來自外面的壓力。

——「您爲什麼想釋放蔣總統呢？」

我如果拘留蔣總統，不是要擴大內戰嗎？我們反對內戰。我與楊虎城爭執的就是這個問題。當時主張內戰的人不希望蔣先生回到南京，南京的氣氛是這樣。但請不要問我誰作這樣的主張。因此，我準備負一切責任。我如果到南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但我絕不希望有內戰。

——「先生就西安事變已經回答到相當深的部分，但還是說有些事不能講，這是什麼原因呢？」

我不大喜歡回答這個問題。你們如果推察我的痛苦心情，應該能夠了解原因。不過各位太熱心了，所以我只簡單說明兩件事。

第一，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來說。如果由我說出來，就會變成自我炫耀，是吹

牛。我不是想被人稱讚而發動西安事變的，同時我也不想自我辯解。

第二，我不希望因為我說話而傷害別人。如果我把一切都說出來，勢將傷害到許多人。

張學良說到這裡，以外的事就絕口不說。這次欣然同意接受我們訪問，並談到許多歷史事實的張學良，對蔣周會談，則對我們表示絕對不能說的堅決意志。淡黑顏色眼鏡那邊的張學良的眼睛，似乎瞪著一個點。他的腦袋是不是想著當日的種種呢？五十四年前的這個蔣周會談的眞相，至今還是個謎。

關於此次蔣周會談，日後雖然有幾種文獻叙述情況，但都是第三者的叙述。爲供參考，引述如下：

前述《中共雜記》說：

> 在這個會談，蔣首先說的話是：「不能再有內戰。」蔣的這個約定，是共產黨最盼望的事。但繼而蔣只說些沒有什麼實質意義的話。譬如「內戰中我也常想到你們的事。作戰中我也沒忘記你們爲我曾經努力過的事。如果能再次合作」……。

張國燾在其《我的回憶》則這樣說：

張對蔣說，委員長的一位舊屬求見，請委員長接見，蔣氏未置可否。周恩來當即步入蔣氏住室內，向蔣嚴肅敬禮，並仍依黃埔時習慣，稱蔣氏為「校長」（蔣先生任黃埔軍校校長時，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譯者）。蔣氏最初板起面孔不理會，周即坐下來慷慨陳詞，蔣氏則留心靜聽。周首先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氏和南京中央的想法，並希望一切和平解決，中共願擁護蔣氏做全國領袖，實行抗日。周也乘勢說明中共政策的始末，力證化除歧見，團結禦侮的必要。

周恩來在報告中說，他的陳詞曾使蔣氏的心情漸漸平靜，似也相信周的眞誠。周恩來根本沒有說要蔣氏在八項主張上簽字的話，只在氣氛輕鬆的時候，請求蔣氏有些指示，並與蔣氏略叙家常，說到其子蔣經國氏在蘇聯頗受優待……周恩來……始終恭順懇求，未露半點要挾之意……希望國共十年戰爭，至此能是國共和解的起點。

從這些資料和當時的情況來判斷，這個會談不可能有特別的「交易」。雖然有人說蔣先生在某種文書簽了字，但事實應該是周恩來對蔣先生表示敬意，蔣先生給予周恩來心情上停止內戰的「諾言」。就周恩來來說，以不簽字和約定的形式保持蔣先生的面子，以確保將來交涉的管道，比什麼都重要。

但就蔣先生而言，在被軟禁的情況之下，與長年敵對的共黨代表周恩來會面，照其所給予的「諾言」，日後的歷史所演變的事實，才是終生難忘的恥辱。

次日，即十二月二十五日，蔣先生再度與周恩來會談。當天下午，蔣先生便獲得釋放。張學良陪同蔣先生前往機場之前，曾經對其部下這樣說：

張學良在出發之前，對其幹部等說：大家或許還沒同意。以為沒有保證不行，把他放了，以後再反抗怎麼辦？但現在如果不釋放他，一定會發生內戰。我為什麼要冒這種險，乃是因為要擁護他來一致對抗外國。為著停止內戰，團結一致與日本搏鬥，我才願意冒這個險。（盧廣績訪問）

對擬於該日釋放蔣介石這一點，與楊虎城尚未獲得完全共識，但張學良把蔣介石帶往機場。

張學良叫我父親聽電話，並要父親前往監禁蔣介石的高桂滋公館。一進公館，張學良便說：「現在我們要把蔣委員長送到機場。」父親問：「現在馬上就走？」張學良答說；「現在就走，現在就走。」當時蔣介石出來了，所以不能再爭。我想父親當然很不高興。一到機場，張學良說：「我必須把蔣委員長送到南京，」並將寫著「東北軍交你指揮」的便條手交父親就走了。（楊拯民訪問）



楊拯民



獲釋之國民黨要員(西安招待所)



事變之後：(右起)蔣介石、宋美齡、孔祥熙。

送蔣介石到南京

張學良說要把蔣介石送到南京，身邊的人大為驚愕。蔣介石不贊成張學良同去南京。

臨發時，張堅請同行，余再三阻之，謂：「爾行則東北軍將無人統率，且此時到中央亦不便。」張謂：「一切已囑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機起飛。（《西安半月記》）

宋美齡就當時的情形這樣說：

張告委員長，彼已決心隨委員長赴京，委員長反對甚力，稱無伴行之必要，彼應留其軍隊所在地，並以長官資格命其留此。張對余解釋：謂彼實有赴京之義務，蓋彼已向各將領表示，願擔負此次事變全部分之責任；同時彼更欲證明此次事變，無危害委員長之惡意及爭奪個人權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變確與歷來不同，事變之如此結束，在中國政治之發展史中，可謂空前所未有；張之請求亦有其特殊之意義，足使此後擬武力攫奪權力者，知所戒懼而不敢輕易嘗試。故余與子文贊成其意，允其同行。（《西安事變回憶錄》）

如此這般，張學良自告奮勇前往充滿敵意的南京。此時張學良為何要親自送蔣介

石到南京，而被當囚人，這是西安事變的一個大謎。

身為軍人者，自己作的事要自己負責任。我將蔣介石先生送到南京，是為了要在南京受處罰。簡單來說，我是覺悟被處死刑，並且完成了應有的準備才去的。在去南京之前，我將房子送給部下，並安排身邊的一切。身為軍人的我，自己所做的自己要負責任。除此以外，我沒考慮過。同時我反對內戰，當時我如果不這樣作，內戰會再擴大。為停止內戰，我決心犧牲自己。

——「到南京事，有沒有跟任何人商量過？」

我自己決定的。但楊虎城等人曾欲阻止我去。

——「沒有跟周恩來商量嗎？」

沒有。周恩來好像要把我帶回去，他怕我在南京出事。但我認為「作為軍人我的行動等於叛變。因為從事叛變，所以我必須清理我的罪過。要處死刑就死刑吧」。

——「在機場與周恩來見了面嗎？」

他來到機場時，我已經上了飛機。我沒有與周恩來會面就到了南京。

——「在飛往南京途中，先生想了些什麼事？」

在飛行中，我什麼也沒想。因為我覺得在南京將怎麼樣我都不管。飛機抵達洛陽時我也沒有下機。蔣先生保護了我，蔣先生大概深怕人家對我動手腳，他對我特別關照。以後，蔣先生也一直保護我。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蔣先生所搭的飛機到達南京，蔣先生伉儷受到國民政府要人歡迎。由於蔣先生安全回到南京，終於避免了新內戰的危機。

蔣先生到達南京兩個小時以後，張學良所乘的飛機也降落了南京。張學良住進宋子文公館。

從此以後，張學良的影子從歷史舞台消逝了。

在有關西安事變的訪問期間，張學良不大喜歡開口。但看到我們失望，他便慢慢選擇語彙，暗示一些眞相。對周恩來與蔣先生的會談，起初他完全不說，堅決拒絕，卻好像想起來似地說了一句：「我陪周恩來去的。」他的意思似乎是說，這件事非常重要，希望他與周恩來在同一個想法之下行動，來了解西安事變的一切。

第五章　半個世紀的監禁生活

軍事審判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南京舉行了審判張學良罪行的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議。當天以「首謀夥黨，對於上官爲暴行脅迫」罪名，將張學良判十年有期徒刑，並褫奪公權五年。

但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特赦張學良無罪，並決定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

東」，而被軟禁於浙江省奉化縣溪口。

溪口位於從浙江省寧波乘車大約一個半小時的地方，是江南的一個農村地帶，也是蔣介石的家鄉；因此溪口出許多國民黨要人，在今日的台灣有不少親戚。目前，由於觀光自由化，溪口設有台灣同胞招待所，接待來自台灣的觀光客。台灣的觀光客都要訪問蔣介石故居、蔣介石的書庫、蔣氏母親的墳墓，以及與蔣介石有關的地方。在這裡，你會覺得中國大陸與台灣非常靠近[1]。

從蔣介石故居溪口，乘車往山裡大約三十分鐘，可以到達張學良曾經度過軟禁生活的中國旅行社招待所。附近有雪竇寺、千丈巖瀑布等風光明媚的觀光勝地。

現在的中國旅行社招待所的建築物，是後來復原的。張學良被軟禁時；由於原因不明的失火而燒光。入口有張學良的介紹和年譜，裡頭擺著模倣張學良被軟禁時代的家具。當時，招待所前面院子有網球場和小游泳池，張學良在這裡邊受國民黨特務機關監視，過著白天運動，晚上聽收音機的生活。

在從招待所徒步二、三分鐘的雪竇寺，有張學良被軟禁時代所種的楠樹，稱爲「將軍楠」。這棵楠樹大約有二十公尺高，令人痛感五十二年的歲月。

張學良接受訪問時，不知何故，好像不大喜歡談溪口時代的事情，只談了一點端

納訪問他時候的事。

我最後見到端納先生是在溪口，他到溪口來看我。我在溪口住很長時間。宋美齡女士說，端納先生到臨終一直很關心我的事。據說，他始終稱我為「That young man」。

希望參加抗日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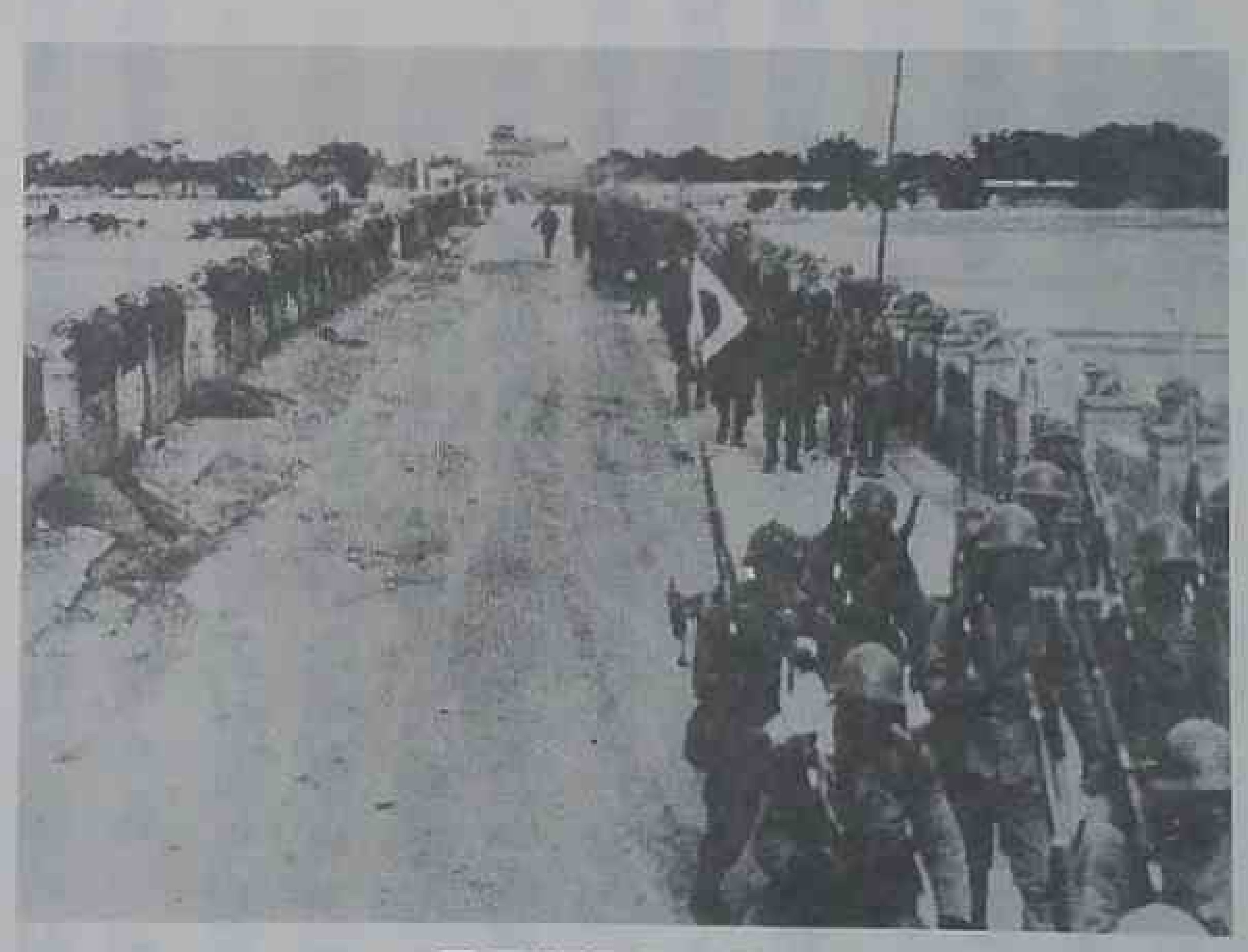
張學良在溪口過著軟禁生活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北京郊外的盧溝橋，日軍與中國軍發生衝突，以此爲開端，中日兩國展開八年的全面戰爭。

以西安事變爲轉機，國民黨與共產黨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接觸。最大的難題是中共軍的指揮權和共黨地盤的行政權問題，國民黨希望將其置於國民政府之下，共產黨則堅持以「自主獨立」爲前提的「合作」。

迨至盧溝橋事變烽火波及上海，國民黨與共產黨互讓一步。九月二十二日，以中共發表「國共合作宣言」（中共團結禦侮宣言）[2]，蔣介石接受這項「宣言」的方式，成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遂形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軍便不得不面對中國的激烈抵抗。



經過復原之中國旅行社招待所



日軍渡過盧溝橋

局勢照張學良的期待發展下去。此時，張學良曾請求蔣介石，願意率東北軍與日軍作戰，蔣氏沒有同意。在中日戰爭期間，隨日軍的進攻，張學良由溪口被移至安徽省的黃山，江西省萍鄉，湖南省的郴州、沅陵，貴州省的修文、桐梓等地。

前往台灣

張學良始終沒有機會到抗日戰爭的前線去。抗日戰爭結束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七月，「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國再度陷於內戰漩渦。國民政府軍與中共軍以東北爲主要戰場展開你死我活之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張學良被以飛機從重慶移往台灣。

張學良被移往台灣的這個時期，是蔣介石掌握戰後政治的主導權，攻擊中共根據地最有成果的時候。在曾經是張學良地盤的東北，國民政府軍也占領了瀋陽、長春等主要城市。有人說，蔣介石欲把東北置於自己勢力範圍之下，因此不要對東北擁有影響力的張學良東山再起。

從東北成爲國共內戰的主要戰場來看，無論就國民黨或共產黨來說，東北是決定國共內戰的關鍵地區。但後來蔣介石失掉東北，從而失去整個大陸的政治地盤。

被移到台灣的張學良，起初在新竹市郊外五峰山中的井上溫泉生活。該地現在叫

做清泉，是有許多高山同胞居住的地方。

我們在台北市警察局辦理入山手續，乘車到了清泉。一進五峰山中，即有舊隧道、水路等日治時代的遺跡。根據跟我們同行的新聞局郭冠英氏的說法，井上溫泉是日治時代，喜歡溫泉的日本人所開的溫泉療養場。

從新竹市乘車走山路大約兩個小時到清泉，是個面臨溪谷的深山寒村。溪谷有吊橋，一座教堂在小山上。一位久居這個村莊的老先生替我們嚮導，由於張學良所住的房屋係沿著河川蓋的，一九六四年因颱風洪水沖水，現在這個地方有一座混凝土橋。這位老先生說，張學良住的好像是從前的日本旅館，和式木造建築物，一共三棟，裡頭是榻榻米房間。張學良住在其中一棟，天天過著打網球和釣魚的生活。

楊虎城之死

張學良在南京受審後，過著軟禁的生活；西安事變之另外一個主角楊虎城卻在悲劇中結束了一生。

楊虎城於一九三七年六月辭去西北軍司令，前往歐洲。盧溝橋事變，中日兩國進入全面戰爭，楊虎城於十一月回國，隨即被戴笠手下連同其太太一起逮捕監禁，移往江西、湖南、貴州等地。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在重慶的中美合作所正法。

楊虎城的長子楊拯民，西安事變後參加共產黨。他在國共內戰的前線得悉其父楊虎城之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占領重慶的部隊來了電報，說「發現令尊遺體」。我非常傷心。因爲（共軍）攻下重慶時我還抱著一線希望。

國民黨的監獄在那裡是秘密，尤其父親的居所更是秘密中的秘密。因此，我一直無法得知父親在何處，或者被移到什麼地方。父親應該是從江西被移往湖南，由湖南到貴州；占據重慶時才突然來了發現父親遺體的電報。我乘輪溯長江一週，花十天工夫才到達重慶。

到台北北投

一九六一年，張學良被移至現在居住的北投。北投原是台北郊外的溫泉地，位於從台北市內坐車大約四十分鐘的地方。靠近復興中學的張學良公館，四周樹木繁茂，圍牆裡用地廣大；周圍有監視和保護張學良的特務機關的房子。

張學良一九六四年與在美國的于鳳至分手，與自溪口以來一直陪他過著軟禁生活的趙一荻（統稱趙四小姐——譯者）結婚。那時張學良六十三歲，趙一荻五十二歲。

張學良笑著說，溪口以來的軟禁生活，並沒有人們想像那樣悲慘。在這期間，他

說他看了許多書，並埋頭研究宗教。

我每天看書過日子，對這個時期的生活我非常滿足。如所周知，我是個不用功的學生，小孩時候極其頑皮，所以那時我常常開玩笑說：「真希望被關起來好好念十年書。」

這幾十年來，我看了好多書，知道很多事。我也研究了宗教，包括基督教和佛教。原來我學的儒家思想，這些非常感動我，因而我也得到許多進步。

我本來就很喜歡歷史。我研究了明史，蔣介石總統希望我研究明史。蔣介石總統喜歡禮教，所以我也研究了禮教。從前我對這些完全不懂。研究禮教之前，必須研究明史，這叫做明儒學難，故我開始學明史。我本來對歷史就很有興趣，因此我很認真研究明史，得到很多心得。我也寫過不少有關明史的文章，但後來我把這些文章都丟棄了；雖然有些捨不得，但我還是捨去。歷史上的記載事項，不一定都是事實。從我開始學歷史以後，我都做筆記。明史有許多錯誤，雖然是中國官員寫的，有很多是假的。研究明史時，我在朝鮮史文獻中發現了有關永樂帝的資料。歷史研究常有這種事，不過由我統統講完了的話，以後研究歷史的人就不會有樂趣了。



井上溫泉



楊虎城公館遺跡，後改爲楊虎城將軍紀念館。

張學良之所以不再研究明史，據說是因爲張學良希望在台大敎明史但沒有實現所致，這是否事實，不得而知。不再研究明史的張學良，改而專研基督教。

我自從成為基督教徒以來，就專心研究神學。我研究神學大約有十幾年到二十年，我畢業於美國的一所函授基督教學校。如果可能，我很想做牧師。現在我有牧師資格，我內人也是。她比我更有研究，目前是傳道師，我還不是。

與蔣介石的關係

張學良因爲在西安事變監禁了蔣介石，所以半個世紀以來反而被蔣介石監禁。關於他與蔣介石的關係，我們可以蔣氏逝世時張學良送給蔣氏的一首詩來說明。

蔣介石先生對我很好，他一直照顧我。為說明我們兩個人的關係，我想了好多句子。以下是蔣總統逝世時所寫的輓詞，是一首從未發表過的詩。

關懷之殷
情同骨肉
政見之爭

宛若仇讎

我們兩個人的這種關係，幾乎沒人知道；知道的恐怕只有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和蔣經國先生而已。

蔣介石先生逝世時，因為宋美齡女士的安排，在納棺之前我曾向蔣先生作最後的告別。蔣先生跟我的關係，是極其有趣的奇怪的關係。

民族英雄張學良

中共對張學良的評價

在台灣政治上，張學良的立場仍很微妙。在大陸，自周恩來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慶的政治協商會議席上，說張學良是「九年前拯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的人物以來，他被譽爲「千古功臣」和「民族英雄」。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四周年座談會，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家主席」楊尚昆也參加了。

會上，江澤民說：「五十四年前祖國存亡瀕於危機時，張學良將軍與楊虎城將軍

毅然發動了西安事變，爲拯救國家民族釀成統一戰線，推進第二次國共合作。西安事變是永遠明記於歷史的事件，張、楊兩將軍是我民族英雄。統一祖國，振興中華是全民族共同的願望，我們希望台灣當局能學習先人的愛國精神和團結精神，爲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復興和人民的幸福共同前進。」

楊尙昆也說：「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光輝的一頁，周恩來同志稱讚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爲『千古功臣』。張學良先生是歷史上的重要人物，我們已經半個世紀以上沒有見過張學良，我們很關心這幾年來他的處境。」

這次我們訪問的陝西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李連璧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楊拯民，對張學良作了這樣的歷史評價：

我認爲張學良是愛國的領導者，是兼備勇氣和知識的英雄。西安事變之前，他這種愛國思想和行動曾予他的部下很大影響；他部下的子弟，在學生運動中有很優異的表現。張學良將軍不顧自己安全與利益，親自將蔣介石送到南京，由此可見，他是眞正愛國的領導者。後來他雖然被軟禁，但作爲民族英雄、愛國的領導者的象徵，他給予全國人民特別是年輕人的心靈很大影響，這種影響今後將更加深。（李連璧訪問談話）

我覺得他是世界史上最特殊的一個人物，他完成了推動中國的統一和中國的發展這兩個歷史性的偉業。這個人物以後過了五十四年的幽禁生活，現今仍在人間。張學良先生今日還是身體健康而長壽，實在很難得。我認爲在世界的歷史上除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說，我父親楊虎城和張學良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不僅我，全國人民都這樣想。（楊拯民訪問談話）

電影、戲劇中的張學良

由於中共政權對張學良有這樣高的評價，所以張學良再三出現於大陸的電影和戲劇。一九八二年，西安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在大陸各地放映，獲得好評。這是以「西安事變」這個劇本作藍本而拍的，因此上演的明星與舞台的演員好多是同一個人。這部電影把張學良描刻成面臨祖國危機，犧牲自己救國的英雄人物。

最近，以張學良的東北時代爲題材的戲劇，主要由東北的電視公司製作。吉林電視公司製作的戲劇「少帥傳奇」，是描寫從張作霖被炸死事件，以至殺掉楊宇霆、常蔭槐時期張學良的行動，一共五集；後來由中央電視台對全大陸播出，有過很大的反應。其內容爲：對於毒辣的日本軍人與其勾結的漢奸，張學良毅然與他們搏鬥，是典型的勸善懲惡的戲劇。在這部電視劇裡扮演張學良的明星，後來據說被選爲該年最受

歡迎的男明星。

對大陸以他爲主角連續拍製電影或者電視劇這件事，張學良作了這樣的表示。

雖然有人邀我看這些電視劇和電影，但我是絕不看的。看了又有什麼意義呢？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我只不過盡了作為一個中國國民的責任而已；我並不覺得我做了什麼特別的事，我也不希望人家認為我做了特別的事。我有一首詩中說「虛名誤人生」的詩。我是一個普通的國民，只盡了作為一個國民的一份責任而已。

這不是謙虛，我這個人對人家的誇獎既不覺得怎麼樣也絕不會因此而動心。我決非為立功而發動西安事變，我不希望人家把我當作談話的材料，我最討厭報紙大寫特寫我的事。大家最好忘了我，請讓我自由一點吧。

設立建學良紀念館

一九八八年，瀋陽市利用曾經是張帥府建築物的一部分，設立張學良紀念館。張帥府由有三個裡院的傳統中國式房屋，以及後面一棟三層洋房構成。中國式房屋在遼寧省圖書館用地之中，張學良青年時代生活過的房屋大部分當作書庫使用，裡院任其荒蕪。張學良紀念館就是由圖書館提供原來爲書庫的一部分所設立，目前有兩個展示

室，以青年時代到現在的張學良的照片爲展示重點。據說，將來圖書館將搬到別的地方，並計畫以中國式建築物和整個洋房作張學良紀念館。

館長高青山就設立張學良紀念館的目的說：「張學良將軍是我們遼寧省出身的民族英雄，同時也是發展故鄉交通、經濟、文化的偉大人物，深爲東北人所敬愛。爲使將來的年輕人知道張學良將軍這些偉業，我們設立了這個紀念館。」他並強調說，眞希望在台灣的張學良「有生之年回來故鄉遼寧，看看自己生長的老家」。

結語

今日的張學良

比我剛來的時候，台灣實大有進步。其功績，大多應該歸於蔣經國先生。蔣經國先生對於政治、經濟以及軍隊的整頓有很大的全面貢獻。我很尊敬他。那麼早就去世，實在可惜。

對於現在的總統李登輝先生，我非常佩服。第一，他是基督教徒，是不可多得的基督教徒。第二，他是一位非凡的學者，任何問題都很有研究。我相信，無論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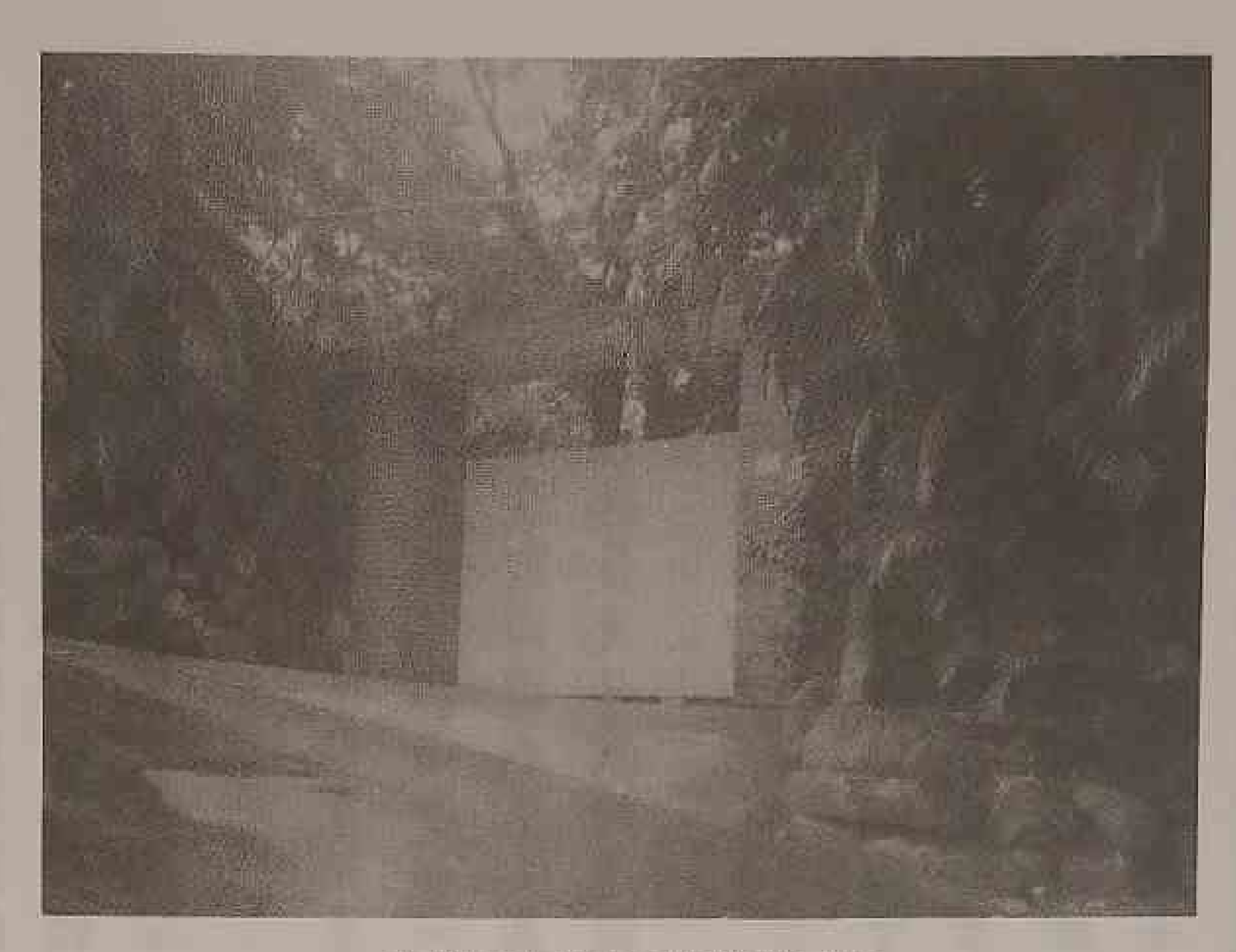
事，他都一定會做得很好。

現在，張學良與其夫人趙一荻兩人在台北郊外過著很安靜的生活。他非常健康，興致一來，他們便到台北市內餐廳去吃晚餐。同時，每星期天，他一定上教堂作禮拜。

我們於六月間的一個星期天，也跟著張學良到了教堂。張學良所去的凱歌教會，是位於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用地內的教堂，來參加禮拜的都是國民政府的要人及其家屬。我們去那一天，看到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和前駐日代表馬紀壯等人。

目前，隨侍張學良身邊的是安全局的李正源，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照顧張學良，完全沒有監視的意思。很久以前，張學良在台北的行動已經很自由了。

我的生活很早以前就這樣。既沒人妨害我的自由，我喜歡的事，什麼都能做。雖然有其他的情況，但我並沒有被阻礙過。不是現在才這樣，很久以前，不管我要看朋友，還是去吃什麼東西，都沒人干涉我。不過我也有我的顧慮，不能太隨便，我自己的行動要特別謹慎。



張學良目前在北投之居處



利用張帥府一部分設立之張學良紀念館

耳朵和眼睛變成很差的張學良，據說每天做的是，在家裡院子散散步和種蘭花。至於世界的情勢，他都是利用事先把周波弄好的ＢＢＣ、ＶＯＡ和基督教國際廣播的三個短波收音機。

我耳朵和眼睛很差，要看字時必須使用擴大鏡，而且只能看大的字，因此看書對我很費事。我不能看電視，故每天要聽收音機。我生活得自由自在。我雖然已經九十歲了，但常有人說我很天真，好像個小孩。孫子如果從美國來，我便高興得不得了。現在我最大的樂趣是跟孫子玩。

對日本年輕人的贈言

我的一生，被日本毀了。日本（人）殺了我父親，破壞了我的家庭，奪取了我的財產。這實在太沒有道理了。年輕時，對政治問題，我絕不表明我的態度，現在我年紀大了才要說這種話。由於我是一個反抗性很強的人，所以對於認為不合理的事，不管對方是誰，我都要反對。這樣做對不對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認為不合理的，即使是父親我也要反對。我是這樣一個人。現在我已經九十了，早已脫離政治環境，才說這種話，我為什麼要反抗各種各樣的事呢？只要我認為是不合理的，我都會忘掉權力、

生命和財產而去反對。我是這樣的人。

往昔，我去日本時，對日本文化非常感動，也有受我尊敬的日本人。往昔是這樣，現在我也很尊敬日本人。譬如科學，在一切領域都趕過美國；其研究、開發也很讓人佩服。我覺得日本如能成為（世界的）領導者多好。

中國與日本的文化很像。中國雖然地大人衆，但以前和現在都比日本落後是事實；所以不必把中國當做哥哥，當成「弟弟」就好了。日本與中國如能合作，為應用中國的物質、資源，日本予以幫助多好。但從前的日本，其腦袋只想著要以武力合併中國。

今日的日本，大概不會像從前那樣，以武力來從事侵略了吧。但也不能有經濟侵略。我們有「以德服人」這句話，對弱者伸以援手，弱者必定很感動，並自然而然地會設法圖報。日本人應該知道：「幫助他人，結果是幫助自己。」但不要期待報酬。

我一定要告訴日本的年輕朋友：你們必須知道日本過去所犯的錯誤，絕不要像過去那樣訴諸武力。孔子說：「夫子之道唯忠恕。」這是有德者要盡忠恕、要對旁的人很體貼的意思。忠是對國家的忠誠，恕是要寬待他人。日本有忠，但恕太少；換句話說，缺少體貼。日本政府對外國和自己國民都欠缺恕。

我雖然反抗日本人，但我不是經常反抗他們。有時候我也體貼和寬恕他人。體貼

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要站在對方的立場，考慮其情況、動機和困難，想像和理解他（她）為什麼這樣行動。我希望不但年輕人，日本的負責人也能體貼別人。必須考慮對方的心情，與人家合作；這並非犧牲自己。聖經說：「施比受有福。」請好好想想這句話的意思。

我說了不少失禮的話，這不是為了要追究某某人的責任，而是想令日本的年輕人明瞭過去的事實，跟我們的時代不同，今日的年輕人能夠互相理解、往來和認識。有時候我會這樣想：從前，我如果能與日本的年輕人多多互相了解，歷史不曉得會變成怎麼樣。因此我對世界的年輕人抱著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世界的年輕人在文化、科學、經濟方面互相合作和理解，以便建設和平而繁榮的世界。我已經九十歲了，來日不多，我由衷盼望將來的世界更美麗而燦爛。

最後我想特別奉告一句話：「善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我們都是禍害。

張學良說完了話，顯出好像非常得意而正愛調皮的小孩般的表情。他的眼鏡後頭的眼睛顯現很安靜的微笑。

張學良走過來的九十年歲月——時至今日，還有仍然無法醫治的中日的沈重歷史。

結束訪問

這次訪問張學良，給我們省思的是，過去我們對張學良這個人物的理解方法有若干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因爲我們太著重他是奉天軍閥即封建軍閥的領導者這個層面，所以即使認爲他與以張作霖爲代表的舊軍閥不同，但還是把他當作新軍閥來了解他的思想和行動。換言之，在理解他的行動的時候，我們認爲作爲軍閥的他，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保全他自己的政治地盤。

但事實上，接受訪問時張學良最強調的是如何統一中國的問題。他從青年時代就受到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很大衝擊，因而思考應該怎樣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統一，因此他更憎恨作爲其障礙的內戰。對張學良的這種說法，或許有人會覺得是他的自我辯護，但從他充滿熱情的談吐看來，我們並不認爲這是純粹爲自我辯護而說的。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理解他的抗日行動時，都把他父親被日軍炸死這個事實當作起源。因爲張作霖被炸死事件，張學良對日本有何看法，從前我們無從知道。此次張學良毫無保留地告訴我們：他如何地喜歡他父親，他父親去世給他多大的衝擊，以及怎樣恨殺死他父親的日本軍人。在理解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的他前半生的行動

時，這些事實非常重要。

NHK的特別節目「張學良今日談：到中日戰爭之路」，以及我與磯村尙德氏的對談「張學良——我與中國·我與日本」播出後，曾有很大的反應對這個節目的意見和詢問，一個星期以上電話響個不停，也有許多人寫信來。大部分是與張學良大致同一個時代的人，但也有初中和高中生。張學良之「想對日本的年輕人講話」的願望，或許出乎意料地達到了也說不定。

日本國內的反應自不必說，令我們更驚訝的是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反應。節目播出的第二天，台灣和香港的報紙大大地開始報導張學良接受訪問的事實和節目的內容。各報分別以「張學良打破半世紀沈默爲歷史證言」、「日本記者打破半世紀沈默」、「張學良——日本毀了我的一生」、「張學良談西安事變」的標題，連日詳細介紹節目內容，有的報紙甚至一字不改地刊載張學良說的話。

同時，台灣和香港的電視公司紛紛請求轉播這個節目。不久，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報館和通訊社的東京特派員要求能聽聽張學良的中國話，因而我們舉辦了一次試映會。中國大陸更以專門給幹部看、只對內發行的「參考消息」新聞連載七天；《人民日報》、《文匯報》等普通報紙也開始詳細報導訪問內容。

這些令人幾乎不敢相信的「過分」反應，使我們重新認識張學良這個人物在中國

人的心目中有多麼大的分量。而近幾年來台灣的大陸政策劇變，以及中共政權對台灣呼籲統一；凡此，使我們聯想到五十四年前因西安事變促使「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張學良，有可能扮演促進「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角色。我們由衷希望張學良能更長壽。

關於張學良

臼井勝美

一

我開始特別關心張學良（歷史叙述，故不用尊稱），是看了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他在北京歡迎爲調查九一八事變，由國際聯盟派來的李頓調查團宴會中所作演講以後的事。

根據曾經出席這個宴會的日本公使館矢野參事官的報告，其內容如下：

(1)東三省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種族上、政治上和經濟上，它與內地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四億中國國民承認東三省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與河北、山東沒有什麼兩樣。詐稱東三省不是中國（領土），或者唆使人建立不法的政府，要使其與中國其他部分分離等等（日本的行動），實包藏著領土野心，顯然違反九國公約保全中國領土的原則。

(2)中國目前在改革時期，在政治、經濟、社會上所以發生種種變化，與十九世紀的德國、法國和日本的維新沒有什麼不同。改革期間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紛爭，每個國家都是一樣的，中國也不例外。而且中國的國土比歐洲加上日本還要大，人口與整個歐洲差不多，所以在政治、經濟的改革過程中發生種種困難是當然的事。日本人誹謗中國爲非統一國家，是故意隱蔽事實，混淆國際視聽。

(3)中日（兩國之）間紛爭的眞正原因，乃由於日本嫉妒中國社會經濟進步以及在政治上逐漸趨於統一所致。李頓爵士在南京說，擁有廣大領土的中國的困難，鐵路及其他交通機關不足是原因，而東北的人民，爲開發領土自己修築鐵路，由之產業、教育、交通各方面有長足的進步。這些經濟、社會上的發達，大部分是中國人努力的結果。這個事實和我爲中國的統一經常與中央合作，引起日本反感而侵略東北。（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變》第三卷）

張學良這些話說得很有道理，非常有說服力，故給我極深的印象。因此，我對這個年輕的東北領袖究竟在何種環境下長大很有興趣。

李頓調查團與張學良的會談，自四月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前後舉行了四次，張學良在公開場合雖然沒有說英語，此時卻以非常流利的英語回答。美國代表馬科伊等由此重新認識：張學良不是人們所想像不成熟而不負責任的年輕人，而是教養很高，眞摯而有正確判斷力的領導者。

張學良在與李頓調查團的會談中透露，爆發九一八事變之前的八月間，趙欣伯（日後出任僞滿洲國立法院院長）曾訪問在北京住院的張學良，告訴他關東軍決定行使武力，故希望到東京去挽回這個局面，但爲張學良所拒；張學良認爲，日軍不敢違反各種條約和國際聯盟規約訴諸武力。但爲了不予日軍攻擊的口實，九月五日張學良曾指示部下，萬一與日軍發生紛爭，不要抵抗，這個措施且以口頭報告了南京政府；但張學良對調查團表示，這個不抵抗政策是錯誤的判斷。關於這一點，在此次的訪問中，張學良仍然說，如果有人批評爆發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判斷是錯誤的，他願意接受。

張學良的判斷如果是錯誤的，他或許認爲「時間」對他有利也說不定。一九三一年是張學良政治經歷的頂峰時期。在國民政府，他的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統治著北京

和天津，經營東北也日見成效，所以欲迴避與日本戰爭，理所當然；相反地，關東軍認為，「時間」對它愈來愈不利，因而決定發動武力。

二

張學良與日本駐中國公使和總領事，以及關東軍司令官等開始直接接觸，是其父張作霖去世以後的事。張作霖在世時提到繼承人問題的時候，日方的第一個名字不是楊宇霆就是張作相；但六月四日（一九二八年）張作霖突然被炸死，張學良一夜之間成為奉天軍閥的繼承人。對於從北京偷偷回到奉天（其詳情經過此次訪問才明白），於六月十九日就任奉天督辦的張學良，日本要求維持東三省現狀，即阻止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飄揚於東三省。日本之所以半強制性地要張作霖回來滿洲，不外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插足滿洲，以防止國民黨的影響力及於東北。

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於六月二十四日往訪張學良，奉田中（義一）首相（兼外相）之命，對張學良表示弔意和今後的援助。田中更令林總領事於六月二十九日告訴張學良：日本對東三省維持治安及保境安民特別關心。這是日本阻止張學良與南方國民政府合作的開始。爾後，林久治郎與張學良於七月九日、十六日和十九日繼續會

談。在十九日的會談中，張學良告訴林久治郎，該日成立東北保安會的要人全體一致主張要與國民政府妥協，並懸掛青天白日旗，所以他的立場非常困難；張學良同時表示，希望由日方通知蔣介石其反對東北與國民政府妥協，因被日方拒絕，因此張學良說，他要電告蔣介石日本反對他與國民政府妥協，他甚至不得不下野也說不定。

值得注意，次日即七月二十日，張學良要求與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舉行秘密會談。在城內滿鐵公署大約兩小時的會談中，張學良說明不得不與國民政府妥協的理由，並希望日方諒解。對此，村岡以很重的語氣勸告說：

「令尊張作霖先生十幾年來與日本合作，而建立了今日東北的繁榮。但閣下還沒辦完令尊葬儀，竟準備廢止東三省，屈服於敵人，作爲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之閣下還有什麼面子。今日正爲閣下採取斷然措施之時。」

村岡的會談手記說：「此時學良涕泣歔欷不已半小時。」我們眞不知道當時張學良到底以何種心情「聆聽」了該負暗殺其父責任的關東軍司令官的「訓話」。他一定氣憤不已。對於與村岡司令官的會談，訪問時張學良說他不記得有這回事。這個前後，可能是作爲繼承人的張學良最困難的時期。

在這次訪問中，張學良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對其父親的敬愛。張學良談其幼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受父親叱責的那個充滿懷念的表情，實在令我難忘。因此乃父之死於

非命，是張學良絕不能寬恕之事。

林總領事與張學良緊張的會談，又連續於七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八月二日和三日舉行。而以參加張作霖的葬禮爲名義，特別奉田中首相之命於八月四日來到奉天的林權助特派大使，也於八月八日訪問張學良，強調絕對不可懸掛青天白日旗。隔（九）日，張學良回話，對林權助說，他父親也肯定三民主義，所以他信仰三民主義並不違背父親遺訓。在座的林總領事警告張作霖說，如果不聽日本勸告而與國民政府妥協，日本或許不得不採取必要行動。結果是，八月十二日的第三次會談，張學良告訴林權助：擬靜觀情勢三個月後再說。至此，停止與國民政府妥協的問題暫時告一段落。

在此次訪問中，張學良說，聽完林權助的勸告，最後他對林權助表示：「林先生您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是中國人！」這是一個給我印象很深的場面，但日方的會談報告沒有這句話。這很可能是第二次會談時候的事。

從前林總領事送給栗原健先生，栗原先生轉贈給我的張學良的扇面這樣寫著：「林總領事拂暑　親仁善鄰」，寫於該（一九二八）年八月。這可能是林權助回國以後寫的，而從它，我們也可以看出張學良極其複雜的心境。

一九二八年年底，張學良實行易幟，給予日本很大衝擊。

三

對於自一九二八年夏天乃父被炸死而繼承其位統治滿洲，以至一九三一年發生九一八事變時期的張學良，應該給予怎樣的評價呢？張學良的目標是滿洲現代化，爲開發經濟而整備交通網，加強軍備，普遍和充實教育。爲此，與在滿洲侵蝕國權的日本及蘇聯的對立是無法避免的。張學良不是喜歡反日和反蘇，而是爲東三省的自立反日和反蘇。

李頓在奉天時親託將要回國的藍布遜公使的密函（五月二十三日）中提到，日方聲稱「我們拯救了呻吟於張學良壓迫和苛政下的人民，他們宣布了獨立」，說張學良政府是壓制的和腐敗的，而人民盼望良好政府的出現雖然是事實，但說人民自己宣布獨立是撒謊。李頓報告也說，奉天政府的軍費占總預算八成，行政、警察、司法、教育方面的開支不夠，致使其官吏並沒有適當待遇，權力集中在少數軍人手上，所以裙帶風、腐敗、苛政無法斷根。它同時指出，在張學良手下，在滿洲經濟資源的開發與組織方面，中國人的事業有顯然的發展（第二章）。

李頓報告對滿洲今後的解決，既不主張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情況，也不承認

「滿洲國」的合法性，而暗示在中國主權下實際上的國際管理，這是衆所周知的，所以它提倡一切軍隊（中日兩國軍隊）撤出滿洲，使滿洲成爲中立地區；它主張日軍自不必說，中國軍（張學良軍）也必須從滿洲撤出。李頓報告對滿洲的構想似乎完全忽視張學良的立場。張學良對這個提案不知作何種看法？我們此次訪問也提到了李頓調查團，但張學良祇說他自始至終對國際聯盟毫無期待。

張學良的這個回答，表示他對李頓報告失望。更值得注目的是，李頓報告的解決項目，係與行政院長汪精衛密切聯絡而寫成。汪精衛是張學良的最大政敵，接受訪問時，張學良並不否認他對汪的敵意，所以汪之利用這個機會剝滅張學良的勢力，乃是自然的事。

張學良的下一個難關是，日軍進攻熱河。

國際聯盟大會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全體一致通過基於李頓構想的決議（反對者是當事國日本的一票），日本首席代表松岡洋右退出議場，此時關東軍進入熱河省，進攻省會承德。正在日內瓦國際聯盟奮鬥的中國代表（包括與張學良很親近，也是李頓調查團隨員的顧維鈞），注視著中國對又來侵略的日軍將作何抵抗。中國在國際聯盟獲得列國一致支持，如果不全力抵抗侵略，必使世界失望。二月二十八日，中國代表聯名向南京政府請求，如果不加強對日本的抗戰，請更換中國在國際聯

盟的代表。

一月下旬，秘密前往上海的關東軍板垣征四郎少將曾對須磨（彌吉郎）書記官說有解決熱河問題的必要，同時表示，張學良對滿洲國是重大障礙，必須將張學良趕出和打倒，軍部正在研究方策（一月二十五日有吉公使的報告）。由此可見，日本仍然非常擔心張學良的存在。

直接負保衛熱河責任的是張學良（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但結果慘不忍睹。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的軍隊幾乎沒有交戰就放棄承德，任日軍占領（三月四日）。先失東三省又失熱河的責難，當然完全集中於張學良身上；於是張學良與北上的蔣介石直接協議，三月十日引咎辭職。其經緯前面業已詳述，故不擬重複。在此次訪問中，張學良回答說，湯玉麟是父執輩，他指揮不動湯玉麟；即湯是張作霖綠林時代的朋友，據傳湯玉麟更是張作霖的救命恩人，故張學良稱湯玉麟爲「二大爺」。雖然如此，但要由張學良負熱河敗戰的全部責任，還是過苛。事實上，國民政府本身沒有對日抗戰之力，我們可以從僅僅兩個月以後不得不簽訂塘沽停戰協定這個事實看出來。

現在，我要談的是張學良下野時候的聲明。聲明中說：

此次與北上的蔣介石會商結果，余悟引咎辭職是盡忠國家鞏固中央的最好方

法，因而毅然下野以謝國人。東北健兒於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奉命入關，援助中央，但至今國難未去，國土未復，無家可歸者達數萬人，敬請中央體察他們的辛苦，善予指導，並請社會人士賜以援助。他們對國家皆具赤誠，且知悉東北狀況；將來如有報國機會，爲恢復東北，願遂一死之志，以免漂泊，請國人體余之誠心，諒余之庸愚……。

換句話說，張學良憂慮被日軍占領故鄉滿洲而「無家可歸」的部下的前途，希望恢復失去了的滿洲，俾其部下免於「漂泊」。張學良下野出國時，非常擔憂與其共過患難的東北軍的今後命運。此種非現代國家的軍閥的想法，或許有人會批評是「私人軍隊」思想，但我認爲這種對東北軍的掛慮，可能是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一個原因。

四

下野後的張學良，在上海專心治療痳藥中毒。張學良很坦誠地告訴我們擺脫痳藥如何痛苦。張學良訪問之值得信賴，是因爲他能夠毫無保留地說出自己的弱點。治療痳藥之後，張學良於四月十一日偕夫人于鳳至及其家屬、秘書等搭乘義大利船孔特洛

索輪，由上海出發。同行者還有義大利駐華公使齊亞諾（墨索里尼的女婿）。首先前往羅馬。五月四日登陸義大利，十二月十五日離開義大利回國；張學良到過倫敦、巴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並在各地受到鄭重歡迎。

其中考察兵工廠最多，一時曾經流傳說張學良秘密去過蘇聯，因而廣田（弘毅）命令調查此說眞僞。報紙（*The Evening News*, Dec. 4th）刊登過張學良在英國多佛海岸避暑聖地布萊頓的全家福照片。從這張照片，我們可以看到穿著漂亮洋裝的張學良伉儷，和在他倆旁邊玩著樸克牌的千金的情形。對以往幾乎在戰火中過活的張學良來說，這是極其珍貴而平靜的日子。

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張學良隻身回到上海，這是他出國八個月以來首次重踏國土。張學良回國的傳聞，給中國政界很大的影響。在張學良還沒從義大利動身之前，行政院長汪精衛十二月一日對有吉公使表示，他與日本一樣反對張學良回來，並說即使回國，汪絕「不許（張）回到北方，只要我在位一天，不許他從事任何策動」。駐天津栗原總領事也於十二月十四日報告廣田外相說，如果張學良回國，對華北政局將有很大影響，排日風潮可能死灰復燃，所以「必須設法阻止張學良回國」。是即擔心張學良回國以後對中國政局的影響，汪精衛和日本曾經意圖阻止張學良回來。

關於回國後張學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及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以至發動

西安事變的經緯，本文已有詳述，現在我們來看看海外對西安事變中張學良行動的看法。西安事件爆發之初，蘇聯以爲張學良的背後有日本，日本則認爲張學良爲蘇聯所操縱，兩者都不正確；同時美國國務院和美國駐華外交官對張學良的看法和評價也有問題。

美國國務院馳名的中國通洪別克認爲，張學良的抗日主張是一種藉口，其實是爲爭取東北軍或者其個人利益的老軍閥的作風；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把它解釋爲，這是常用痲藥的土匪兒子，幹了類似芝加哥夥匪的誘拐，而以金錢解決。至於張學良與蔣介石一起到南京一事，則視爲張學良由於一般對抗日的主張的支持與反響並不十分熱烈，爲自己的安全，才逃出西安。顯然，美國對張學良的評估很低。

十二月十八日，英國以由列國保證張學良生命及令其前往海外爲條件，對列國提案要求蔣介石釋放張學良，美國、法國和義大利同意，但日本拒絕。日本的回答是，南京國民政府內部對立，他們對西安事變的對策並不一致，張學良欲強迫南京政府採取容共抗日政策，所以日本不得不保留態度。實即日本期待以西安事變爲契機，中國發生內戰，從而自我崩潰。

西安事變的一些敏感問題，在訪問中張學良避而不談。爲什麼呢？故我們只有推測。川越大使（上海）於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以須磨彌吉郎參事官所得情報，以

第三十一號電報報告有田外相說：

在西安，蔣介石對張學良的態度一直很強硬。蔣介石答應給張學良五千萬元軍費，關於其他要求，經與宋子文、宋美齡交涉結果，似乎成立⑴立刻實行抗日、⑵改組政府、⑶容共、⑷停止內戰這四項。蔣介石理應知道這些內容，但回到南京以後所發表的並沒有包括這些條件，「可是張學良來到南京之後，卻被付諸軍事審判和嚴加管束，宋等以爲這違反在西安的約定而覺得非常意外，於是宋子文於十二日前往奉化，就解除監禁張學良與起用汪精衛問題與蔣有所懇談……。」

雖然沒有根據（證據），但我認爲這個電報的內容在大綱上可能接近眞相。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很理解張學良的立場，對張學良非常同情，且時或給予很高的評價。今日，張學良似乎已經結束了與蔣介石的關係，但與宋氏兄妹的情誼仍然極其深厚。據聞，宋美齡常常對張學良說對不起；張學良說若談西安事變將爲某些人造成難堪，其中當包括宋美齡。

英國駐華大使於中日戰爭爆發次年的一九三八年七月與蔣介石會談時，曾勸告蔣氏釋放張學良，使其參加抗日戰爭，但沒有結果。他同時建議蔣氏任用宋慶齡，但蔣氏認爲宋慶齡是中共的喉舌而沒理會。張學良自己也曾於該年九月以書面向蔣氏請求參加抗戰，但蔣氏沒有同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中日戰爭結束，在次年一月重慶的政治協商會議席上，周恩來一再提到張學良和楊虎城是「九年前拯救國家民族重大危機」的人物，抨擊蔣介石「嚴加管束」張學良幾達十年。蔣氏於該年十一月，從重慶把張學良移到台灣。這是國民政府在大陸還占優勢的時候。（西村成夫〈張學良的政治肖像〉，《現代中國》63）

最後，我想介紹張學良接受訪問時說過，但電視沒有轉播的兩件印象很深的事。一件是磯村氏說，日本戰敗時，蔣總統表示不對日本報復，令因戰敗而非常擔憂的日本人很感動，對這件事，問張先生是不是也同樣想法。對此張學良答說，他的想法與蔣氏不同，張學良回答說：「日本應該對中國陪罪。」

另外一件是，張學良倒過來問我們。「日本爲何令東條（英機）這種戰犯進靖國神社？進靖國神社的人都是英雄。戰犯不是國家的罪人嗎？令戰犯進靖國神社，不是承認他們是英雄嗎？」

換句話說，張學良並沒有眞正饒恕日本。

連續三天，每天幾個小時，我參加了張學良的訪問，並三度和他用過晚餐，張學良豪爽的人品（氣質），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起初他給我的印象是志操高超的軍人，後來我逐漸發現，他似乎可以算是世上所稱的「英雄」之一。

張學良與日本

1994年8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50元
2001年11月初版第二刷

著　者　臼井勝美
譯　者　陳鵬仁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北基隆路門市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
電話：(02)27627429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1255-9(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linkingp@ms9.hinet.net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張學良與日本 / 臼井勝美著；陳鵬仁譯．
--初版．--臺北市：聯經，1994年
256面；14.8×21公分．
ISBN 957-08-1255-9(平裝)
〔2001年11月初版第二刷〕

I．張學良-傳記

782.886 83007850



張學良與日本

NHK採訪製作

臼井勝美著　陳鵬仁譯

譯者簡介

陳鵬仁，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出生臺南縣。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肄業，留學日本明治大學、東京大學、美國西東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得文學碩士、政治學碩士學位，曾任亞東關係協會東京辦事處僑務組組長、中國國民黨日本地區委員會書記長、中央海外工作會兼任委員，日本拓殖大學客座教授，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兼任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著譯有：《戰後日本的政黨與政治》、《近代日本外交與中國》、《孫中山先生與日本友人》、《宮崎滔天論孫中山與黃興》、《中日外交史》（北伐時代）、《日本的作家與作品》、《世界近代史》、《國父在日本》等七十多本。



ISBN 957-08-1255-9
00250
9 789570 812558